

沦陷时期的 思想文化统治

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
www.krzzjn.com

沦陷时期的思想文化统治

吕元明

思想文化统治中枢——总务厅弘报处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文化专制统治，是和“九·一八”事变的枪炮声同时开始的。

1932年，当伪满洲国刚刚出世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便在伪政府中设立了思想统治机构，即资政局弘法处。这个资政局是由积极煽动满蒙独立、大造侵华舆论的法西斯分子笠木良明策划组织和具体领导的。它一成立，就忠实积极地为这个傀儡新“国家”效劳。这从弘法处承担的三项任务中看得很清楚：第一项，所谓“宣传建国并施政之精神”，这是替伪国家涂脂抹粉，把傀儡政权说成是“独立的新国家”，把法西斯统治说成是“王道乐土”；第二项，所谓“涵养民力，善导民心”，实际上是妄图用“文治”征服民心，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第三项，所谓“普及自治思想”，目的是强行灌输“独立”思想，把东北从整个中国分割开来。

弘法处的活动，是一方面围绕上述三项任务为巩固伪政权大肆张扬反动舆论，进行欺骗宣传；一方面采取组织措施，培训人材，以加速推进侵吞全东北的步伐。为此，资政局弘法处曾办了一个训练所，招的全是日本人。

1933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强化思想统治机构，废资政局，在伪国务院总务厅内设立情报处。当时，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

争正风起云涌，情报处便把打击和瓦解抗日力量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它派出大量“宣抚人员”，充当关东军的别动队。关东军“讨伐”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也会同时出现这种从事思想宣传的“宣抚”队员。

总务厅情报处还统管伪国家的新闻、出版、广播等宣传舆论阵地。

1937年，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控制伪满洲国，由日本人统揽国务院全权，情报处扩大为弘报处。根据伪法令，弘报处的任务扩大为九项：（一）控制舆论；（二）控制文艺；（三）主管“主要政策之发表”；（四）领导和监督报道新闻机关；（五）控制宣传资料；（六）管理出版物、影片及其它宣传品；（七）管理和控制广播及通讯机关；（八）掌管情报；（九）除上述诸项外一切对内对外的宣传。总之，它统辖包揽了文化宣传的一切方面。

为了完成上述各项任务，弘报处设立了三个科：监理科，主要是监督管理文化宣传机构，以及从事文化宣传方面的调查；情报科，主要是从事情报搜集、整理和通报，以及加强情报联系和控制；宣传科，掌管宣传计划和宣传联络工作，以及对内对外重要文化宣传的开展。

从这九项任务和三科的分工范围，可以清楚地看出伪满文化机构的殖民统治和军事侵略特征。新闻、出版、文艺、电影、宣传资料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般不置于官方的直接控制下，只有实行法西斯统治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伪满洲国则从一开始就由日伪政权直接控制，特别是在1937年后更是实行全面统治。这是军事法西斯殖民统治体制的明显表现。

1939年，伪国务院总务厅为了适应侵华战争的需要，弘报

处实行体制机构改革，调司法官吏出身的武藤富男任弘报处处长。伪满协和会和农事合作社等，也是从事刺探中国人民思想动向的机构。为了协调这些机构同弘报处的分工，当涉及到搜集情报和地方性宣传工作时，弘报处主动加强同这些机构地方组织的联系。同时，在各级伪政府中设立和增加“弘报”人员，以调查和掌握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思想行为，以便进一步进行镇压。

1941年，弘报处的职能再次扩大。伪治安部对于电影、新闻、出版的审查；伪交通部对广播、新闻通讯的审查，以及监听国外短波；伪民生部对文艺、美术、音乐、戏剧等文化行政工作的领导；伪外交部外务局的对外宣传等，都转归弘报处统一管辖。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东北的新闻和通讯，于1941年8月25日公布了《通讯社法》、《新闻社法》、《记者法》，全面垄断了新闻和通讯。为加强对文学艺术的法西斯统治，同年3月23日还发布了《文艺指导纲要》。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弘报处同关东军紧密配合，鼓吹大东亚战争，催逼东北人民为日本提供钢铁、煤炭、粮食等，并动员日本百姓过“战时生活”，节衣缩食，卖命出力。

伪满时期，思想、文化、宣传方面的统治机构并不只是一个伪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还有伪治安部警务司，伪民生部教育司、厚生司，伪司法部民事司、刑事司，以及协和会等等，在进行法西斯思想文化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反抗方面，都起了很坏的作用。当时，从伪新京到各级地方组织，都设有名目繁多的宣传和思想检查组织。伪满的警察机构里，就有文化警察，还有种种特务，抓“思想犯”大都是他们干的。

在伪满的最高主宰者——关东军司令部内，设有报道部和调查部，也是从事战争宣传和殖民思想统治的机构。特别是在

战争日趋紧张的时刻，关东军报道部和伪弘报处成了伪满文化宣传的统治核心。

“官制文化”

伪满文化具有高度集中、垄断的特征。一切文化宣传事业都操纵在日伪统治者所统辖的文化机构手中。日本侵略者给这种文化专制概括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叫“官制文化”。很显然，所谓“官制文化”，就是殖民地文化专制、法西斯文化专制。

新闻、广播在现代思想文化宣传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的第二年，便建立了“满洲国通讯社”，着手垄断东北新闻通讯机构与事业，排斥和取消中国人民的新闻、通讯自由。1935年10月末，日本侵略者又以“一个国家一个通讯社”的殖民政策，建立了严格管辖我国东北新闻、通讯的机构——“弘报协会”，把报道、言论、经营三方面统一起来，实行所谓“官制统治”。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再次强化其新闻通讯机构，使之为侵华战争政策服务。1941年根据《国通社法》、《新闻法》、《记者法》，建立起改组的新的“满洲国通讯社”，由日本侵略者全部垄断新闻通讯事业。在报纸的出刊与发行上，建立起三个大新闻社，垄断了整个东北报纸的发行。这就是《康德新闻》社，用汉文出版，合并了18家报社；《满洲日日新闻》社，用日文出版，合并了3家报社；《满洲新闻》社，用日文出版，合并了6家报社。1944年5月，随着战局的发展，《满洲新闻》和《满洲日日新闻》又合并为《满洲日报》。

“九·一八”事变前，刚刚着手建立的东北广播事业，在炮火中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摧残。“九·一八”事变后，全东北的广播均由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垄断，建立起满洲电信电话股份公

司。截至1941年，伪满有18个广播台。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十分薄弱的出版事业，同样也在一开始遭到日本帝国主义践踏。日伪很重视对出版事业的“统制”。“九·一八”事变后在打击中华民族出版事业的同时，加紧建立由日伪直接控制的出版机构。1937年3月29日，伪满洲国建立了满洲图书股份公司，其任务主要是出版发行和销售伪满学校课本、所谓“国策”图书和其他有利于宣扬建国精神之书籍。1939年，建立伪书籍发行股份公司，进一步把东北图书发行、图书进出口工作垄断起来，同时，也协助伪政府有关文化统治机构从事图书出版审查工作。1943年建立了伪“出版协会”，这一组织把整个东北的出版事业都控制起来，其中的出版计划委员会，负责全东北图书审查和批准出版事宜；生产发行委员会，统辖全东北图书出版发行工作。在这种集中“统制”之下，就连稍与战争空气不协调的娱乐性出版物，也都被禁绝了。

日本帝国主义对电影的作用也极为重视。“九·一八”事变后，日伪抵制中国抗日、排日影片进入东北，同时大量放映日本反动影片，宣传殖民侵略政策。日本侵略者组织了“满洲国电影国策研究会”，聚结了关东军、满铁、伪政府、协和会等各方面的文化宣传力量，着手控制东北的电影事业。1937年8月21日，建立了由满铁和伪政府共同投资的“满洲电影股份公司”（简称“满映”），垄断了我国东北的电影事业，包括摄制、发行、管理进出口影片等方面。1942年，伪满政府又决定把各地电影院的建立和管理工作的交给满映。满映的权势更加扩大，完全独霸了全东北的电影事业。

文艺部门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等，在东北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并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较深。因此，日本侵略者在控制这个部门上，颇费周折。最主要的一项措施，是

1941年3月23日由伪国务院弘报处提出的《文艺指导纲要》，它成了日本法西斯对东北文艺实行专制统治的反动纲领。《纲要》第一条就毫不隐讳地道出了其反动实质：“我国艺文以建国精神为基调。故从事八紘一字之伟大精神的美的显现。并且以移植于这一国土的日本艺文为经，以原住诸民族固有的艺文为纬，吸取世界艺文的精华，织成浑然独自的艺文。”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伪满文艺，乃是日本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东西。

如果说，1933年《满洲经济建设纲要》的制订，是日本帝国主义从经济上实行全面“统制”的开始，那么《文艺指导纲要》的发布，则标志着日伪统治者在把全东北实行思想文化专制政策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根据这个“纲要”，日本侵略者一方面拼凑适应侵略战争需要的文艺组织，一方面加紧限制言论自由。在伪弘报处的领导下，伪满的文艺组织普遍进行了改组，先后建立起伪“文艺家协会”、“剧团协会”、“美术家协会”、“乐团协会”等团体。在太平洋战争之后，又拼凑了伪“工艺家协会”、“摄影家协会”、“作曲家协会”、“书法家协会”、“舞蹈家协会”、“俳句^①家协会”等团体。这些团体都是由日本侵略者所主持，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在弘报处的指挥下，各地各种名目繁多的文艺团体纷纷出笼。在侵略战争日趋失败的情况下，这些团体充满着浓厚的杀气腾腾的战争气氛。“牡丹江文艺家协会”，会长是牡丹江省副省长（日本人）；副会长有一个是日本人，另一个是中国人；顾问共5人，全是日本人，其中包括日本驻牡丹江领事、铁道局长、宪兵队长、特务机关长和商工会会长。齐齐哈尔“艺文报国会”领导机构有31人，全部由日本人

① 俳句，日本诗体一种，由5、7、5共17字组成。

组成。顾问是伪黑龙江省日本人副省长、日本人铁道局长、日本人副市长。至于伪满的文化宣传机构，更是由军国主义分子中的骨干所把持。如日本战败前夕，“满映”理事长和“满洲艺文协会”会长，就是在“九·一八”事变中扮演主要角色的甘粕正彦；“满洲弘报协会”理事长高柳保太郎，原是日本陆军中将、满铁顾问。在日本帝国主义垮台前夕，这种军事管辖文艺的组织，到处出现。那时文艺作者的创作计划都要送到弘报处去审查，或存档备案。

1942年，日本在东京召开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东条英机特地跑到会上打气，日本情报局次长、陆军省部长、海军省报道部科长等人都在大会上发言，极力鼓吹军国主义舆论，煽动战争狂热。伪满政府日本殖民当权者也参加了大会，为“大东亚圣战”摇旗呐喊。1943年，伪满政府召开“决战文艺家大会”，贯彻“东京会议”的精神，动员日伪作家行动起来，为侵略战争服务。关东军报道部部长谷川宇一在大会上作了《战争与文艺》的报告，号召文艺家彻底为侵略战争而写作，提出什么文艺要“先行”，作战争机器的“润滑油”。这个期间，有不少日籍伪满作家，被征召到关东军报道部，充当“报道队员”，到前线或兵营去采访，为日益败退无望的侵略战争做最后的鼓噪。

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摧残

“九·一八”事变不久，关东军为了炮制傀儡政权，曾经拼凑了所谓“自治指导部”，拉了一批汉奸、卖国贼，搞“自治”、“独立”运动。在这个组织中的日本人手里，传递着一个秘密文件：《自治指导员服务心得》。其中特别提到：“对各种言论机关及集会等内部情况应特加注意，以绝灭排日思想”，“排

日教材要断然铲除”。这一事实表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是文武两手交替使用，在大搞武力侵占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人民思想文化的镇压。

1932年，溥仪一就任伪执政，则立即发出“通令”，强令全东北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不得使用中国教材，不经日伪当局批准不许集会、结社、游行、摄影、出版，等等。

1932年10月24日抛出的伪《出版法》，规定如要变革日伪“国家组织的大纲”，危及伪“国家存在的基础”，泄露伪“外交及军事机密”，对伪“国交”产生“重大影响”之破坏行为，“煽动”对伪国家“犯罪”、“公开诉讼辩论”、“惑乱民心及扰乱财界”、妨碍伪“法官和警察执行职务”以及其它，都禁止出版。同年9月发布的《治安警察法》，针对当时人民抗日组织纷起，更具体规定了禁止人民集会的自由。规定要求，“屋外集会或公众运动”的发起者必须在开会十二小时前到管辖的警察署去登记。在街道及公众场所贴标语、传单、图画，或散布、朗读其它东西，警察可以“扰乱秩序”等罪名，加以禁止或扣留。

与此同时，日伪当局对带有民族意识的书刊，一律禁绝，并强行输入日本法西斯书刊。根据伪文教部记载，1932年3月至7月，就在东北焚书650余万册。沈阳市一家书店，存有我国关内出版的书未交出焚毁，因此，书店被查封，经理也被投进牢狱。1934年6月29日，伪民政部一次就通令禁止36种报刊输入东北，其中主要是我国关内的报刊，计有：《大公报》、《申报》、《时报》、《新闻报》、《北平晨报》、《华北日报》、《京报》、《平报》、《世界日报》、《社会日报》、《北京日报》、《上海民报》、《广东市民日报》、《豫北日报》、《徽州日报》、《盖世报》和《良友》、《循环》杂志等18种，占禁止输入报刊的一半。此外还有

当时的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也均在禁止之列。此后查禁书刊种类年年增加，查禁极为严格。

十四年的殖民统治期间，中国革命的、抗日的、具有民主思想的书籍、报刊，禁止在东北出版，也不得从关内向东北运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及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书籍，更是日伪严禁的对象。据《满洲年鉴》记载，1935年到1938年的四年间，伪满禁止发行的报纸为7445份，扣押5.6091万份；禁止发行的杂志为2315份，扣押1.3664万份；禁止普通出版物3508册，扣押92.4852万册。1939年，输入的出版物仅以“公安”为由一项，禁止发行共743种（不包括被删削的数目），其中关内的出版物为488种，占全部查禁输入出版物的64%，居第一位。《满洲年鉴》声称：“其中最多的是中国对日军诽谤的记事，关于诺门坎事件对日满军进行诽谤的记事，以及排日、侮日、抗日的记事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的记事。”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矛头主要是指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刻。1937年以后，中国关内运往东北的出版物更是锐减。相反地，日本国内宣扬军事法西斯思想的出版物却源源不断而来，年年增加，后来竟达到占东北当时进口出版物之80%乃至90%以上。1936年，日本向伪满出口书籍58.7万余册，1937年就增至380万册，1938年再增至1000余万册，1939年达1440余万册，1940年高达2230万册，1941年突破3000万册大关，达3440万册。1939年伪满进口日本报纸是5494万余份，杂志827万余册，书籍1440余万册。这个数字是当年中国关内进入东北报纸数的10倍，杂志数的487倍，书籍数的14倍。伪满时期，平均每天有15万余份日本报纸、2.2万余份日本杂志、4.9万多册日本书籍涌进东北。

伪满十四年，做为形象化宣传的主要工具——电影，同样也受到日本殖民统治者的严酷控制。伪检查机关规定，有损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政权的，有损于日本侵略军的，有损于所谓“皇室”的，有损于日伪官吏统治的，特别是有关反战思想的，有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均被禁演。据日伪有关当局透露，1936年，禁演影片178部，其中涉及共产主义思想及所谓危及伪政权而禁演的36部。1939年，列为禁演的43部，其中中国影片占第一位，有18部被禁。同时，日本统治者以“公安”为由，还剪截影片，1936年为2600余米，1937年增至2万余米，到了1939年又增至20余万米。但是，宣扬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电影却充斥伪满各影院，可以说，伪满的影坛是日本电影的天下。1936年日本输入东北的影片是154部，1937年升至232部，1938年一跃而至1352部，1939年再跃为1630部。

伪满时期，以“思想犯”、“政治犯”之名，逮捕、监禁乃至杀害中国人民，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摧残中国民族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不仅关闭了东北的各大学和某些中学，并对具有抗日思想的教师、职工、学生进行严格的审查和野蛮的镇压，甚至连嫌疑者也遭逮捕与清洗。1932年我国东北尚有中小学教师2.4万多人，而1933年减少到只剩1.6万人，其中的几千人被清洗或被迫改变行业。在沈阳、吉林、安东等地接连发生逮捕、屠杀抗日爱国教师和学生的事件。日本宪兵特务机关在沈阳市第三中学制造的镇压事件，一次就捕杀爱国师生35人。日本帝国主义对共产党员的镇压则更为残酷。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学生到关内学习的正当要求，也百般加以限制和阻挠。伪滨江省公署曾为此向各县发布通令，内称：“各县现在仍有多数在中国留学生，殊深遗憾。”通令规定以后

东北人不得到关内去学习，而在关内毕业的东北学生，回东北后，各单位“一律禁止采用”。日本殖民统治者为了割断中国关内、关外的联系，采取了形形色色的限禁手段。

在日本法西斯的残酷压制下，中国东北一部分爱国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们有些人参加了抗日武装队伍，也有一部分人被迫逃亡关内。

（摘自《伪满洲国史》）

《文艺指导纲要》出笼以后

冯为群

制定反动纲领摧残文艺

伪满洲国建立以后，日本侵略者虽然通过伪政权逐步加强了对文艺的统治，先后公布了《出版法》、《新闻法》、《记者法》、《通讯社法》、《电影法》等，但是这些有关文艺的法令都比较单一，只能就某一方面实行专制统治，还不足以囊括整个文艺统治的内容，更不能从理论上把当时的文艺纳入殖民主义的轨道。所以为了使“殖民文艺”统治能够达到奴化思想、征服民心、改造“满洲”、使东北的文艺失去中国民族文化固有的特色，以尽早变成日本文艺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目的，他们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研究，终于1941年3月23日由伪国务院弘报处制定并发布了《文艺指导纲要》，把殖民文艺统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文艺指导纲要》共分五大部分，其中一、二两个部分是重

点，是关键。在第一部分“趣旨”中，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确立了艺文的概念，把文艺、美术、音乐、演艺、映画、写真等从文化的大概念中抽出来，称之为“艺文”，避免由于统称文化而造成混淆；二是明确了艺文的指导方针，即施行育成指导，并要求艺文“与其他诸部门互相协调和进而普及于全国，以期精神的建设与物质的建设工作相辅而行。”过去，日本对文艺的统治“较诸产业、经济、交通等其他部门”薄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把施行育成指导作为指导方针，这就使文艺统治和政治、经济等其他部门的统治相互协调和配合。在第二部分“艺文特质”中，日本侵略者毫不隐讳地写道：“我国艺文，乃以建国精神为基础，是为八紘一字精神之美的显现。故须以移植我国土之日本艺文为经，原住民族固有之艺文为纬，取世界艺文之粹，而造成浑然独特之艺文为目标焉。”这段话十分明确地道出了殖民文艺的侵略实质。

关于《文艺指导纲要》，伪国务院弘报处处长武藤富男曾在一次文化人大会上作了长达两万言的“解说”，从艺文的意义和特质，讲到艺文教育及活动，连篇累牍，但都不离殖民文艺统治这个宗旨。比如：“日本的艺文达到世界最高的水准线，大概可以算作世界第一等，今后能指导世界艺文的，鄙人确信就是日本的艺文了……把世界最高的日本艺文移到满洲来，同时满洲也有满洲古来诸民族的艺文，把这两项混合起来去建设满洲艺文……而造成最崇高的大精神，就是八紘一字大精神。”从这里不难看出，武藤的“解说”实际是重弹“种族优劣”的老调，因而也就更加暴露了《文艺指导纲要》的反动本质。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之发达举世公认，文艺之兴盛也是世界最早的国家之一。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不仅光耀过中国文坛，而且也丰富

了世界文学的宝库。对于这样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国家的文学，怎么会以“日本艺文为经”，接受日本艺文的指导呢？他们置历史事实于不顾，硬把自己说成是世界上艺文“第一等”的国家，其目的就是要以欺骗的手段和强权政治加强殖民文艺统治。

《文艺指导纲要》出笼以后，使东北沦陷时期的文艺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当时比较明显的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破坏了民间进步文艺社团的发展，施行了清一色的“国策文艺”。“五·四”以来就形成了的促进东北新文艺发展的结社风气被取消，有些群众性的文艺团体被改组，同时还新建了一些文艺团体，并且把它们都放在伪弘报处的直接控制之下，这样就便于日伪全面地统管艺文了。二是鼓吹圣战，把文艺变成为战争服务的工具。两次在东京、一次在南京召开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就是鼓吹文艺为圣战服务的最好说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情报局总裁、陆军省部长、海军报道课长、“文艺报国会”事务局长等文武官员，都分别地在东京的两次大会上发言，号召文学者要搞所谓的“决战文艺”。伪满洲国为贯彻大会精神，改组了“满洲文艺家协会”，在机构中新设了“审查”、“联络”、“企业”三个部，以与建设大东亚文学的心愿更相符合。并且由伪政府组织召开了“满洲决战文艺家大会”，日本关东军报道部长谷川宇一在会上作了《战争与文艺》的报告，号召作家行动起来，为侵略战争创作出所谓的雄浑无比的伟大的大东亚文学，为鼓动作家为战争写作。还设立了大东亚文学赏，同时有些报刊也举办了“悬赏征文”，以引诱广大文学青年参与“决战文艺”。三是加强了对文艺书籍的出版审查。不但禁止出版一切有进步思想的书籍，就是有违战争意愿的也在禁止之列。对已经装订成册的书刊，如被指责为有问题，就勒令销毁或扯页加盖“削除剂”印章，以示该书有较严重的问题。

从以上这三点就可以看出,《文艺指导纲要》出笼以后,日本对进步文艺的摧残更进一步了。所以有人说,东北沦陷时期的文艺是在岩石的缝隙中生长起来的,这话很形象地说明了日本对当时文艺的严酷统治。

迫害爱国进步作家企图消灭文艺

日本对东北沦陷时期的殖民文艺统治,是在政治上实行白色恐怖和对爱国进步作家残酷迫害两个方面进行的。如果把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作为一个分界线的话,那么在这之前,总的看日伪对爱国进步作家的迫害还不十分突出。这期间虽然有舒群、萧军、萧红、罗烽和白朗等从事左翼文学活动的作家先后流亡关内;也有“星星剧团”、“哈尔滨口琴社”等文艺团体遭到破坏;还有“黑龙江民报事件”等文化人士被逮捕杀害,但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较完备的文艺统治体系,更多的是从政治统治的角度去对待文艺问题。也就是说,日伪的文艺统治还没有特别的注意到文艺的自身,往往只偏重于文艺人的政治活动上。可是到了抗战爆发以后,日伪对文艺的统治就逐渐地形成系统,并且把审查文艺创作和监视文艺家活动紧密的结合起来。

(一)严格的审查文艺创作。每月对定期或不定期的出版物都要进行审查,并根据审查的结果认真研究,从中找出左翼作家的创作方向和描写方法,以及左翼文学创作将会导致的严重后果。可见日伪对文艺创作的审查是殚精竭虑煞费苦心的。伪首都警察厅的敌伪秘件中是这样分析当时左翼作家创作方向的:“满洲左翼文学在它诞生之初,就已经注意到了政治上的形势,采取了抽象的、表面含糊其辞的形式开始创作的。因此,对于一个对这种文学缺乏认识的另外一个民族来说,要想掌握其

中心思想就更具有一番困难。特别在大东亚战争爆发后，政府对反满抗日运动的检举、镇压以及对他们采取的措施，日益引起左翼作家的警惕，因而，他们较之过去更加抽象化暧昧化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具有左翼文学理论的作家们，不可能因为形势的急剧变化而完全放弃他们的本质上的内容，因此，今后的满洲文学所走的道路，可能只有依靠新浪漫主义一途了。”根据这一分析，他们把当时的创作分成激发群众不满的“反政府的作品”、向人民灌输阶级斗争意识的“反资产阶级的作品”、象征未来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反现实的作品”、假借反对英美实则鼓动反满抗日的“反侵略的作品”等几种复杂的状况，甚至认为左翼作家将不使用理论上的术语，而专门用具有满洲文化人情感的语言，以图欺瞒审查人员。所有这些，都充分地说明了日本对东北沦陷时期的文艺统治，已经由外部转入到文艺自身，由现象转入到本质了。假如我们再看一下他们对左翼作家的作品分析，就会更清楚其严密的文艺统治了。

1943年，伪首都警察厅指派特务审查发现9篇左翼作品，有山丁的诗《拓荒者》、也丽的诗《黄昏的诗篇》、吴郎的诗《千里食客》、杨光政的诗《铁窗生活记实》、石军的小说《混血儿》、吴郎的散文《绿荫随想》、露青的论文《每月评论》、吴瑛的小说《鸣》、但娣的小说《戒》。对这9篇作品的审查，一般地说都包括介绍梗概、归纳主题、分析要点、指出问题四个部分。如对山丁的长诗《拓荒者》的审查，先是简要地叙述了诗的梗概，接着确认它的主题是“反日”的，然后列举了两段原文进行分析，认为该诗“借老者对其子的教导，用以鼓吹民族意识和爱国土的思想”，“用野狐、山鼠和豺狼象征日本，即日本掠夺了满洲的宝藏，意思是说，爱国爱土的满洲人民必须毫不犹豫地站起来，驱逐日本，重建满洲。”他们就是通过这样地审查，

对作家进行监视和迫害的。同时他们认为，1943年的文艺创作“左翼的色彩几乎隐蔽起来了，相反的民族意识却正在高涨”，并且会“自然转向民族抗战的阵地”。根据这个分析，日伪便更加注重对文艺自身的统治，企图消灭滋生左翼文学的土壤。

(二) 严密监视作家的活动。日伪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和左翼作家的特务监视，从东北沦陷初期就已经进行，不过那时多注重于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而对正常交往和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一般不予过问。可是后来，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就不行了。1942年伪首都警察厅签发了治安秘件，授命特务“对管内对象实行侧面侦察”，并设立专门机构“文艺侦察部”，及时向警务总局长山田俊介报告文艺侦察情况。现从“文艺侦察部”打给山田的一份报告中了解到，当时日伪把“满映”作为文艺侦察的重点，对编剧、导演和演员都进行严密的监视，并不断地报告被监视对象的活动。仅半年多时间，送交山田的报告就有12件，报告中列举的被监视对象有：王则、安犀、山丁、辛实、李映、刘国权、徐聪、张敏、张我权、张静、蒲克、冯禄丹、王芳兰、王度、王琰、张英华、郑晓君、张奕、威廉等20余人。除“满映”外，他们还把书店、广播、中国大使馆、协和会等，也作为重点监视范围，经常向特务部门报告情况，被牵连的侦察对象有40余人。

日伪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和左翼作家的监视，“原只限于作家季风、沫南、光邈等范围极小的左翼分子”，后扩大到整个文艺界，而其中又把王则、安犀、山丁作为重点。如对山丁，把他视为“继承过去在满左翼作家萧军以来的传统农民文学”的干将，“满映文艺科骨干科员”，因而对他的大事小事一举一动都要进行严格监视。

在进行特务监视中，他们把被监视对象分成重点和一般两

种，重点称“要视察人”，一般称“视察人”，分别列入特务掌握的黑名单，并且形成监视网，跟踪盯梢。如果发现问题，轻则搜宅抄家或拘留审查，重则被逮捕入狱或遭杀害。他们就是利用这种办法监视和迫害进步作家的。

（三）大肆进行逮捕和屠杀。日本对东北沦陷时期的文艺统治，从来都是采取文武两手进行的。文的主要是用其创作鼓噪宣传，或是收买和利用汉奸文人监视左翼文艺家的活动；武的则是逮捕和屠杀，以此镇压反满抗日作家。1935年罗烽被捕入狱仅仅是个前奏，1936年“黑龙江民报事件”就进行屠杀了。在被逮捕的90余人中，有5人被杀害，其中著名作家金剑啸、《黑龙江民报》社长王甄海、记者阎达生就是在这次事件中惨死在日伪的屠刀之下的。1937年“哈尔滨口琴社”的主要成员侯小古、王家文、陈笑岩、柳岍、沈玉贤（女）、李范哲、聂其瑞、孔繁绪、陆怀章、金真淑（女）、崔昌林（女）、聂宜慈（女）等12人被捕入狱，其中王家文判刑5年，侯小古判死刑，英勇牺牲，这就是闻名全哈尔滨市的“口琴社事件”。上述这两次事件虽然是发生在黑龙江一省，但它却使整个东北文艺界笼罩上一股越来越紧张的白色恐怖空气，最后终于酿成震惊东北的“左翼文学事件”。

为了扩大侵略的太平洋战争，维持和巩固大东亚新秩序，把文艺尽快地引向战争轨道，日本侵略者于1941年12月30日，在全东北实行大逮捕，次日半夜又进行了一次，这就是所谓的“左翼文学事件”。在这个事件中遭到逮捕的有：关沫南、陈隄、王光逖（司马桑敦）、刘丹华、李季风、高德生（杲杳）、牢罕、赵文选、李默、问流（刘鸿云）、温成钧（艾儒）、驼子、张烈、刘荣久、马成龙、陈东升、孙海峰、王德麟等。他们在狱中被严刑拷打，摧残折磨，这之中温成钧遭虐待病危，保释出狱后

死于长春悦来客栈，间流也因受尽折磨保释后死去，刘荣久被判极刑绞死，马成龙被判无期徒刑惨死在狱中，陈东升在押解途中自己撞车身亡，孙海峰为保护战友跳楼殉难，王德麟被放在日本犯人一起折磨致死。这是日本进行法西斯文艺统治欠下的又一笔血债。此后虽然没有进行大的逮捕和屠杀，但是迫害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和左翼作家的事仍时有发生。1943年田琳被捕入狱，1944年田贡、铁汉、鲁琪、王天穆等也被投进监牢，就是在北京的李克异，也于1942年被关进日本的监狱之中，日本侵略者就是想通过大肆的逮捕和屠杀，企图消灭反满抗日的爱国文艺。

但是，继承了“五·四”新文学革命光荣传统的东北文艺，是消灭不掉的。它虽然由于日本的殖民文艺统治而一时显得景色萧条，但同时在高压之中也孕育着一种更大的反抗力量，这力量必将促进东北新文艺时代的早日诞生。果然，日伪垮台后，东北沦陷时期的文艺挣脱了枷锁，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之中，并以新的姿态走向发展和繁荣。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二期）

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概观

冯为群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八·一五”光复，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蹂躏了整整十四年，人们通常把这段时间，称为东北沦陷时期；而反映这一时期生活的文学，就被称作是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了。

那么，究竟怎样正确认识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呢？下边谈谈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是 “五·四”新文学的继续和发展

东北新文学的兴起虽然来得较晚，但在“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却也逐渐地成长和发展起来。早在1921年左右，有些人就提倡和宣传新文化运动，到了1923年以后，随着革命形势在东北的不断发展，鼓动新文学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相继组织起一些比较进步的文学社团；有的不仅提出了较为鲜明的革命文学的主张，而且还创作出了一些具有清新思想内容的作品，使得东北这块文学的沃土，在“五·四”新文学浪潮的波及下，颇有点旧貌换新颜之势。

然而，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炮火，不仅摧毁了东北大地，也摧毁了正在发展着的东北新文学。报馆倒闭，期刊停办，人员逃亡，刚刚发展起来的新文学，一时处于死寂状态。但自1932年起，日本帝国主义出于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向人民灌输奴化思想、宣传所谓“王道乐土”、“日满协和”、“共存共荣”的政治需要，很快就让一些报纸恢复出版，这在客观上，使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得以利用这个条件复苏起来。本来，东北的新文学在继承“五·四”文学传统上，于事变之前就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发表在报纸副刊上的文学作品，因具有新的生活气息而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于是，复刊后的报纸又在日寇不大注意的角落办起了文艺副刊，这就为东北新文学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块阵地。

勿庸讳言，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法西斯的文化统治，

使东北新文学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呈现出了一种特殊的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殖民地文艺的色彩。但文艺的殖民主义化却远较那些海盗式的抢劫、资本的输输出、商品的倾销、原料的掠夺等等，要困难得多。因为，一个国家的领土有可能被殖民主义者所霸占，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人心是永远也不会被征服的。正因如此，所以沦陷后的东北新文学，其主流仍然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光荣传统。其主要表现是：

（一）反帝反封建是当时文学的基本倾向。如果说沦陷前的东北新文学还是以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话，那么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以后，由于民族矛盾的加剧，所以反帝的主题已经成为许多作家十分关注的问题了。但迫于日伪逐步加强的残酷的文化统治，一些作家不敢公开暴露自己的思想，只得在反封建的内容中渗透出反帝爱国的斗争精神；加之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已经勾结在一起，共同对付反满抗日力量的情况下，所以反封建的本身就具有了反帝的重要内容。仅以小说为例，“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创作，虽然也大多取材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男女青年的爱情故事，但它所反映的却是封建主义的剥削形式和个性解放的要求，可是事变之后就显然不同了，由于作家把国土沦丧作为大背景来展现，并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无情地暴露当时的社会黑暗与丑恶，所以无论是描写农民的悲惨遭遇，还是反映工人的痛苦生活，抑或是表现男女情爱的悲剧，无不打上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带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比如山丁、秋莹、袁犀等人的作品，表面看，作家所描写的无非是封建统治下生活在底层人们的悲苦命运，但其锋芒所指，却是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比封建势力更为凶残的敌人。这种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倾向，正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种反映。

(二) 沦陷后的东北新文学推进了文学革命的进程。在这方面，表现最为明显的，首先是由文言到白话的急剧过渡。早在1919年，东北的报刊由于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有的就已经采用了白话文，但迟迟没有推开。可是到了1932年事变后复刊的报纸，几乎普遍使用了白话，摒弃了文言。这种由文言到白话的急剧过渡，充分地体现了适应大众反帝反封建需要的文学革命的精神。其次是由报纸副刊向文艺期刊的发展。寄附于报纸副刊是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一个特点，这一特点在沦陷前期表现得尤其明显。如大连的《满洲报》、《泰东日报》、《关东报》；沈阳的《盛京时报》、《民报》、《大亚公报》、《奉天公报》、《奉天日报》；哈尔滨的《国际协报》、《哈尔滨公报》、《哈尔滨新报》；长春的《大同报》等，都先后创办了文艺副刊，其中有些文艺副刊成为当时坚持中国新文学传统的一些文学社团的社刊。这些社团，以此活跃文学创作，介绍和引进外国的新文学思想和文学作品，宣传他们的文学主张，有力地推动了沦陷时期东北新文学的发展。可是到了1937年以后，一些新的文艺刊物，如《明明》、《斯民》、《麒麟》、《艺文志》、《文选》等先后问世，才使新文学基本上摆脱了对报纸副刊的寄附关系。作为发展新文学的园地，文艺期刊对推进文学革命的进程，显然是报纸文艺副刊所无法比拟的。

(三) 文艺论争促进了沦陷时期东北新文学的发展。“九·一八”事变之前，许多热衷于东北新文学发展的人，虽然也提出过一些文学主张，但却始终没有因某些文艺观点的不同而展开什么大的争论。可是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文艺论争也相继展开。规模较大、而且对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的发展确实有很大影响的主要有三次：

一是1935年由王孟素发起的关于建设东北文坛的论争。这场论争，是在东北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更加艰苦的阶段，文艺界的一些爱国进步的作家，如舒群、萧军、萧红、罗烽、白朗等人先后流亡关内，有些报刊的文艺版面充斥着低级下流和歌功颂德的文学，许多文学青年虽然不满于当时出现的言情和歌功之作，但他们自己所写的一些作品却往往趋于感伤和颓废，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表现出了一种悲观失望的心理和逃避现实的情绪，在对人生感到渺茫，对前途失去了信心的情况下展开的。王孟素针对这种不良倾向，发出了建设文坛的呼声。他从唯物史观出发，辩证地论述了文学与生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文学必须描写现实、反映人民生活的要求，这在当时来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但由于他的文章涉及到了“响涛社”成员石军的创作，所以引起了该社成员的反对，导致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论争。尽管幼弱的东北文坛缺乏正确思想的指导和进步理论的培植，使论争不免肤浅甚或出现无谓的纠纷，但它的实际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因为就其实质看，这是一场坚持文学的现实主义原则、反对歌颂“王道乐土”、“日满协和”、宣泄“感伤颓废”的文学，提倡振奋的、爱国的、反抗的文学的大论争。通过这场论争，使大家提高了对文学使命感的认识，明确了文学创作的任务。

二是1937年由山丁的《乡土文艺与〈山丁花〉》一文引起的关于“乡土文艺”的论争。山丁在评论疑迟的短篇小说《山丁花》时指出，它是“一篇代表乡土文艺的作品”，并且强调“满洲需要的是乡土文艺，乡土文艺是现实的”。他的这一观点，遭到了以《明明》为阵地的一些成员的反对。他们认为，提倡“乡土文艺”，无非是“大豆高粱的唾余”，一句“漂亮的口号”，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吴郎等人支持山丁的观点，认为“乡土

文艺”所倡导的面向“现实”的主张，是适应当前社会意识需要的，它比那种脱离现实的唯美主义要更有价值得多。双方意见针锋相对，论争持续一年多尚未停息。这场论争的实际意义，远远超出对一篇小说的评价范围；不管论者是有心还是无意，从客观上看，“乡土文艺”的论争对殖民主义文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多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实力地宣扬和制造所谓的日本民族“种族优越”的荒谬文艺理论，企图泯灭东北文学的民族意识。而“乡土文艺”的提出，把反映社会现实、把握时代意识、创作具有民族和乡土特色的作品作为重点，其锋芒所指是不言而喻的。此外，“乡土文艺”的提出，对风花雪月和色情文艺以及文学的复古倾向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当然，这场论争由于染上了宗派主义色彩和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充分地争论下去。

三是1938年以古丁为首的“写与印”和以山丁为首的“热与力”的论争，在《明明》杂志创刊之始，古丁等人就打出了“写印主义”的旗帜，待到这个刊物的影响继续扩大之后，他们就有目空一切了，好像文坛的揠奋就是他们的功劳。这引起了山丁等人的反感，认为文坛的一度勃兴并不是几个人的努力，而是共同创造的结果，古丁等人能够比较大量地出版作品，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创作就高于别人的水平，而是依靠日人的权势和资助。于是，在这种不羁情绪的激愤下，他们针对盲目性的“没有方向的方向”、只顾多写多印的“写印主义”，提出了“描写真实”、“暴露真实”的“热与力”的主张，展开了持续三年之久的论争。从总的倾向看，文艺界的更多的人士越来越认清了“写印主义”脱离现实、靠近官府的发展趋势，而“热与力”所提出的“描写真实”、“暴露真实”，才是时代赋予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的真正使命。

对于当时文坛的论争，有些人认为是意见不和、口角之争；无谓的论战，没有真正的批评；分裂文坛，文化的罪人；阻碍文艺的发展，毁灭新文学的前程。其实，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的几次论争，使文学由几度衰微转向了复苏、发展和振兴。1935年文坛建设的论争之前，文学还只能是依附于报纸副刊而存在，可是论争以后，由于大量期刊的问世，发表文艺作品的园地也扩大了；接着便出现了由短篇进入中篇、再进入长篇的创作；出版文艺作品的数量也大大地超过了从前；至于创作质量和文艺理论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论争拨正了文学的航向，启发和引导了一些作家及文学青年，注意在自己的创作中反映人民所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充分地看到了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确实是坚持和发扬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

爱国抗日的主题是东北 沦陷时期文学的突出内容

自从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以后，东北人民就没有停止过反抗和斗争，这中间虽然有国民党奉行的不抵抗政策的干扰，但广大人民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文学既然是现实生活的反映，那么，它就不能不对这段生活的历史有所描述。从日本强占东北的那天起，徒然、绿波、铁草、曼平等，就以通讯报道的形式写了不少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罪行，痛斥了伪国汉奸的无耻行径，反映了东北人民爱国抗日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不过，真正以爱国抗日斗争为主题的文艺作品，还是在1933年以后才陆续出现的。

当时，反映东北人民爱国抗日斗争生活最为鲜明的，是《大同报》的文艺副刊《夜哨》和《国际协报》的文艺副刊《文

艺》上发表的作品。《夜哨》创办于1933年8月，由共产党员作家金剑啸和罗烽等同志根据党的指示进行筹划，通过萧军同志组稿和出面与编者陈华联系，有组织有计划地撰写反满抗日的文学作品。这样，《夜哨》便成了党领导文艺进行抗日斗争的重要阵地了。为该刊撰稿的主要作者有：洛虹（罗烽）、剑啸（金剑啸）、黑人（舒群）、三郎（萧军）、悄吟（萧红）、梁倩（邓立）、文光（署名“星”）、刘莉（白朗）、权（陈华）等。从所发表的作品看，《夜哨》不愧为进军的号角。它有时发表以描写广大农民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遭遇为内容的作品，揭露统治阶级的凶狠和残暴，暗喻封建势力和当时的黑暗政权在荼毒人民方面狼狈为奸的情景；有时也发表以反映效忠敌伪、甘做鹰犬的民族败类为题材的作品，揭示那些卖身投靠者的丑恶灵魂；有时甚至发表直接借人物之口高呼《国际歌》中“起来，全世界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这样的《国际歌》词中非常具有鼓动性的词句，以表现人民的强烈爱国热情和誓死抗日到底的决心。但由于《夜哨》的锋芒太露，所以引起了敌伪的注意，特别是以抗日斗争为题材的文光的《路》连载以后，就更加引起了敌人仇视。迫于这种严重的形势，刊物很难再继续的办下去，因此编者陈华以“权”为笔名，发表了题为《夜哨的绝响》一文，结束了这个只出21期就于同年12月停办的、被人称为“抗战文艺先锋”的报纸文艺副刊。

但是，时隔不久，以萧军、萧红、罗烽、白朗、金剑啸、山丁等这些曾经围绕着《夜哨》创作反满抗日文学作品为首的同志，又于1934年1月，在哈尔滨的《国际协报》上，开辟了新的文艺阵地——《文艺》周刊，由白朗担任主编。该刊仍然保持着《夜哨》的战斗风格，它所发表的作品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战斗性。如对当时农村的动乱、城市的破产、经济的萧条、阶

级的对立、民族的危亡等方面内容的描写，以及对宣扬“日满协和”、“王道乐土”的粉饰文学的批判，都在该刊发表的作品中有所反映。后来，由于日伪对文艺统治的加强，不少进步作家先后离开了哈尔滨奔赴祖国内地，所以使得《文艺》周刊也只出了48期，就于年底停刊了。

进步作家的出走，《文艺》周刊的停办，虽然使当时的文学界较前沉寂了一些，无论是组织活动还是文学创作，都缺乏从前那种活跃的气氛了，但是，留在东北的作家，如金剑啸、山丁等人，仍然团结一些进步的文学青年，在更为艰苦更为危险的条件下，继续从事着文学斗争。

金剑啸是30年代革命文艺的传播者，1931年他从上海回到哈尔滨以后，就把党所领导的新生的革命文艺气息带到了这个北方美丽的名城；并且以他能歌、善画、酷爱诗文的多方面艺术才能，传播着革命文艺的新风新雨。“九·一八”事变后，他利用绘画、诗歌、小说、戏剧、音乐等艺术形式，进行反满抗日的宣传和斗争。他在《夜哨》和《文艺》两个副刊上发表的小说《星期日》、《夏娃的四个儿子》、《云姑的母亲》，诗歌《白云飞了》，剧作《穷教员》、《艺术家与洋车夫》、《黄昏》、《母与子》等，都对当时黑暗的社会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家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敌人的义愤。正因如此，他为反动的日伪当局所不容，迫于白色恐怖的客观形势，他不得不于1935年离开了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去了，担任了《黑龙江民报》的文艺编辑工作。不久，他在自己主编的文艺副刊《芜田》上，发表了以歌颂东北抗日联军斗争生活为主题的著名长篇叙事诗《兴安岭的风雪》的部分章节，显示了沦陷时期东北文学抗日爱国的革命精神（这首诗曾于1938年8月，在上海由白朗、金人主编的“夜哨丛书”出版单行本）。后来他又回到了哈尔滨，担

任《大北新报》画刊的主编。由于他在该刊上刊登了苏联的伟大作家高尔基的照片和病重的消息，而被日寇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高等系特务逮捕，于1936年8月15日，在齐齐哈尔被敌人杀害，时年27岁。

山丁是“乡土文艺”的倡导者。早在1934年，他就和萧军在哈尔滨研究过“乡土文艺”的问题，决定“先从暴露乡土现实做起”，振兴和发展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而后，在他为“满洲新文学大系小说上卷”写的“导言”中，借陈华文章里的话进一步表达了对“乡土文艺”的看法，认为“越是质朴坚实的土壤中才会生出硬花果，满洲确是这样的在作品中嗅不出舶来的香水油，却有着浓烈的沃土高粱气息，活动着的人物也是质朴的，而且有着强韧的忍苦耐劳的大陆性。当时他们是不太完美的，然而那是完美的开始”。同时，他还在《斯民》上，发表了专门论述“乡土文艺”的文章——《乡土与乡土文学》，表达了他致力于“乡土文艺”的决心和愿望。他主张创作具有地方特色和乡土风情的作品，要求要把着眼点放在“暴露乡土现实”上。当时的现实是什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和镇压，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描写真实、暴露真实就成了“乡土文学”主张的真实含义了。因为在国土沦丧的东北大地，破坏地方特色和乡土风情的罪魁祸首是日本侵略者，文学不描写和暴露这个真实就没有办法去实现自己的“乡土”愿望。在这个意义上，山丁提倡的“乡土文学”，实际上就是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文学。尽管由于当时有些人很不理解并由此展开了一场较大规模的论争，但是，包括那些反对“乡土文学”主张的人在内，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写出了一些具有反抗意识的作品，把“乡土”的概念扩大到“民族”的范畴。而山丁本人则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实践着他的文学主张。他的短篇小说集

《山风》中的九篇小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了作家对乡土对祖国无比怀恋和热爱的深厚感情。如果说《山风》、《织机》、《狭街》、《臭雾中》、《北极圈》和《壕》等小说，只是通过对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们悲苦命运的描写，透视出日伪统治者的凶残面目的话，那么《孪生》中所表现的对于故土乡情的热爱，分明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所施行的归村并屯、制造无人区的烧光、杀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的一种强烈的反抗。总之，山丁的短篇小说，包括1942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乡愁》在内，把描写乡土风情和揭露日伪的残酷统治紧密地结合起来，充分地暴露了那个黑暗社会的真实情景，表现了作家敢于和反动的社会现实进行搏斗的顽强抗争精神。他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以东北的广漠农园山村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叫做“狼沟”的边远山村的变化，展示出了那里的一些小人物的不幸的命运。作品虽然把背景放在了“九·一八”事变之前，但是所描写的内容则完全是事变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也许就是因为这样，这部小说曾遭到了扯页，并加盖“削除剂”印章，以示小说有较严重的思想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部作品所具有的反满抗日的进步内容。

此外，像王秋萤、袁犀、李季风、疑迟、关沫南、陈隄、田琳、金音、冷歌、杲杳、梅娘、韩护等作家的作品，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东北人民的苦难历程和反满抗日的斗争生活。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在东北沦陷的十四年中，王秋萤创作和发表了几十篇作品，从未以伪“大同”或“康德”的年号在文末标明，更没有在作品中对所谓的“日满亲善”、“共存共荣”之类的侵略宣传表示过阿谀奉承。绝大多数作家也都保持了民族气节，并把爱国抗日的思想感情倾注在自己的作品之中。

当然，也有一些人在东北沦陷时期写了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作品，对人民起了麻痹的作用；不过这些人并不都是死心塌地要做汉奸的，因此不能轻易就说谁是汉奸文人。公开在诗词文章中美化日伪、歌颂侵略的民族败类，毕竟是极个别的。所以说，就其总的倾向看，爱国抗日的主题始终是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主流。

抗联文学是东北沦陷 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中，反映抗日联军斗争生活的文学作品，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人们通常把它称之为“抗联文学”。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无比愤慨，从日本出兵强占了沈阳的那天起，东北人民就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抗和斗争。由游击队、义勇军、救国军和山林队等，直到东北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和抗日同盟军等各种抗日武装发展而成的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抗日力量，采取游击战术，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尽管后来敌人集中了大批的优势兵力进行讨伐、扫荡，致使抗日联军处于极端困难时期，但是抗联战士仍然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反映抗联生活的文学作品，对这场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的伟大斗争做了真实的反映。

在抗联文学中，抗日诗词最为突出，影响也最大。一些抗联将领不仅领导部队同敌人做殊死的搏斗，而且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以文艺为武器教育战士，打击敌人。杨靖宇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和《中朝民族联合抗日歌》，气势蓬勃豪迈，是鼓舞战士英勇杀敌、唤醒中朝民族团结抗日的战歌。李兆麟

的《第三路军成立纪念歌》和《露营之歌》，反映了抗联的艰苦生活，成为号召战士肩负起救国重任、完成民族解放战争光荣使命的号角。李延平的《游击队》，表现了游击战士在党的领导下，克服困难，坚持把抗日游击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宋占祥的《跃进啊，中国！》，激励战士冲破阴霾黑暗的社会，向日本法西斯和他的爪牙冲杀。冯志刚的《浪潮歌》，描绘出使敌伪难以逃脱的革命战争的滚滚洪流。吕大千的《狱中遗诗》，抒写了蕴藏在人们心中的怒火中烧般的反满抗日的心情。李斗文的《告伪军兄弟书》，规劝伪军反正，共同投入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正义斗争。这些诗词，以其鲜明的战斗性、广泛的群众性和强烈的宣传鼓动性，博得了广大人民、特别是抗联战士的热爱，同时也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因为创作这些诗词的抗联将领，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他们不但同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而且和人民群众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他们所写的诗词，最有针对性、鼓动性和战斗性，也最能反映斗争的真实情况，代表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又由于这些诗词文字比较浅显易懂，语言也很朴素单纯，韵律又铿锵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所以被群众广泛地传诵。如李兆麟的《露营之歌》，不少战士和群众能够背诵，诗中的“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等诗句，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被传诵着。杨靖宇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不仅当时激起过无数东北人民“杀敌救国复河山”的铁血意志，而且至今还被当代青年所演唱，成为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的很好教材。

抗日歌谣，作为大众化的一种文学形式，也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流传着。它先是由抗日游击战士作为传单油印散发，后来逐步地普及到广大群众之中。这些无论是出于抗日游击战士

之手，还是出自抗日群众之口的歌谣，都无情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热情地歌颂了抗日战士和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英雄事迹，深刻地反映了抗日斗争的艰苦生活，充分地表现了人民群众抗敌御侮的爱国主义精神。就其内容看，在抗日歌谣中，首先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反映人民群众奋起抗战的歌谣占绝大部分。日军侵占东北以后，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但是，东三省的人民和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协助之下，不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组织起义勇军和游击队，同日本侵略者进行英勇的斗争。当时在东北义勇军中流传的一首歌谣《上起刺刀来》，就充分地表达了这一点。还有，《国耻纪念歌》、《长白山歌》、《归屯歌》、《四季歌》、《骂老廉》、《上前线》、《奋斗曲》、《抗敌》、《从军行》、《组织起来去冲锋》等，也都在不同的时期随着斗争的需要应运而生，并在抗日队伍和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显示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和不甘屈服的抗敌精神。其次是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歌谣占有重要的地位。《全国抗战歌》、《民族解放歌》、《统一战线歌》、《劝亲日士兵反正》等，都旗帜鲜明地宣传了我党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政治主张。这些歌谣，对争取和联合一切抗日的力量，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因而深受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再次是歌颂党的领导和反映抗日战士斗争生活的歌谣也为数不少。《共产党有主张》、《革命十二月》、《贫农四季歌》等，都从不同的方面，以真挚动人的感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满洲游击队歌》、《义勇军四季游击歌》、《西征胜利歌》、《莲花泡战斗》、《囚牢吼声》、《追悼歌》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抗日战士的生活和斗争，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表现了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显示了人民群众对战士们的热爱之情。最后是对少年儿童参加抗日斗争的情况，也

在抗日歌谣中有所反映。《儿童抗日歌》、《少年先锋队歌》等，反映了少年儿童对东北抗日联军由衷的热爱，表现了那些幼小的心灵对侵略者的仇恨，也和成年人一样武装起来，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尽管这方面的歌谣不多，但作为男女老少一齐动员的全民抗战，少年儿童毕竟也是一支不可缺少的抗日力量。

此外，在抗日的歌谣中，也有一些是反对封建婚姻和揭露尖锐阶级矛盾的，不过，反映这方面内容的歌谣，都是与抗日战争的总主题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封建的买卖婚姻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也是为了动员人民起来进行抗日斗争，所以这些歌谣也自然地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

革命的戏剧和小说、散文的创作，在抗联文学中也很活跃。在创作和演出的戏剧中，主要的是话剧和歌剧这两种艺术形式，特别是话剧，它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生动感人的情节冲突，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当时影响较大的是杨靖宇将军创作的话剧《王二小放牛》和朝鲜族抗日战士创作的多幕剧《血海之唱》，这两部剧作，以较为深刻的思想和广阔的生活画面，形象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讴歌了汉、朝两个民族之间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小说和散文的创作，主要是由党直接领导的革命作家写的。如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骆宾基的《边陲线上》等作品，虽然不是东北写成出版的，但对东北的抗日斗争和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总之，东北抗联文学是伴随着抗日的烽火诞生，在艰苦的斗争中发展，在日伪的高压统治下成长壮大起来的，虽然它没有什么宏篇巨著，但是作为党所领导的不可缺少的一条文艺战线，却记载和反映了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真实生活。如果说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的话，那么，在这之中的抗联文学则起到了积极的

模范作用。正因如此，抗联文学不但具有极其宝贵的史料价值，而且至今仍有着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

描写真实，暴露黑暗，隐喻光明，是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基本特征

在东北沦陷初期，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忙于扩大对中国关内的侵略，所以一时还来不及对文艺统治得那么严格，可是到后来，由于阶级矛盾的日益加深和民族矛盾的逐渐尖锐，法西斯的文化统治也就相应的加强起来。但尽管这样，广大的爱国作家和一些文学青年，还是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了对黑暗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对被奴役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不过，当时的许多作家，由于缺乏一种正确的革命思想的指导，加之自身处境的艰难，所以在日伪高压的文化统治面前，感到孤立无援，空虚寂寞，甚至对抗日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带着这种思想情绪进行创作，就自然地把悲观和失望的情调反映在作品之中；虽然他们也描写了真实、暴露了黑暗，但却没有预示出光明。正如当时较有影响的文艺批评家王孟寰指出的那样：“尽给作品的人物以绝望，正如那些尽给作品的人物以出路，同样是空虚的感情。”可是，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作家能够不回避社会的矛盾，敢于面对现实生活，抒写郁闷在广大群众中的思想感情，这自然地就形成了当时的作品以暴露社会黑暗为主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早在1937年左右，在东北的日人文艺评论家就有所发觉，到了1939年以后，在出版的许多作品中表现的更为突出，所以日人文艺评论家不仅对这种“暗”的趋势和倾向进行指责，而且配合《文艺指导纲要》的宣传，规定不许在作品中描写黑暗面，不许在作品中流露出悲观和失望的情绪。但是，陷入水深火热的东北人民，他们面对着沦丧的国土，

整个生活充满着剥削、压榨、欺凌和掠夺，这叫那些有良心、有爱国热情的作家们，怎能不去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活，暴露当时社会的黑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所造成的民不聊生的苦难情景呢？作家山丁针对日人文艺评论家的指责，在《〈去故集〉的作者》一文中写道：“‘暗’——这是在满日系批评家一致对满系作品的观念批评，我们读了人家的评文仿佛有许多话要辩驳，其实辩驳也无益处。八不主义（即不许写黑暗面、不许写悲观和失望等——笔者）不是明晃的摆在明处吗？有时也自己解嘲自己问自己，我们为什么不明朗起来呢？我们是活在以写穷人为可耻的土地吗？秋莹的作品是刻画暗的。这暗则是‘明’的希求，是‘明’的征候，我们的作家仿佛是一群送葬的歌手，倘能唤出新的，相信也会奏出健康的明朗的声调的。”最后，他通过对秋莹作品的具体分析进一步指出：“由这里也可以看出作者的暗的源泉，这暗该是如何隐藏着一束向上的灵魂的痛苦。”作品所以描写黑暗，并不是作者的“消沉与颓靡”，而是“时代的形成时代的写照”。山丁的话，充分地揭示出了当时文艺创作的“暗”的特征、“暗”的根源和“暗”的意义。

统观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创作，就可以看出描写社会黑暗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作品的主要内容了。山丁的《山风》、《乡愁》、《绿色的谷》等小说和诗集《季季草》；秋莹的短篇小说集《去故集》、《小工车》和长篇小说《河流的底层》；袁犀的《泥沼》（短篇小说集）、吴瑛的《两级》（短篇小说集）、梅娘的《第二代》和《小姐集》（均为短篇小说集）、凝迟的《花月集》、《风雪集》和《天云集》（均为短篇小说集）、田琅的《大地的波动》（长篇小说）、小松的《北归》（长篇小说）、田琳的《安获和马华》（中篇小说）、关沫南的《蹉跎》（短篇小说集）、成弦的诗集《青色诗抄》、金音的诗集《塞外梦》、冷歌的诗集《船

厂》、杲杳的诗集《日笛》、外文的诗集《刀丛集》、古丁的诗集《浮沉》和杂文集《一知半解》、季风的杂文集《杂感之感》、石军的《沃土》(长篇小说)、励行建的《风夜》(短篇小说集)、百灵的诗集《未名集》、徐放的诗集《南城草》、柯大的《燕》(短篇小说集)、柯矩的《乡怀》(短篇小说集)等,都程度不同地暴露了社会的黑暗,暗示出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和凶残,反映了在黑暗深渊里进行挣扎的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

这些作品,暴露社会的黑暗主要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凄苦命运的揭示来完成的。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者所描写的几乎都是一些被侮辱、被损害、被践踏的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这里尤以山丁、秋莹的小说最为突出。山丁的《织机》里的林师傅、《狭街》里的刘大哥、《北极圈》里的大青嫂、《孪生》里的铁柱,等等,都是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一群苦难者的形象。他们生活在阶级压迫和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在走投无路中挣扎着求生,悲惨的死去。秋莹的一些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在对人物命运的刻画上,基本上都是以被社会所吞噬的一群最底层的人们为主要内容。作者以现实生活为依据,把那些苦难的形象放在最典型的环境之中,让他们几经折磨,最后不得不以悲惨的结局而告终——不是在饥寒中、在监牢里死去,就是在惶恐中、在绝望里逃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真是令人不忍目睹。不过,他的作品和山丁的一样,给人的感觉不是绝望而是仇恨,是对那使人走向痛苦、走向死亡的黑暗社会的不满、抗议和斗争;有些作品,还隐约地使人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袁犀的《泥沼》中的一些小说,不仅反映了东北沦陷时期劳动群众所遭受的劫难,而且也尽量地让他的形象显现出社会的原因。比如,他的《一只眼齐宗和他的朋友》,不但没有因揭露社会的黑暗而使人颓丧,相反,它通过真实而生动

的形象，使人看到了一个敢于在黑暗中追求光明的崇高灵魂。总之，在当时文网杀人的情况下，不少作家能够做到暴露黑暗（尽管不是十分露骨的）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那么，在暴露黑暗的同时，还能够为人们指出一条生路，那就更不容易了。

日伪对文艺的统治和摧残是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不能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日寇的侵略，国土的沦丧，人民的痛苦，民族的灾难，以及反满抗日的斗争等等，这些自然都是文学反映的对象，当然也能成为文学作品的主题，变成培育文学成长的土壤。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殖民主义的文化统治，所以使得文学反映生活的功能受到了种种的限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果说东北沦陷初期日伪的文化统治还不是那么严密的话，那么，随着抗日斗争的发展和日本侵略范围的扩大，对文化的统治也就随之加强了。

弘报处，是日伪进行思想文化统治的中心机构。这个机构在伪满洲国初期，围绕着建设所谓的“独立的新国家”进行分割中国的反动宣传；打击和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力量；统管伪国的新闻、出版等文化宣传事业。到了1937年，弘报处就成为控制舆论、控制文艺、管理出版等一切方面的总统辖机关了；待到日伪末期，伪弘报处的职能再次扩大，它把伪治安部、伪交通部、伪民生部、伪外交部等对文化宣传事业的职权，统一纳入了自己的管辖之中，并且与日本关东军紧密配合，成为伪满国文化宣传的统治核心。伪国公布的《出版法》、《通讯法》、《新闻法》、《记者法》、《文艺指导纲要》等，统由伪弘报处制定，同时还通过各地的弘报机构，加强法西斯的文化统治。当时领导文艺创作的部门所作的计划和作家写出的作品，都要送到弘

报处去审查、备案；对于带有民族意识和反满抗日倾向的文艺作品，一律禁绝出版；对于革命的爱国进步的作家严密进行监视，有的被投进监狱关押，甚至惨遭杀害。舒群、萧军、萧红、罗烽、白朗等作家之逃往关内；田琳、李季风、关沫南、陈隄、田贡等作家之被监禁；金剑啸等作家之被残杀，都是伪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配合日本宪兵队对进步作家和爱国文学进行迫害、摧残的罪证。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侵略者大肆鼓吹“决战文艺”、“圣战文学”，极力把文学纳入战争的轨道。并且在贯彻有日伪代表参加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精神的“决战文艺家大会”上，日本关东军报道部部长长谷川宇一作了《战争与文艺》的报告，号召日伪作家行动起来，为侵略战争而写作。于是，一大批日伪作家被组织起来，分别到兵营、到前线、到工农业等各部门去做“报道员”，为败退无望的侵略战争大肆鼓噪。从而使文艺完全成为侵略战争的附庸。这时，一些有爱国思想的进步作家，在日伪文化统治的白色恐怖中，有的含恨停笔，有的在大逮捕中被抓进监牢。因此，在东北沦陷的最后几年，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文艺可言了。

但文学的沉默，是当时社会黑暗的一种反映，也是日伪的反动统治即将垮台的征候。果然，没过多久，日本帝国主义就投降了。当结束了十四年殖民主义统治的炮声在东北大地一声巨响之后，社会摆脱了黑暗，人民重见了天日，文艺也从死寂开始走向了新生，一向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东北文学，又复苏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之中了。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二期）

抗战时期的东北作家群

沙金城

东北作家群是3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抗日战争爆发后基本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现象。

这里说东北作家群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不称之为流派，是由于它并不是一个文艺社团，列入其中的作家风格不同，也没有划一的主义，甚至有的人并非东北生人。他们的共同之点是：都受到了东北大地的哺育，都曾在荒凉的东北文坛上抛洒过汗水，都以抗日为自己作品的主题。

东北作家群形成的基因是“九·一八”事变。从1931年9月18日起，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地吞并了东北大好河山，于是三省变色，三千万人民沦入水深火热之中。一些在东北文坛拓荒的作家不甘做日伪的顺民，面对敌人的大炮刺刀，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他们或投笔从戎，参加义勇军，与敌人周旋在深山密林；或以笔为武器，饱蘸血泪写下诗文，去激励沦陷区人民起来斗争，赶走倭鬼，解放家园。

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部分东北作家都随着日伪制造的白色恐怖的加剧，先后逃出了伪满洲国，进入关内。他们跋涉在流亡的旅途上，唱着流亡三部曲，写出了许多令人泣下的作品。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们活跃在上海、武汉、重庆、桂林等地，成了抗战文艺队伍中最有生气的一支劲旅，受到了人们广泛注意。尽管他们分散各地，天各一方，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集合体。东北作家群一词，即从那时开

始叫响。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东北作家群包括：穆木天、马加、李辉英、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舒群、罗烽、白朗、骆宾基、高兰、孟十还、杨朔、黑丁、罗荪、纪仅、孙陵、铁弦、塞克、齐同、辛劳、杨晦、李满红、李曼霜、姚奔、金人、马上、师田手、刘黑枷、宇飞、石光、丘琴、李蕙、李雷、王语今、林咏泉、蓬麦哲、张郁廉、赵洵、礼长林、李白凤、洪道、林珏、雷加、终一……这些东北作家，背井离乡，流落他方，大都没有固定的职业，仅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他们含辛茹苦，在战火中到处漂泊，为民族的解放奔走呼号，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抗日战歌。为取得伟大的抗日胜利呐喊战斗。他们用血泪写下的那些作品，不仅鼓舞了人民的斗志，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宝贵财富。其中名篇有穆木天的《新的旅途》、李辉英的《万宝山》、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端木蕻良的《科尔沁草原》、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他们中很多人都成了当之无愧的名作家，蜚声中外文坛。

遗憾的是，在东北作家群中，有的人未能看到抗战胜利，重返热恋的家园，就含恨逝去，如萧红、李满红；有的人没有迎接到光明的新中国，就匆匆与世长辞了，如辛劳、终一；有的在战火中走过来了，却惨死在林彪、“四人帮”之手，如穆木天、金人等。值得欣喜的是，大部分东北作家至今仍然健在，他们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甘苦、共患难，迎来了文艺界的春天。这些文坛老将，宝刀不老，正在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做出新的贡献。端木蕻良写出了长篇小说《曹雪芹》，马加写了长篇小说《北国风云录》，舒群、骆宾基也有短篇新作问世。

东北作家群如灿烂的群星，照耀在中国现代文坛之上，配

合着民族解放战争，出色地完成了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彪青史！

（摘自《东北新文学初探》）

伪满时期盖县 《星火》社活动的回忆

门文东口述 门熙鼎整理

我们《星火》社的同人，虽然没能毅然走向武装抗日的道路，但也同样有一颗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之心。我那时在盖县天台街的复馨香铺当会计，渐渐地接触认识了一些爱国青年。于家麟和我住在一个院，他家是复馨的股东，我俩接触机会较多。他于1933年从盖县西关中学毕业后，由于对日伪不满，就没有参加任何公职，闲居在家进行自学和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他经常给《大同报》、《新麒麟》和《营口新报》等刊物写稿，流露出反满抗日的情绪。那时我们天台街还住着几个爱国青年，王克范和我住对面屋，他是盖县永安屯小学教员，后来搬走了；我们的对门住着一个青年叫张克恩，他是伪盖县兴农合作社的仓库保管员，在我们后街还有一个青年叫王儒成，他是营口一家汉药店的学徒。他们都是爱国的热血青年。由于居住邻近，我们就经常往来。接触多了思想就有了沟通。于家麟常向我们讲些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汉奸的罪行，讲当时的社会形势，讲青年人的抱负等等。并经常借给我们一些进步的书看。如巴金的《灭亡》，高尔基的《母亲》，还有鲁迅的小说、杂文等。这样，在盖县天台街就形成了一个以于家麟为核心的小团体，经常地

有目的地聚集在一起，议论时事，揭露日伪的罪恶，抒发我们的愤怒心情，表达我们的反抗情绪。并且传看进步书刊，写文章，进行反满抗日的活动。

与此同时，盖县熊岳镇孤家子村的爱国知识青年花喜露，从省立海城第三师范毕业，回到盖县熊岳镇归州小学教书。他经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罪行，传播爱国思想。在花喜露的启发教育下，高年级的学生成立了读书会，办起了《春潮》、《飞浪》等进步校刊，开始宣传反满抗日的爱国思想。这样，在花喜露的培养下，一批爱国学生成长起来了。如孔庆举、刘永良、王凤云、段树贵、崔殿久等，后来都成了《星火》社的骨干。

1936年夏天，花喜露（笔名田贲）和于家麟（笔名驼子）等由于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而相识了。在花喜露、于家麟的倡议下，有一天我们聚集在天台街东边的双顶山上，召开了一个同人会。当时聚在一起的人有花喜露、于家麟、王克范、李光海、王锡成和我。大家坐在山岗上，毫无顾忌地开怀畅谈起来。大家都很激动，发表议论，交流思想，各抒己见。从青年人的责任谈到今后应该怎样活动，从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汉奸特务的种种罪行谈到沦陷区被压迫被奴役的同胞的苦难。个个慷慨激昂，争先恐后地列举了各自耳闻目睹的日寇和汉奸的种种罪状。现在回想起来，尽管记不清当时谁说了些什么具体言语和具体事例，但那种热烈的场面和大家的激动情绪，却是不能忘怀的。最后我们研究了下一步活动的打算。大家一致认为，今后应该联系更多的社会进步青年和高校的进步学生，要团结起来共同进行反满抗日活动。当时我们决定：首先要有组织地传递借阅进步书刊，以提高我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并联系更多的进步青年；还要加紧进行文艺创作，宣传反满抗日思想，鼓动人们的

反满抗日情绪；并且决定大家要分别寻找抗日的地下组织，以便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就在这次集会上，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同人性质的社团，油印秘密的刊物，发表一些在敌伪报刊上不能发表的更犀利更明朗的反满抗日的文艺作品。我们就以这个同人社团和这个同人刊物作为联系更多的同人、进行更广泛的活动的基地。大家一致推举花喜露作主编，利用他们学校有油印工具的方便条件，定期出版刊物。这第一个刊物的名字，经过大家反复议论，最后确定叫《行行》，取《古诗十九首》中“行行复行行”的诗句，意思是号召人们行动起来。这个刊名很不好确定，即不能锋芒毕露让敌伪特务嗅出革命气味，也还要有深刻的意义，所以最后才定下了这个刊名。当我们几个人惬意地走下山岗时，已经是黄昏过后了。

《行行》这个同人刊物，我们办了二年之后，扩大了影响面，联系了更多的爱国同人。如当时的盖县一高学生张吉宽、刘永良，辽阳一高学生石岱宗，奉天第三女中学生王丹群，营口商科学校学生孔庆举，盖县女高学生穆玉琪等等，都成了《行行》社的同人。这时花喜露、于家麟又提议，为了能更多地发表一些《行行》同人和青年学生的进步作品，再印行一本刊物，起名叫《星火》，表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思。以喻我们的反满抗日活动虽然力量很微弱，但终将发展成为燎原之势，取得最后胜利。从此《行行》同人社就改为《星火》同人社了。

这个时期，我们《星火》社同人虽然还没找到地下组织，但已能从间接的途径得到些中国共产党印行的刊物和材料，受到了党的影响。当时营口地区也有国民党左派人物在进行地下抗日活动，他们的思想也影响到《星火》社的同人。以花喜露为一方的一些《星火》社同人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国要走苏联的道路，实行社会主义。以于家麟为一方的一些《星火》社同人

则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国要走三民主义道路，因为中国经济还不发达，比不得苏联，只有先走三民主义然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我们碰到一起也常常由议论发展到争论，甚至有时争论得很激烈。但是最后的结论，又总是归结到反满抗日这个统一的目标上来。所以我们《星火》社同人始终是团结的。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一面疯狂地向我国关内大举进攻，一面在东北地区强化殖民统治。实行并村并屯，保甲连座；又征兵抓人，实行白色恐怖的法西斯统治。我们《星火》社同人，并没有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恶所吓倒，相反地活动更积极了，组织也不断地发展扩大。花喜露、于家麟等好多《星火》社同人，除了在我们自己办的《星火》油印刊物上发表文章，还经常地在一些日伪刊物上发表文章。当时的《大同报》、《盛京时报》、《大北新报》、《新满洲》、《地平线》和华文《大阪每日》等，都经常有我们《星火》社的联系人。花喜露的《孙二祖宗上西天》、《幽静的山谷》、《荒城的故事》；于家麟的《寂寞的城》、《小驿》、《我底歌》；我（笔名铁键）的《卖草妇人》、《贼》；王锡成（笔名夕澄）的《缝穷的姑娘》、《马路上的落叶》；郁其文（笔名铁汉）的《生之牧鞭》、《青春难驻》；噩匹的《年代》；舒啸的《雷雨》；臧品的《孩子们别了》；华青的《出走》等等都是这个时期发表在上述刊物上的进步文章。这个时期我们看到的进步作品就更多了。鲁迅的作品、茅盾的作品、巴金、老舍的作品以及更多的苏联作品，在我们《星火》社同人中广为流传。这时花喜露、于家麟、王克范（笔名矜人）、李光海（笔名铁勋）和我们研究，把《星火》同人社作为“鲁迅文学研究社”，对内自称“LS文学研究社”。进一步研究革命文学作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事迹，我们知道得更多了，我们的斗争热情受到了鼓舞。有时于家麟、王锡

成、张克恩和我晚上聚在香铺的柜房里，一唠就唠多半夜。另一些《星火》社同人李光海、王克范等也经常到香铺来和我们会面，传递书刊、传播新消息。

1939年秋天，花喜露、于家麟等《星火》社同人，通过写文章结识了《营口新报》的副刊编辑王觉（后来知道他是国民党党员）。由花喜露、于家麟和王觉联系，就把我们的油印《星火》刊物，公开移到《营口新报》副刊上。由花喜露和于家麟组稿和主编，每期出刊之前，把编好的稿件交给在营口的王锡成带给王觉，再由王觉出版。开始《星火》在《营口新报》副刊上每月出一期，由于影响逐渐扩大，根据读者的要求和反满抗日形势的需要，后来就改为半月出一期，一年多时间里，出了二十多期。这是我们活动很有成效的时期。这个时期我们《星火》社同人更多了，分布在好多地区：有哈尔滨的、双城的、奉天的、本溪的、海城的、营口的、复州湾的。以我们盖县人为最多，以盖县为活动中心。我记得名的就有40余人。还有不少《星火》社同人的亲戚、朋友、同学及学生同情支持我们的活动。《星火》这个刊物的读者，虽不能确知多少，但也可以想见是很可观的。

这时，《星火》社同人的活动，已经对敌伪构成了威胁，所以也必然引起敌人的注意和敌视。我们的活动必须更加谨慎和秘密了。为了蒙蔽敌伪特务，有的同人来找于家麟时，就先到香铺找我，以“做买卖谈生意”的身份出现在香铺里，再由我晚间找于家麟到香铺来会面。有时必须几个人集会时，也是以游山玩水的形式，坐在一起摆谈天说地的样子来迷惑敌人。这样，我们在凶恶的敌人的眼皮底下照样活动着。

1941年，花喜露突然被伪盖县教育局宣布为赤色嫌疑分子，勒令离开黄旗堡小学。以后他就不知去向了。后来我们才

知道，他和葛雷一起到了奉天（沈阳），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找到了新的工作，在奉天大东区公所做办事员。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继续进行反满抗日活动。

这时以于家麟为首的一些《星火》社同人，接受了国民党地下组织的领导，并在1941年秋经王觉和任复州湾盐务局长的李光海介绍，于家麟和我加入了国民党。那时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星火》社的同人不分党派，积极合作，进行反满抗日斗争。1941年以后，日伪特务活动更加猖獗，他们的魔掌已伸向《星火》社同人。除了花喜露被迫离开盖县以外，王觉也被敌特注意上了，他也不得不离开营口，与《星火》社另一同人李光海一起跑到了伪新京（现在的长春市）。从此《星火》停办了。但《星火》社同人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不久，一个坏消息传来，在伪新京的王觉和那里的《大同报》副刊编辑李季风一起被捕了。在伪新京的李光海、石岱宗等逃亡流落到关内。李光海在全国解放以后，到过沈阳我的家里，我对他的情况才有所了解；他逃到关内后，先辗转到重庆，后来又到了延安，继续进行抗日斗争。北京和平解放后他到了北京，在卫生部工作，文革中去世。

1942年夏天，于家麟去伪新京联系同人，了解到日伪特务大肆逮捕爱国人士的情况。回来后向我们讲述了当时的形势，日本帝国主义穷兵黩武，在做垂死挣扎，它的魔爪由中国伸到了东南亚，又由东南亚伸向太平洋，制造了“珍珠港事件”，挑起了太平洋战争，进一步激起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所以它已走上了穷途末路。可是它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对占领区进一步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所以在东北已经开始了大逮捕。于家麟告诉我们：“今后的活动要更加谨慎，更加秘密。但是决不能停止活动，敌人越疯狂，越说明了它的虚弱。”所以当时我们研究了，

在《营口新报》的《星火》副刊不能出版的情况下，要另辟蹊径，建立新的阵地。我们《星火》社同人就深入盖县一高和二高联系进步学生，在这两个学校里创办新刊物。在盖县一高以李昌毓为首的同学们创办了《大地》，在二高以臧永昌为首的同学们创办了《辰星》，继续发表反满抗日的爱国文章。

1943年秋天，为了扩大活动阵地，于家麟就找到了邻近的几个《星火》社同人研究，打算成立一个书店，暗中传递革命进步书刊，更多地联系同人，推动反满抗日斗争的发展。就在中秋节的夜晚，于家麟、王锡成、张克恩、李昌毓、臧永昌和我，聚集在王克范所在的盖县永安屯小学校，以中秋赏月为名，蒙蔽敌伪特务的耳目，讨论了成立书店和以后如何活动的问题。我们一直议论到深夜，最后决定在盖县城内大堆子，开设一个租书卖书的书店。我们租了“道德会”旁边的一间门市，请退职老商人李勤甫出面经营。取名叫“秋灯书店”，意在黑暗的社会里给人们以光明。表面上出卖出租《三侠剑》、《七侠五义》、《金粉世家》等书，暗地里收集、传递革命进步书刊。比如鲁迅的《呐喊》、茅盾的《子夜》、巴金的《灭亡》、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高尔基的《母亲》、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法捷耶夫的《毁灭》等等。又把《星火》社同人和一些进步青年组织到“鲁迅文学研究会”进行活动。于家麟和我研究了“读书研究会”分工：由于家麟总负责，王锡成作采购书刊和对外联系工作，李昌毓作一高的负责联系人，臧永昌作二高的负责联系人，侯庚芝作三高（女高）的负责联系人，我为社会青年的负责联系人。以“秋灯书店”为据点开展活动。这个时期敬馨香铺是一个秘密联系和活动的据点。因为我是香铺的会计，于家麟是香铺的股东，我们在香铺研究事，谁也不会怀疑。外地和其他《星火》社同人，要找于家麟，就扮成商人的模样，以

做买卖的名义到香铺来，使敌伪特务很难看出破绽。所以这个时期活动比较频繁，也比较顺利。当时香铺的大掌柜胡乾一老先生（他是盖县现任人大常委会主任胡秉元的祖父），是一个同情和支持反满抗日爱国活动的开明人士。他知道我们的一些活动，不但不阻拦，还提供了许多方便。后来《星火》社同人被捕，胡乾一老先生也受到了敌伪特务的刁难和摧残。

1943年深秋的一天夜里，两年前在伪新京被捕的《大同报》副刊编辑李季风，突然来到盖县，到香铺找到了我，说要见于家麟。当天晚上我把于家麟找到香铺。李季风告诉我们：他是从伪新京的日本监狱里逃出来的，要求我们设法掩护他。他向我们讲述了日本帝国主义监狱里如何惨无人道，如何迫害革命人士。和他一起被捕的王觉，已经被折磨死在敌人监狱里了。又告诉我们：他从敌人的审问中知道，日伪特务已经注意到盖县反满抗日的《星火》社组织，并把于家麟、花喜露、门文东等列入了黑名单，要我们严加防范。于家麟和我们几个《星火》社同人，就把李季风掩护起来，让他住在我们对门的张克恩家里，因为张克恩的家属没搬来，比较方便。我们又为他拔掉了有面貌特征的大包牙，使他改变脸型，让别人不易认出他来。可是事不凑巧，没到一个月，张克恩工作的伪兴农合作社仓库被盗，张克恩本人被伪警察局监禁起来。日伪特务要到天台街张克恩家里来搜查。我们得到消息后，怕暴露李季风，就赶紧把他送到海城曲舒两家，最后由王锡成把他送到沈阳花喜露家里，求花喜露设法掩护他，花喜露当时就答应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花喜露这时已经是地下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他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把李季风转移到一个矿山上隐蔽起来。当时花喜露对王锡成说：“你们把李季风交给我吧，不过为了防止意外，希望你们今后就不要再和他接触了，以免暴露。”后来李

季风又出来活动，再次被日伪特务抓进了监狱，直到日本投降后他才和我们一起被营救救出狱。出狱后我们和他见面时，他经常骂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当年的8月他在沈阳小河沿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1944年4月28日，花喜露在沈阳被捕入狱了，关押在伪“奉天第一监狱”。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组织来函，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件事是日本投降后我才知道的）。他在日伪的监狱里经受了8个多月的审讯，被敌人酷刑折磨得昏死过去十多次。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保守了党的机密。花喜露被捕时，我们在盖县的《星火》社同人并不知道，事先也没得到消息。不过从当时敌特活动频繁的迹象中，我们感觉到空气的紧张。所以在5月初，让王锡成到沈阳去探听一下消息。王锡成一到沈阳花喜露的家里，就感到气氛不对劲。他没看到花喜露，而花喜露的爱人王丹群刚刚分娩六七天没人照顾。还没等王锡成问，王丹群就急忙告诉他说：“你赶快离开这里，田贲被捕了，我家的周围有特务监视着，你赶紧回盖县通知《星火》社同人快隐蔽起来。田贲临走时说：‘争取捕到我为止。’”王锡成急忙回盖县通知我们，可是已经来不及了。1944年5月初，日伪特务在盖县对《星火》社同人开始了大逮捕。有不少人因为我们还没来得及通知到，没等隐蔽就被捉去了。于家麟和我虽然得到王锡成带来的消息，但还没等离开天台街，当天傍晚日伪特务就到了天台街，把于家麟院子的大门堵住。多亏了于家麟从后墙翻出去，跑到香铺告诉了我，我们才分头逃离天台街。日伪特务当时没有捉到我们，就把我们的家属抓进了伪满盖平县警察署关押起来。于家麟的母亲、姐姐、爱人和一个吃奶孩子和我的家里人都被抓去了。王锡成的老岳母也被特务打伤。这就是日伪反动派使用的株连九族的残酷手段。我跑到城东门屯，后来

被特务抓到，于家麟跑到东山冯连仲家里，也被特务抓到。就这样没出一个月，在盖县的《星火》社同人大都被捕了。我清楚地记得，在于家麟、王克范被捕后，当天就用布袋子套住了他俩的头，从警察署的院子押出去，送到伪“奉天第一监狱”去了。而我和张吉宽、王锡成、张克恩等30多个《星火》社同入及一些家属，就被关押在伪“盖平县警察署警务科留置场”里审讯。这时于家麟和我的家属被放回家了，日伪特务这是在要阴谋诡计，因为他们了解到，有些外地《星火》社同人到盖县来，多半是找到于家麟或我的家，特务想用我们的家属作诱饵，来抓其他人。

这次在盖县被捕的《星火》社同入，还有下列人员：孔庆举、许默语、许庆春、李勤甫、鲁启智、李昌毓、臧永昌、郁其文、杨世绵、李吉升、李吉恒、赵廷魁、张文廷、高玉元、门恩义、王盛伦、于恩惠、周建涛、王德祥、赵怀范、迟金镇、穆玉琪（女）、侯庚芝（女）、姜竞芳（女）、赵俊芬（女）等。还有一些受牵连的人。

经过一段残酷的刑讯之后，剩下的一些家属和受牵连的人也都被放出去了。我们这些《星火》社同入就被送到伪“奉天第一监狱”关押起来，继续刑讯。在将近一年的匪刑拷打逼供中，很多人坚强不屈，在审讯中和敌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罪行，痛斥他们残害中国人民，抓劳工，抓“经济犯”，抓“政治犯”，抓“思想犯”等种种罪恶。在伪“奉天第一监狱”里，审讯我的是日本上田警佐和翻译金朝太以及一些打手。他们穷凶极恶到了顶点。有一些刑法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毛骨悚然，可当时都挺了过来。压杠子把迎面骨都要压裂了，直到昏过去才放开。我先后三次被拴着大拇指吊起来，只有脚尖点地，还用皮鞭子抽。我的大拇指因此残废

了。关节长死不能活动。每个《星火》社同人都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有一些同人被折磨死在敌人的监狱里，每当想起他们我心里总是非常难过的。在日伪“奉天第一监狱”里，先后有王克范、许默语、许庆春、门恩义、王盛伦、李勤甫、杨伯甫被折磨死去。最后敌伪以“治安法违反，出版物违反”的罪名，对《星火》社同人中的11人定罪判刑。其余的人以假释的名义放出来监督。被判刑的11人有：于家麟、张吉宽、花喜露、王锡成、张克恩、鲁启智、郁其文、李昌毓、迟金镇、臧永昌和我。每个人判多少年徒刑，事先都分别地通知了个人。后来从敌伪的档案材料中看到：于家麟被判处死刑，张吉宽20年，花喜露、王锡成15年，其余的10年到5年不等，我被判了无期徒刑。就在1945年8月16那天，一早看守警就把我们叫出去，叫我们到候审室去。那个伪警奸笑着说：“你们的案子出头了，高等法院今天对你们宣判。”我们11个人第一次在敌人的监狱里碰到一起，每个人的脸上即没有笑容，也没有愁容，更没有害怕的样子。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伪警不准我们说话。当时其他人判什么样的刑，互相都不知道。但我知道自己被判无期，估计其他人也轻不了。特别是于家麟，我们都替他担心。他离我较远，我们无法言谈，我看到他的面容消瘦、焦黄，本来就矮小的个头显得更小了。可他的眼睛很有神，多次注目地看着我，似有很多话要说。就这样，我们一直等到中午过后，快到下午一点多了，也没叫我们去听判决。我们心里都感到奇怪，也有些紧张，不知敌人要耍什么新花样。这时一个伪警走进候审室，又似讨好，又似无可奈何地说：“你们拣着了。”这个消息尽管在我们的心里早就期望着，并且确信终有一天会到来的，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突然。所以刚一听到，都有点惊呆了。可是在我们惊愕片刻之后，大家全明白了，一下子跳起来，喊起来，互相拥

抱起来。这时的伪警也夹着尾巴只是说好听的话。有的人当时就想往外走了，那个伪警就再三地表示歉意地说：“还得委屈大家一下，请先回监房，可能需要办些手续才能放。”我们又被送回了监狱。

1945年8月19日，我们11位《星火》社同人和其他一些“政治犯”被营救出狱了。这个胜利是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与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八年、在东北则是奋战十四年而后取得的。我现在还记得那时爱唱的一支歌：“五月的鲜花，开遍了田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的奋战不息！”花喜露同志出狱时，被敌人折磨得都难以行走了，是《星火》社同人把他背送回家的。由于伤势过重，回家后虽多方求医治疗，终因无效而于1946年6月13日不幸逝世，终年34岁。我们失去了一个好同志；盖县的家乡父老失去了一個好儿子；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個好党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1981年12月份，由国务院民政部委托辽宁省人民政府，追认花喜露同志为革命烈士。1985年，辽宁省人民政府又追认王克范为革命烈士，尽管他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党员。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对为革命而牺牲的人士，不论是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只要为人民做了好事，都承认他们的功绩，这使我深受感动。这对九泉之下的花喜露、王克范以及其他死在日本帝国主义手里的《星火》社同人，都是一个慰藉。对我们活着的人以及我们的后代也是一个鼓舞。

（摘自《营口文史资料》第七辑）

关沫南与“左翼文艺事件”

于 堤

闲谈中泄露了机密

关沫南，笔名关雁，当年28岁，是哈尔滨《大北新报》的记者。他具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和坚定的爱国志向。关沫南利用文艺宣传阵地，联合起进步作家和一批爱好文艺又颇具爱国心的青年知识分子，经常在伪满各报刊、杂志上，发表许多暗示反对日伪统治政权性质的作品，宣传鼓动东北青年要振奋起来，同日本侵略强盗作针锋相对地斗争。

关的文艺作品，尖刻泼辣，针对性强，且能联系斗争实际，因此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普遍赞扬和拥戴。由于他联系了一些进步作家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又拥有一批与他息息相通的热情读者，就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左翼文艺团体，秘密进行着反满抗日的宣传活动。

1941年6月，一天，哈尔滨公共交通公司女售票员潘素兰与宋敏闲谈家常时说：“道里石头街有个摆书摊的山东人叫王忠生，与《大北新报》记者关沫南往来密切，关常到他那里买书，他们还可能有秘密工作关系。”这些无意中的闲谈，却被站在她们身旁的李蕴伟听到了，并有意地把这件事记在心里。下班回家后，李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她的丈夫左立元。左是当时伪哈尔滨市警察厅特务科特务宋一夫和金丽珠利用的“密侦”。左立元遂将这一重要情报密报给警特宋一夫和金丽珠。

在此之前，伪哈市警察厅特务科，在文艺书刊检查中，就发现了在哈尔滨的文艺刊物上，有一些左倾作品，其内容带有影射攻击现实的东西。他们发现在这些作品的作者中，有人还去过华北游击区，因此引起了敌特的注意。于是决定将关沫南纳入侦察视线，对关的行动以及和他交往的关系人，暗中进行跟踪监视并布置“密侦”进行秘密侦察活动。

伪警特接到“密侦”左立元的情报后，觉得“案情”有了突破，随之对这个摆书摊的人进行了调查。

原来这个在道里石头街摆书摊的人叫王忠生，原籍山东人，他通过老乡回关内探亲的机会，从关内书店给他购买一些书籍带回，其中有些进步书籍在当时的哈尔滨是买不到的。关沫南常到这个书摊看书、买书，久而久之，他与王忠生就混熟了。此后，王凡是购进新书，就通知关来买，两个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伪哈尔滨市警察厅特务科，为了从王的身上打开缺口，获得“证据”，扩大线索，决定将王忠生逮捕。经过对王的严刑拷打和突击审讯，从王的口供中获取了有关关沫南的活动情况，并得知与关密切往来的王光逖（笔名金明）、刘国兴（笔名陈隄）和温成钧（笔名艾循）等人的思想动向。

王光逖被捕

敌特机关经过一番侦察后得知，与关沫南交往密切的王光逖“嫌疑”重大，将其列为重点，以掌握他的全部情况。

王光逖，男，当年28岁，黑龙江省人。早年在哈尔滨《大北新报》当记者时，结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思想很进步。在彼此交往过程中，启发王光逖说：“写文章不要写风花雪月派的无聊作品，这样做，不能鼓舞人的斗志。应当描写社会现实，暴

露社会的各种矛盾，这样你的作品才有价值，有份量。”王在这位朋友的启发下，写作态度开始倾向于左翼作品了。经过一段时间，那个朋友又鼓励他投笔从戎，直接参加抗日活动。王接受了他的动员，毅然离家出走，到了河北省枣强县，参加了群众抗日工作。他从事编写群众识字课本，教群众读书识字，宣传抗日等活动。

王光逊在华北参加抗日期间，正值日本军队开始大扫荡，斗争环境相当艰苦，再加上生活困难，缺吃少穿，王有些克服不了，开始动摇了。最后他竟然离开火热的抗敌战场，只身返回东北家乡。在家中闲呆了一个时期，发现敌人监视他，怕遭逮捕，又跑到了上海。在上海组织一个杂志社，发行文艺半月刊。

王在上海期间，曾打算去四川抗战基地，访问巴金、茅盾等名作家，想要拜师求教，学习写作，锻炼斗争本领，但因日军封锁很严，交通阻塞难以通过，没能如愿以偿。此时又接到家中来信，说妻子将要临产，催其火速回家照料。当时在上海生活艰难，靠稿费的微薄收入，日子也不好混，他从上海又返回哈尔滨家中。在家闲呆期间，常与关沫南往来，他们在一起谈论形势，研究文艺作品的发展方向，蛰居在家，等待时机。

王光逊得知摆书摊的王忠生被捕消息后，自感事机不妙，自己有被捕的危险。正当准备行装，欲动身逃往关内的前一天夜里，他的行动被伪哈市警察局特务科察觉，被立即逮捕。关押在哈市道里中央大街松花垫，这是一座专为政治犯设立的临时监狱。

关沫南等人被捕

1941年12月30日深夜，由伪哈尔滨市警察厅特务科特高股长泉屋寅吉率领，警特蔡金声、金丽珠（朝鲜族、原系中共

党员，叛变后当了伪警尉）和王蕴璞等人闯入关家，将关沫南逮捕。“罪名”是“哈尔滨左翼文艺事件”。在哈市关押几个月后，押送长春市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监狱，与李季风并案侦审，同时对关采取了“怀柔政策”，直至“八·一五”光复后获释。这天遭到逮捕的还有：

刘国兴（笔名陈颀），当时是哈尔滨南岗小学教员。受进步思想影响，曾写过不少爱国倾向的作品，暴露现实社会各种矛盾。与关沫南有往来关系。他还去过山西潞安县探望姐姐，为此受到敌特的监视。被捕后在哈市政治犯监狱关押了一段时间，后与关沫南一起解送长春市伪首都警察厅关押审讯。被送敌伪新京高等法院判刑。

刘鸿云（笔名问流、血流），黑龙江双城县人，系哈市道里伪税捐局职员。经常投稿，抨击现实，阅读进步书籍，与关沫南有往来关系。

温成钧（笔名艾循），哈尔滨市《大北新报》记者，经常发表文艺作品，抨击影射现实，关押审讯期间，受重刑折磨致死。

韩道城（笔名牢罕），山东省人，回族，哈尔滨市《大北新报》记者，被捕后关押在伪哈市警察厅特务科特设的政治犯监狱，受尽了酷刑摧残。

王孝慈（笔名李默），哈尔滨市伪《康德新闻社》编辑。常写带有左倾的文艺作品，与关沫南有往来关系。被捕后关押在伪哈市警察厅特务科监狱，受到了严刑审讯。

潘素兰（又名潘步伟），女，哈尔滨市公共汽车公司售票员。因她认识关沫南，在与宋敏唠家常时，无意中透露关常到摆书摊的王忠生处买书等情况，被敌特所知觉，为避免她将此事泄露出去，并想从她口中得到更多线索，将她逮捕关押，突击审讯，施以严刑拷打。

宋敏，女，哈市公共汽车公司售票员。与潘素兰同样原因，被捕入狱。

（摘自《长春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

追忆金剑啸同志 在齐齐哈尔的战斗生活

田 琳

《荒 田》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齐齐哈尔，是一个贫穷落后、偏僻的塞北小城。人民被蹂躏，在痛苦中呻吟……

1934年，无产阶级文艺战士金剑啸同志，冒着狂风暴雨，来到了齐齐哈尔。他在《黑龙江民报》扎下了营，主编副刊《荒田》，面对着敌人的刀丛，勇敢地坚强地开始了战斗。

《荒田》是黑龙江省第一个文艺副刊，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红色副刊。

那时，我还在黑龙江省女子师范读书。我们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志在图书馆，肩并肩抢读着《荒田》，刊头是金剑啸同志刻画的：一块荒芜了的田地，一个青年高举着一把铁镐在耕耘。我们为这《荒田》的诞生高兴、激动，这是我们像沙漠一样干枯的生活中的一块绿洲，是我们像沙漠一样干枯生活中的一股泉水。

从此，我们常常到图书馆去读《荒田》。

在《荒田》中我们可以读到金剑啸同志介绍的进步文学，例

如，苏联高尔基的作品。我们也读过金剑啸同志写下的火焰一般的诗篇：《布谷鸟》、《兴安岭的风雪》和话剧《黄昏》等，他那充满战斗激情的诗句，一下子把我们青年一代的心照亮。

《芜田》也是一块绿色的园地，培养爱好文学的青年写作。各校的爱文学的学生纷纷向《芜田》投稿。我的第一篇用晓希笔名发表的《招魂》，就是金剑啸同志亲手定稿，在《芜田》刊出的。除我而外还有一些人，其中“努力”（白拓方）、“关山”、“兰玲”（牛坤青）等同志都是在金剑啸同志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发动青年学生读进步书籍

金剑啸同志不畏惧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刺刀和镣铐，他到各校校刊编委会去发动青年学生读进步的书籍。

我们女子师范学校是金剑啸同志通过教我们语文的徐老师发动读进步书籍的。徐老师在他的课堂上，让学生读自己借来的书。我们从图书馆借来的进步书，课堂里读课外也读，已经形成了热潮。

后来大逮捕时，黑龙江省男子师范学生大傻（他的真名不清楚，这是他的笔名）被捕，当时他的裤袋里还揣着一本金剑啸同志借给他的高尔基的《母亲》。

这进步的书籍，就是火种，是金剑啸同志撒下的火种，在青年们心中燃起了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向往自由理想世界的熊熊烈火……

“白光剧团”和演出

北风在呼啸，大雪在飘落，金剑啸同志在齐齐哈尔大街小巷奔走，他到一些进步的文学爱好者家去组织“白光剧团”。

那是1935年初冬的一天，飘飘扬扬落着鹅毛大雪，金剑啸同志披了一身雪来到广来小学校找我。他高高的个子，穿一件黑呢子大衣，系一条雪白的围巾，披着长发，戴一副黑色宽边眼镜，样子十分潇洒。他从大衣袋中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我一看上面写着“金剑啸字巴来”，官衔上写着“黑龙江省民报副刊《芜田》主编”。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见面（虽然我的一些幼稚的诗是由他修定发表的，他也曾给我打过电话商量稿子，但我们还没有见过面）。我高兴地把 he 让进会客室（会议室），在一条长桌子旁，我们坐下谈着。他很文雅也很严肃，悄声地和我说：“我来找你参加我们的白光剧团。”我不太愿意去演戏，但又怎能拒绝这位我尊敬的文学上的老师？我思考着，斗争着，犹豫不定，他等着我肯定的回答。那时我很幼稚，哪里知道他是一位地下工作者、共产党员，更哪里知道“白光剧团”是个革命的宣传队，终于我作了使他失望的回答：“我考虑考虑，和父亲商量商量！”

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我看得出他不太满意。我把他送出门外，看他的身影在迷漫的雪雾中消失了。

听说金剑啸同志很快就把“白光剧团”组织起来了。团员是一些进步的青年。金剑啸同志又编剧又导演又是舞台设计，他可能也是演员。他们排练了好几个剧目：《钱》、秋田雨雀的《喜门冬》、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和他自己写的《母与子》、《黄昏》。

一天，金剑啸同志又来到我们广来小学校，他高兴地告诉我：他们的“白光剧团”要演出了。他来给我送张票，并再三叮咛我：“你一定要去看我们演的剧！”

那天夜晚，我冒着北风，踏着积雪，去黑龙江民报社礼堂看剧，进去时，剧场已经坐满了人。那夜观众很多，大部分是

些学生和工人，窗台上、过道上都挤满了人。

记得那晚上演出的剧目是《钱》、《母与子》（也许是《黄昏》）。导演、舞台设计都是金剑啸同志。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演出，从舞台设计、化妆到人物表演都极逼真生动，给我的印象也极深，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一个剧的内容是：在一个黄昏，母亲病得垂危，儿子焦急万分，想给母亲抓药治病，但手中没有一文钱，一阵叮叮当当的敲门声，接着几个警察破门而入，把儿子双手上了铁铐带走了。母亲疯狂地张着双手，在床上喊叫着儿子，听到一阵犬吠声，接着响起一阵枪声，那是打死儿子的枪声。母亲悲痛地在枪声中死去了。

另一个剧是《钱》，内容是：在一个贫民窟里，挤住了一帮颠沛流离的人们，都贫穷得一文钱没有，睡在地下。一个人（记得是修鞋匠）的远方的母亲死了，他借到一笔钱，想给母亲买棺材。可是这笔钱却被人偷去了。一帮睡着的穷伙伴们惊醒起来帮他找钱。谁偷去了这买棺材的钱呢？就是同屋的那个小偷偷去了（记得大致是这样，也许有出入）。

看完了剧观众都很感动，一面往出走一面纷纷议论：“什么世道，富人极富，穷人极穷！”

北风呼啸着，夜漆黑。我在回家的路上还为剧情所激动，在思索着：

“为什么人这般的穷？为什么？”

金剑啸的画展和他的一幅画

金剑啸不仅写诗、写剧，他还是个画家。他虽没有成名的画，但他的画有很强的战斗作用。在哈尔滨他在抗敌传单上面画许多打倒日本侵略者的画和漫画。他的画，幅幅都是摧毁日本

帝国主义、摧毁旧世界的重型炮弹。他在齐齐哈尔画了许多思想性战斗性很强的画，并举行了一次画展。

1935年下半年，我已经辞去了广来小学校的职务，也停止了往《芜田》投稿，在家埋头准备功课考大学。我不知道他举行画展，只是后来从他给朋友蕴璧的一封信里才知道。他在信中写道：我的美术展览，已经准备虎皮斑斑，还有几幅即将完成，定于×月×日公开展出。我也没去看他的画展，但听他对他的朋友说过：“我要画使人胆裂的画。”猜得出他的画一定像柯勒惠支一样，在他的画里没有山水，也没有花鸟，一定都是描绘无产阶级的痛苦和失望，一定都是鼓动人民起来推翻旧世界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画。

我曾看见他的一幅画：

那是一片波浪汹涌的大海，天空上挂着被乌云遮去半边的苍白无力的小太阳。大海上飞翔着一群海燕，那海燕嘴中衔着利剑。在海浪上飘荡着一叶小舟，在船头上，有一位被狂风吹乱了头发的射手，正拉弓射那乌云遮去半面的太阳。我一下子认出这幅画的主题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从监狱中带来的消息

1936年春，齐齐哈尔充满了日本帝国主义血腥镇压的恐怖气氛，抓人的电驴子（那时电驴子是日本鬼子抓人用的）突突地响着。齐齐哈尔乌云滚滚，人心惶惶。金剑啸同志离开了齐齐哈尔，又转移到哈尔滨。他在哈尔滨又开始了战斗。1936年6月，由于在《大北新报画刊》上登了一条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病重的消息，因此在哈尔滨被捕了。酷刑之后被押回了齐齐哈尔，关在齐齐哈尔的铁牢里。

这时齐齐哈尔也在大逮捕。一天在我们院的门前停了一辆

抓人的电驴子，抓走了我院的黑龙江省民报社社长和一位体育教员。

过了些日子，听母亲说被捕的那位体育教员从监狱放出来了。我跑到他家去打听金剑啸同志的消息，他高兴地讲给我：金剑啸很好，他很乐观，也很坚强。

金剑啸虽然戴着镣铐，带着敌人鞭打的伤痛，他还在监牢里教难友们唱海燕之歌，教难友们普希金的诗。

我问：“监狱里有普希金的诗集吗？”

他说：“没有，是金剑啸背下来的，他能背不少普希金的诗，他一句一句地背，一句一句地教，他一首一首地背，一首一首地教。”

我问：“你也学了吗？”

他说：我在隔壁听不清，也背不会，只听到这样的句子：

我们飞去了吧，是时候了，
我们原是自由的鸟儿，飞去吧，
飞到那乌云的后面明媚的山峦，
飞到那里，到那蓝色的海岛，
只有风在欢舞，还有我在作伴。

这是普希金的《囚徒》诗。

金剑啸同志不是在教诗，他是在战斗，在监狱中，还在继续战斗，那是宣传鼓动“囚徒”们为自由而斗争的号角。

金剑啸同志光荣就义

“金剑啸同志光荣地就义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在齐齐哈尔传开！

那是1936年8月15日，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刽子手，把金剑啸同志从铁牢里提出来，他戴着镣铐被押上囚车，驶向齐齐哈尔。

哈尔北城门外的刑场。他牺牲时年仅27岁。

(摘自《齐齐哈尔文史资料》1986年第二期)

地下文艺哨兵——白朗

老 爽

白朗^①说：“我这粒革命种子，是萌芽在哈尔滨的土地上，松花江是我的奶娘，抚育我成人的是党……”

的确，白朗虽然出生在沈阳，生长在齐齐哈尔，可是哈尔滨却给她留下了永远也磨灭不掉的印象。她在这里接受了马列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同罗烽一起战斗在抗日反满的第一线上，为民族独立，为祖国解放，贡献出一定力量。同时也把她从一个软弱的知识青年陶冶成坚强的共产党人，无产阶级文艺战士。

白朗本姓刘，原名东兰，1912年8月2日出生在沈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祖父叫刘子扬，是当时沈阳城里一位有名的老中医。因为他医术高明，被黑龙江省督军吴大舌头（俊升）聘请去当了几年军医处长。全家也随同祖父从沈阳搬到了齐齐哈尔。

白朗11岁时，不幸父亲故去，未几，祖父又被辞退，不久就逝世了。从此，家庭生活一落千丈，陷于困境。这在白朗的心灵上造成很大创伤。由于家庭突遭变故，生活越来越困难，使

^① 白朗同志曾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从事专业创作，现已离休。

她深深感受到人世的炎凉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的黑暗，逐渐产生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

白朗18岁时，和表兄罗烽结婚并随罗烽从齐齐哈尔来到哈尔滨。当时罗烽在呼海铁路局任职，已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担任北满成立的一个产业支部——中共呼海铁路特别支部宣传委员。工作非常忙，日夜不着家。后来白朗在罗烽的引导下，开始帮助罗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刻写钢板、油印传单，传递宣传品，保管党内的文件和材料等。

“九·一八”事变后，地下党的活动更加隐密和频繁了。白朗竭尽全力地掩护罗烽的工作，为他们开会站岗放哨，印刷抗日反满宣传小册子。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从沈阳迁到哈尔滨。罗烽担任满洲省委候补委员，中共哈尔滨市东区（道外）区委宣传委员，直接在杨靖宇等同志领导下开展抗日反满宣传工作。主要负责复印中共中央文件、印刷宣传品、传单、出版油印的抗日反满小报。印刷机关就设在罗烽家中，白朗自觉自愿参加党的地下工作。

同年夏天，国联派以英国李顿为首的五人“国联调查团”来哈尔滨，调查日本侵略东北的问题。这个“国联调查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名义上是来调查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事实上是为日本侵略东北开脱罪责，使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合法化。为了揭露“国联调查团”的阴谋，打掉部分群众对国际联盟这个帝国主义御用工具所抱的幻想，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杨靖宇同志亲自到东区区委（道外七或八道街一间修鞋的小屋子）召开会议，发动群众示威游行，散发传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罪行和“国联调查团”的政治阴谋，并决定扩大发行罗烽主编的秘密地下小报。白朗积极热情地参加了这个活动，日夜刻写钢板，印刷宣传品，在反对“国

联调查团”的群众运动中成为地下党的可靠帮手。

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白朗的阶级觉悟和民族意识提高得很快。1932年秋，她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抗日反满外围组织“反日同盟”，成为哈尔滨妇女界最早出现的抗日反满女战士中的一员。

1933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与哈尔滨市委鉴于当时的斗争需要，为了配合抗日反满的武装斗争，决定加强抗日反满的政治宣传工作，扩大党的文艺宣传队伍，采用各种文艺形式和方法对群众进行宣传，启发广大东北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民族意识，并指示利用敌伪的报纸创办党的文艺宣传阵地。杨靖宇同志决定由罗烽、金剑啸共同完成这项任务。

不久，白朗在党组织的授意下，考入哈尔滨《国际协报》当记者。4月间，《国际协报》副刊主编林郎（即方曦）被党派到苏联去学习，由白朗接任。白朗接任《国际协报》副刊之后，除每天出半版文艺副刊《国际公园》之外，还出版《体育》、《妇女》、《儿童》等周刊。白朗把各地寄来的稿件携带回家去，晚上同罗烽一起审阅编排稿件。这不仅为东北抗日爱国进步作者开拓了一块园地，同时也培养发展了党的文艺队伍。萧红就是在白朗主编的《国际协报》副刊上，发表她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从此开始踏上文坛，从事革命文学创作活动的。

白朗除了主编《国际协报》副刊以外，还积极参加了罗烽和金剑啸组织并领导的“星星剧团”。这个剧团属于党领导的半秘密性质的左翼文艺团体，它以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文艺作者为基础，适当地吸收一些爱国进步知识青年。罗烽负责组织和领导工作，金剑啸负责导演兼与白涛搞舞台设计。萧军还为剧团写了“团歌”（金剑啸谱曲）。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先后排练了三个话剧，有美国进步作家辛克莱的《居住二楼的人》（又

名《小偷》)、著名女剧作家白薇的《姨娘》、白涛的《一代不如一代》(又名《工程师之子》),白朗扮演第一剧组的女主角。大家演出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像黑夜中的星星那样,以自己“微弱的光辉”给沉闷“枯寂要死的哈尔滨”带来一点生气,并“为全哈尔滨的戏剧界开辟一条荒棘的素无人迹的前路”,使正在日伪黑暗统治下的哈尔滨人民得到一些“益处和美感”(洛虹《从星星剧团的出现说到哈尔滨戏剧的将来》——作者注)。他们从政治教育出发,不计较个人的成功或失败、别人的议论或攻击,风雨不误,按时到道里炮队街的民众教育馆去进行排练。

在创建星星剧团的同时,即1933年8月,在伪满新京黑夜沉沉秋风飒飒的上空,出现了另一颗“星星”。它就是以党为领导,以哈尔滨一批革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为核心,通力合作所创办的《大同报》文艺周刊《夜哨》。《夜哨》周刊在同年12月24日被迫停刊,总共出了21期。萧红和白朗是《夜哨》周刊的主要撰稿人,几乎每期都有她俩的文章。白朗在《夜哨》周刊上发表的作品有小说《祇是一条路》、《叛逆的儿子》、《悚栗的光圈》等。只《叛逆的儿子》这一篇小说,就连载了11期,在读者中留下很深的印象。从此她和萧红同时成为东北文坛上著名的青年女作家。

《夜哨》周刊被查禁以后,经党的安排,白朗用主编《国际协报》副刊的便利条件,又在该报上创办了《文艺》周刊的每期一整版,约8000字。为了不引起日伪文化特务机关的注意,决定原来在《大同报》、《夜哨》周刊上经常供稿者,一律更换新笔名。《文艺》周刊自1934年1月18日问世,至同年12月27日被迫停刊,总共出48期。白朗用新笔名“弋白”写的中篇小说《四年间》,在《文艺》上按期连载。这一时期北满的左翼革命文艺创作,得以空前的发展。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东北全境之后，开始腾出手来抓人的思想意识。他们利用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一面强化奴化教育，一面加紧实行法西斯统治，颁布了所谓《康德新闻法》，实行“思想取缔”政策，严格控制东北人民的言论和作家的创作。如有违犯，轻者被逮捕入狱判刑或送往“思想矫正院”长期监禁；重者被送上绞刑架或断头台。在日伪反动当局的高压政策和白色恐怖下，东北作家队伍纷纷瓦解。有的变节投敌，充当日伪文艺汉奸或特务，为日伪的反动统治歌功颂德；有的被敌人的反动气焰所吓倒，胆怯弃笔，改从他业，从此再不敢沾文艺的边；有的改变手法，坚持抗日反满斗争，即使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也不肯失掉民族气节和背叛革命，想方设法逃出东北，流亡到关里去，坚持从事抗日反满文学活动。萧红、白朗等都属于后一类的革命作家。

1934年春，罗烽在白朗主编的《文艺》周刊上发表了一首讽刺伪满洲国建国的诗歌《晒黑了你的脸》。哈尔滨伪警察局长便几次打电话给白朗，向她提出警告和威胁。6月18日，罗烽终因叛徒告密被日本特务机关逮捕，白朗也被日伪特务监视起来。

可是，白朗毫不胆怯。她一边到处奔走，积极设法营救罗烽，一边坚持自己的工作，每天按时编发《国际协报》的副刊和各个周刊。后来终因劳累过度流了产。就是这样，她也没放弃党所领导的这块文艺阵地。她让别人把稿子送回家来，躺在床上审阅、编排。

1935年初，经过党组织的多方营救和呼海铁路同人募捐，买通特务机关的上下人员，罗烽才被定为共产党嫌疑犯，经保释出狱。为了不再落入敌人的魔掌，同年5月间，在朋友们的掩护下，白朗和罗烽秘密离开哈尔滨到了上海。

白朗在哈尔滨期间，始终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秘密的或公开的文艺宣传工作，她不愧是一个地下文艺女哨兵。她以自己的行动，为哈尔滨妇女运动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摘自《哈尔滨文史资料》第七辑）

李季风越狱记

于本厚

度蜜月，夫妻双被捕

1941年12月31日深夜11点多，住在长春市西三马路福丰旅社二楼的新婚夫妻李季风和他的妻子李坤影刚刚入睡，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刚要起身问个究竟，由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监督警尉田中贞夫率领的吉田、新保及关忠显、张德等5个日伪特务已经闯进屋内。他们不容分说，将李季风捺在床上，带上手铐。接着便是翻箱倒柜，进行“家宅搜查”。凡属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大众哲学》和鲁迅、巴金、茅盾及苏联文学作品等均装入李家的皮箱或用床单包起来，然后将李季风用黑布蒙眼，推上三轮摩托车拉走。接着又进行第二遍搜查。最后，连李坤影也推上小汽车押走。李季风夫妇被关押在伪首都警察厅后院小红楼（现长春市公安局后院的办公楼）上。这是一座专门拘押“政治犯”的秘密监狱，高大的围墙上，架设着电网，戒备森严。

反满抗日，用笔作刀

李季风原名李福禹，笔名季风、季疯、方进等。1917年生

于辽宁省辽阳市郊窠双树村的农民家庭。他幼年丧父，兄弟4人，排行老三，因性格倔强，家人送他绰号“三倔子”。

1926年入窠双树村小学念书，1929年入辽阳市西关新民小学念高小，1931年因学习成绩优秀，越级以第一名成绩考入辽阳市第二中学。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被迫停学回家。1932年去察哈尔省寄宿大哥家中读中学。此间，在《大公报》副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自由的小鸟》，崭露头角，显示了他的文学才华。后因忍受不了大嫂的虐待，当年秋天辍学返回辽阳家中。在辽阳县立一中插班读中学三年级，因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再度辍学。

1933年秋，当地伪村公所要录用他当主事，他不愿给日本人干事，绝然放弃这个“美差”，遂去辽阳县城老东市，以摆摊摊收入糊口。此间，常书：“读史易发感慨泪，吟诗徒有奈何情。”藉以抒发其爱国有志，救国无门的忧愤。1935年春返回乡里，给本村老中医杨绍伯先生拉药匣子（中药调剂员）。此间，与杨老医生的亲戚李荫余相识后，彼此关系密切，李是爱国青年，民族意识浓厚，不甘心留在东北当亡国奴，遂约李季风去北平谋职，藉机寻找政治出路。

他们抵达北平后，不巧，要投靠的那个人，因党派之争不久前被捕，扑个空。从此，李季风便流落于北平。政治上的失望，生活上的困窘，逼得他走头无路，曾两次想自杀均被人相救而未遂。他为了活下去，在北平街头靠卖字画维生，艰难度日。

1937年春，考入北平警官学校，入学不久，“七·七”事变发生，李季风毅然参加了抗日救国军，在北平城郊打了几个月游击，由于敌众我寡，队伍被打散，他决定返回辽阳老家。

当时山海关为“国境口岸”，把守甚严，凡出入关者，必须

持“出国证”方得放行。李季风既无“出国证”，又无钱购买火车票，遂冒险用“挂钩”的办法，偷乘货车夜渡山海关。因时值寒冬，在敞车上将右耳朵边冻掉一圈，留下了疤痕。

1938年初，李季风回辽阳后便到同学开的虹光电业社当店员。两个月后，经人介绍到长春市《民生报》社当校对员。

1939年，李季风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昙花一现》在伪《大同报》副刊连载；继在《新满洲》月刊第一卷8—12月各期，以磊磊生笔名发表了《贫穷与犯罪》等6篇作品，李季风的这些作品，博得伪《大同报》编辑孙鹏飞的赏识，推荐他任该报副刊编辑兼《消闲版》主编。

通俗小说《昙花一现》出版后，震动了东北文坛，受到读者的喜爱，畅销各地。

李季风依靠文艺阵地，以笔作刀枪，在作品中，仿效鲁迅的手法，用词泼辣、尖刻，敢于揭露、抨击现实，字里行间蕴藏着宣传反满抗日的民族意识和思想启蒙的内容，因此深受东北爱国青年的钦佩和赞颂。

李季风针对社会现实，自1939—1941年间，以季风、季疯、李宜生、磊磊生、亦醉、方进等笔名，在伪《大同报》副刊、《麒麟》、《新满洲》和华文《大阪每日》等报刊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婚姻之路》、《独语——写给〈婚姻之路〉一读者》、《路》、《结婚前后》、《青春之献》、《没落》、《夜》、《别》、《在牧场上》、《杂感之感》、《生活的一课》以及《愿她为人群献身》等长短篇小说、散文、杂谈等十部（篇）和广播剧《在地下室中》。李季风喜爱旧诗，此间，还以磊磊生笔名，发表了旧体诗多首。

在《杂感之感》中写道：

“……他们永远不盲从，不阿谀，不苟合，他们有绝对的信

心，可不是臆度的武断，他们有固执的理念，可不是虚无的梦想。虽然是周遭的鬼域，虽然有着进路的坎坷，他们决不恐怖，决不犹豫。”

在《生活中的一课》中写道：

“一个文学者的伟大的生命，全在于那把自己的血肉与身心交给那广大的群众。”

在华人《大阪每日》发表的短篇小说《在牧场上》，指责汉代苏武留胡受辱19年之久，没有奋起反抗，无所作为，虚度了青春年华。告诫读者：“苏武不可法，不要忍辱负重。勇敢地站出来，同顽敌拼搏。”他还在《不以成败论英雄》和《有志者事竟成》的杂文中，向读者介绍马、恩、列的事迹。

李季风的散文汇编成集，名为《杂感之感》，由长春益智书局出版，深受读者喜爱，畅销一时。

到了1941年春天，李季风的声誉和他的作品，风靡一时，素有“东北小鲁迅”之称。当时他仅24岁。

同年8月，李季风被聘任伪军事部《干城》杂志（伪军权威性杂志）名誉嘱托，月薪伪币250元。但他没因受此高薪厚禄而动摇自己的抗日意志。

当时在长春市活动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夏航同志（原名荆玉珩，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已离休）也在关心他，争取他。据夏航同志介绍说：“1939年到1944年，我是长春的《新满洲》杂志编辑，那是我的掩护职业。我从来稿中发现李季风不仅有爱国主义思想，还有一定的左倾思想，看来他读过不少马列主义的书。”

“季风写了《三部曲》，1940年上半年发表于《新满洲》，因为明显有反满抗日情绪，我担心被汉奸发现。”

“为了争取季风参加地下党，我与季风彻夜同榻深谈三次。

我劝他：你既信仰马列主义，要革命。干革命道路很多，并不都得明干。明干，就拿枪。否则，你在人家天下，明干，白送命。”

“季风答：‘我能写，这就是武器！’我再次要求季风从此不要再写东西，隐蔽起来，干革命，季风不同意。他说：‘我一定要拿笔进行战斗，我认可血洒在东北大地上，也要让革命开花！’”

讲到上述这段话时（1984年7月31日于北京——笔者注），夏航同志意味深长地说：“时过半个世纪，但仍记得一个字不差。”足见李季风此言留给夏航同志印象之深。

李季风与夏航当时互换书看，夏给季风的书有《政治经济学大纲》、《大众哲学》等；季风给夏的有《列宁》等书。夏航同志处于秘密情况下，未向季风公开身份。

建立“青年读书会”

李季风巧妙地利用伪《大同报》副刊这块阵地，通过他的作品，联系了一大批青年读者，激发了他们的抗日热情，近者来访面谈，远者来信鼓励，要求以他为中心，组织起来。在主客观形势影响下，李季风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应由呐喊进而为行动起来。

《大同报》编辑张景浩（张纳亭，原在长春市水泵厂工作，已病故）与李季风在一起工作相处很熟。季风开始借给他一些进步书籍，启发他的思想觉悟。当借给张《铁流》一书时半开玩笑地说：“以后每读完一本书，必须写一篇《读后感》给我，否则就不借了。”张果然按他的意见办了。后来张还如期地利用夜间或假日完成了李季风交给的抄写“禁书”的任务。

1940年6月的某一天，李季风把张景浩找到一个僻静地

方，悄声地问：“你是否愿参加革命小组？”并介绍了情况。张答：“参加革命小组进行抗日，我衷心拥护，但我要到关内去直接参加抗战，不想在东北。”李劝导说：“内地革命大有人在，唯独东北更需要人才，你还是留下来好。”经过一番商量后，张欣然地同意参加“青年读书会”。

“青年读书会”又称“社会主义革命小组”，是自发地以左翼文艺工作者为主体的秘密抗日组织。它下辖若干基层小组，每个组3~5人，个别吸收组员，小组间不发生横的联系，实行垂直领导。此间，李季风先后发展了张景浩、于长春（于海春，伪新京邮政局职员）、李作东、韩文达（伪新京海关职员）、段式斌（伪新京税捐局职员）、贾永芝（伪中央银行职员）和伪新京医大学生张国忱（现江西省南昌医学院教授）、高守义、白光飞及社会青年周云霞（女）等人。

李季风为壮大抗日阵容，交流经验，与哈尔滨《大北新报》记者关沫南（笔名关雁，中共党员现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建立起革命友谊。他们遥相呼应，向青年读者指导与回答有关文艺创作方向和进行实际抗日斗争等问题。关沫南曾两次来长春与李磋商机宜、研究斗争策略，李也去哈尔滨回访了关。关在哈尔滨曾酝酿成立左翼文艺团体，因机密泄露，在“一二·三〇事件”中被捕而未遂。

1941年夏，李季风与长春的秘密抗日组织“铁血同盟”（前身为“读书会”）的领导人刘荣久、马成龙接触商讨组织合并的事，因刘荣久提出要搞爆破、纵火等破坏行动，李认为风险太大，又容易暴露，为此未取得一致，而把组织合并一事便搁置起来。

1941年12月21日，刘荣久、杨文阁（伪奉天农大学生）被骗去哈尔滨接受所谓“入延安抗日大学前的培训”时，向由敌

特扮演的“中共中央特派员”刘玉廷汇报说：“除了我们的组织外，我还知道有一个反日组织，就是季风（指李季风）和一个姓易的。他们在新京秘密成立了反日组织，实行单线联络，进行反日活动。将来有可能与我们合并。”

不久，在1941年12月30日，敌特以召开“东北联络会”为名，将“铁血同盟”的负责人及各地代表骗至哈尔滨，在会上将他们全部逮捕，于是爆发了震惊东北的“一二·三〇”事件。

结婚要准备牺牲

1941年，李季风24岁了，住在一家旅馆里，过着单身汉的生活。

有位姑娘叫周云霞，平素爱读报纸、杂志和现代小说。李季风的文艺作品深深地吸引了她。从爱读季风的文艺作品，进而萌发对他本人的爱慕之情。

少女心事多，她默默地思念着、遐想着，总要寻得机会与李季风见上一面，以解相思之苦。遂贸然提笔给季风写了信。信中说自己是他的热心读者，因家境贫寒，父亲年老体衰，受继母的冷漠，处境艰难。因交不起学费，中途辍学，闲呆家中，自感前途渺茫，不知何日能有所终。祈盼季风先生忙中抽暇，给以赐教。她还提出想去英文学堂补习英语，因交不起学费，恐愿望难以实现，恳请季风能否解囊相助，则不胜感激涕零等语。

几天后，她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回信。季风在信中对周身处逆境表示同情。对她好学以致的精神给以鼓励，并答应可资助她学费，以解燃眉之急，还邀请她有空前来面叙。

周云霞见信后，又惊又喜，不知所措，心中充满着矛盾。她终于想出个办法，她请同学李坤影结伴赴约，以避可畏之人言，见见季风，看个究竟，也了却自己的心愿。

她们来到了长春市西三马路福丰旅社，李季风热情地接待了她们。

寒暄后，周云霞像遇到久别重逢的好友，滔滔不绝地诉说着自己的遭遇。李季风静静地听着，不时频频点头，表示同情。

当话题转到讨论人生价值时，季风问：“你们今后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周、李异口同声地说：“当然要做好人，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还用问吗？”季风风趣地笑着说：“那可不一定！很难保证你们一生中，不做坏人，不干坏事，好、坏人的标准太笼统，不好截然分开。一生中，做纯粹的好人，总办好事也不太可能，绝对的好人，人世间是没有的。”

李季风的话，触动了沉默寡言的李坤影，她站起来反驳说：“你说的不对！人间好人是大多数。比如我爸爸、妈妈和我都是完完全全的好人。我可保证，我们一辈子不干坏事，堂堂正正地做好人。能说我们不是好人吗？”周支持李的观点，在旁“添油加醋”，站脚助威，双方各不相让，争论得面红耳赤。

李季风为了缓和一下“紧张气氛”，才故意岔开话题。

李季风的朴素品格，潇洒风度和渊博的学识，深深地感染了周云霞，爱情的碧波在心中荡漾。此后，周时常独自与李季风约会，彼此相爱。李季风不失时机地启发周的民族觉悟，不久介绍她参加了“青年读书会”。

令周云霞苦恼的是，幼年受父母之命，与一郅姓男子订了婚。父命难违，她没有勇气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只能将这种痛苦埋在心中。她惋惜的是，怎能甘心让如此品貌端庄、才华横溢，有抗日报国之心的热血青年，在自己的身旁悄然而过！终日里搅得她夜不能寐，食不甘味，默默地苦思苦想。最后她终于忍痛割爱，采取“爱情转让”，以求自慰。由她作媒，把她的知心好友李坤影介绍给李季风。

他们相处几个月后，就谈起结婚条件来。李季风提出：“你若嫁给我，必须答应三个条件，而且要身体力行。第一是共同工作；第二是不怕吃苦；第三是准备牺牲。”李坤影对前两条是无可非议的，表示赞同，但对“准备牺牲”的这一条，却迷惑不解。她反问李季风：“年轻的，为什么结婚还要准备牺牲呢？”李季风激动地说：“我们的结合，不是为了建立美满的小家庭，生儿育女，碌碌无为。当今国难当头，同胞受苦受难。我们的结合是为了革命，共赴国难，需要你助我一臂之力，因此必须有准备牺牲的信念，望你三思而行。”李坤影流着热泪，表示同意这个条件。李季风安抚她说：“劝人家牺牲是不尽人情的。但是，我要置身于牺牲的行列之中，而且要站在前头！”

1941年11月3日，在《大同报》登一条《结婚启事》，新婚夫妇回辽阳老家拜见了老母和兄嫂，住上几天，就算完成了终身大事。

周云霞看着他们结婚，心中充满着喜悦、羡慕和痛苦。事先周许诺他们离长春回辽阳老家结婚时，要亲到火车站送行。可是到了开车时刻，仍未见周的踪影。李坤影从辽阳归来后，有人告诉她：“那天，周云霞没出家门，独自关在房子里，躺在炕上头上蒙着被，抽抽泣泣地痛哭一场。”

此时，周云霞、李坤影和魏秀贤都是“青年读书会”妇女小组的会员了，担负保管图书、抄稿和秘密从事反满抗日的宣传工作。“一二·三〇”事件爆发后，她们被逮捕入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第一次越狱

李季风被捕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东北文坛。有的进步作家，感到自身安全受

威胁，终日里担惊受怕，不愿提笔写文章，有的躲避起来。

李季风被捕后，遭受严刑拷问，但他咬紧牙关，坚决不承认成立什么秘密组织和进行反满抗日活动。

敌人见动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决定对李季风采取“怀柔政策”，图谋以“软化”手段，争取和感化他，使之彻底归顺，为他们推行文化专制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满抗日活动服务。

担任主审的日特田中，狡诈多端，采用迂回审讯方法，让李季风讲出谁是共产党或国民党。李季风将计就计，说他认识共产党与国民党在长春的主要负责人和若干人员，如果相信他，他可以领着去捉。因为他讲的活灵活现，敌特田中信以为真，令季风把这些人的名字和地址说出来。季风说：“这些人的住址不固定，使用化名，他们也不告诉我真实情况，但我认识他们，我可领你们到街上去认。”田中高兴地说：“好！那你就领我们去吧。”季风指着自己的穿着和蓬头垢面的模样说：“这副样子到外边去，怎么行，人家很机警，见我囚犯模样，远远地就躲起来了。而且，我也不能从警察厅出出入入，叫人家盯上了，我们的计划就被破了。”

1942年1月，李季风被转移到长春市头道沟中央通中村旅馆（特务据点）二楼住下，给他理发、洗澡，还换了新衣裳，伙食上也给以“优待”，允许有一定范围的行动自由。房间里有两名特务“陪伴”他，楼梯口也有特务守着，监视他的行动。

1月13日早晨，空中飘着雪花，西北风刮个不停。李季风起床后，到二楼盥漱室洗脸、刷牙。环顾四周，发现监视他的特务不在身边。立刻出现一个念头：这不是逃脱魔窟的极好机会吗！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用力推开窗户，纵身跳下去。碰巧跌落在下面的棚厦顶上，棚盖踏成个大窟窿，堕落在地上，脚骨摔伤，手、脸也划出血来。他忍着伤痛，一瘸一拐地顺一条

小胡同向前跑去。恰在此时，从身后驶来一辆人力三轮车。李季风坦率地对车夫说：“警察抓我，我脱逃了。后边有警察追捕，我要坐你车，请你救救我。”车夫同情他的遭遇，说了声“我也是中国人”，叫他快上车，车子疾速地向前奔驰。

跑了一段路，人力车夫拦了一辆马车，对李季风说：你赶快换一辆车，以免警察发现。并嘱咐马车夫一定把客人送到家。李季风在两位车夫的热情帮助下，逃出了虎口。下车后，他踉踉跄跄地来到了住在伪皇宫附近太平街的于长春家。

于长春（现名于海春，住哈尔滨市道里友谊路39号）当年20岁，伪新京市邮政局职员。思想进步，有民族正义感，他喜爱文艺，常写作品向报社投稿，因此与李季风相识，彼此相处甚密，后经李季风介绍参加了“青年读书会”。于的家庭生活贫苦，靠微薄工薪度日，老少三辈挤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

李季风的突然出现，一时把于长春惊呆了。他紧握手问道：“你什么时候出来的？怎么又到了我家？”李季风简要地把脱逃经过述说了一遍。对于说：“我求你帮助我离开这个地方，我要投奔抗联去。”

于听后，激动地说：“你放心，我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你。不过现在不能走，他们正在追捕你。你先在我家吃顿饭，休息一下，我们再想办法。”

李季风在于家躲藏了一天。当天晚上，于从柜中拿出他祖父穿过的棉袍子，还找出棉裤和棉帽给李换上，并亲自给李剃了光点（原留分头）。又找出一根扁担和两只挑筐，准备化装成小贩。

李季风的英勇行为，深深地感动了于长春。他想：我也是个中国青年，有血、有肉。李季风要走的路，我为什么不能走呢！他毅然决定，跟随他一块走，投奔抗联，杀敌报国。开始，

李季风不同意带他走。对于说：“你拉家带口的，生活挺困难。你走了，抛下父母和弟妹们，有谁来照顾他们呢！”但因见于决心坚定，李季风只好答应下来。

1月14日，天刚蒙蒙亮，李、于二人吃过饭，伪装成收购破烂的小贩，肩上挑着筐，手里拎着秤，边走边吆喝着，就这样混出了长春城。

长春到吉林120公里。可是，他们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踏着冰雪覆盖的乡路，绕过一道道堵截的关卡，混过一次次卡哨的盘查；饿了找个僻静人家讨口饭吃，黑夜投宿农家，走了4天，才到吉林市。

第二天，他们去市里寻找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打算通过他指明投奔抗日联军的路线。不巧，此人早已离开吉林，不知去向。无奈，他们到一家过去认识的书店住下。书店主人说：抗联已撤到苏联境内，你们投奔谁呀？往苏联跑，国境线又过不去。李季风猛然想起从前李作东跟他讲过：天津东南有八路军的游击区，看来，只有进关投奔共产党这一条路了。到关里去，路途遥远，没有路费怎么成？眼下身上携带的有限的几个钱，也快花光了。他们商量先让李季风暂在书店后屋躲藏，于长春返回长春筹集路费。

1月21日，于长春乘火车抵达长春时已是万家灯火，他在候车室停留了很长时间。待人迹逐渐稀少时，才朝家中走去。刚踏进家门口，突然窜上来两个在那里守候多时的特务，将他逮捕了。

1月22日上午，日特田中和关忠显、张德，将于长春从监号中提出来，领到押在另一监号的李坤影面前，当面对质，辨别人像。他们互相表示认识后，于被带走审讯。离开时，他扔在地上一个纸条。李坤影拾起打开，上写：“季风在吉林书店，

请你放心。”得知李季风安然无恙，心中无比喜悦和安慰。她怕被敌特发现，将纸条撕碎后放入口中嚼咽下去，瞒过敌人。

同一天，日特田中经过调查便率关忠显和张德，去吉林市那家书店又逮捕了李季风。

第二次越狱

李季风越狱被捕后，敌特并未刑讯。他们故作姿态，装成“宽宏大量”的样子，将李关押在伪首都警察厅后院小红楼特设的监房里，继续作“怀柔工作”。监房内备有床、桌、椅和壶、碗等生活用品。白天允许他到监房外走动，可看报纸、杂志和阅读规定范围的书籍，伙食上也“特别优待”。

日特田中贞夫每天与李季风接触。这时他因镇压中国人民反抗抗日活动“有功”，晋升为特务科特高股长和警佐。田中整天用甜言蜜语和以特殊生活待遇来“开导、感化”他，还封官许愿。田中说：“你要彻底归顺，好好给我们干活，可给你一个警尉的官当。”对田中提出的“优厚待遇”，李季风当面不加可否，一笑置之，采取敷衍态度。在生活上，也不拒绝田中的“帮忙和照顾”。

1942年7月，李坤影被关押7个月后，因要临产，取保释放回娘家居住。此后，她常去探监或送食品、杂物给李季风。李坤影回忆说：“有一次我去探监时，季风暗中悄声对我说：‘你放心，哪管是一口唾沫，若是对敌人有利的話，我也要把它咽到肚子里。’”果然，李季风用他的实际行动，履行了他的诺言。

据伪首都警察厅警察副总监兼首都地方保安局长三田正夫供述：“《镇压作家李季风共产主义活动之罪行补充》，使其记述理论，但李季风未答应。”

1943年初夏，关沫南、王光逖因“左翼文艺事件”于1941

年“一二·三〇事件”中在哈尔滨被捕。数月后，解来伪首都警察厅与李季风关押在一个监房里。像对待李季风那样，对关、王也采取“怀柔政策”。特务科长平岗修治指派日特新保广和警长赵洪升负责看管他们三个人。每天叫他们翻阅报纸、杂志等作品，从中分析哪些文章含有反满抗日的內容，或属于左翼文艺作品。然后写出书面报告或心得材料交给新保，由他送到特务科检阅。

1943年（伪康德10年）11月5日。从早晨开始，降了入冬以来的头场大雪，纷纷扬扬的雪花漫天飞舞，大地换上了银装。

李季风起床后，透过玻璃窗看了一阵雪景，不禁触景生情，感慨万千。他想到一年零四个月的铁窗生活，虚度年华；想起了备受苦难的妻子和尚未见面的女儿；想起了共赴国难的战友；想起了国耻未雪，倭寇未除，家仇未报……这些都使李季风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

李季风打扫完监房和走廊后，手提大水壶，准备去水房打水，只见王光逊用日语与日本看守新保聊天。王为了逗趣，竟使用诙谐和下流语言，还用手比划着，逗得新保哈哈大笑，放松了对李季风的监视。

李季风见此情景，觉得这正是脱逃的好机会。他急忙来到水房旁，见通向院外的小便门没上锁，半掩着。遂即扔下水壶，转身挤出小便门，穿越大同大街（现斯大林大街），急忙向东南方向走去。

天公作美，踏过的脚印，随即被大雪覆盖。他大摇大摆地进了“满洲国协和会中央本部”大楼。

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青年文化》杂志主编王天穆见李季风的突然出现甚为惊讶，因为他知道李季风被捕的一切详情。王是位热血青年，有强烈的民族正义感。他与李季风在文艺战线

上，具有相同的立场和观点，因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王天穆毫不迟疑地答应掩护李季风逃脱虎口。

为躲避一下敌人追捕的锋芒，王天穆让李季风先藏在楼下-间厕所里，然后把门钉上，再贴上一张纸条，上写：“便所坏了，禁止使用。”每天夜间他送饭给李吃，还随时告诉外边追捕的风声。李季风在又脏又臭，不足4平方米的便所里，度过了6天6夜。

11月11日凌晨，李季风穿上王天穆给准备的大衣，棉裤和棉鞋、帽，打扮成商人模样，带着王给弄到的伪协和会某人的名片，让他去抚顺市躲藏。在王的掩护下，他走出伪协和会本部大楼，避开盘查森严的长春车站，绕道直奔孟家屯，登上南行的火车，离开了长春。

四海漂泊的传奇人物

李季风第二次越狱，搅得敌人慌乱一团。特务们受到主子的斥责和痛骂。长春市内出动了大批警察，还动员日伪宪兵队（团）秘密警察——伪首都地方保安局的特务们也参加了大搜捕。

伪警务总局（直属伪国务院）向全满发了《通缉令》，并出重金悬赏缉拿。动员“全满10万警员”和地方衙属的乡丁，在东北城乡集镇、交通要道、车站、码头和繁华场所，设岗立哨盘查过往行人。

在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长平岗修治指挥下，以该厅特务科、外事科为主体，吸收市内各警察署特务系人员参加，成立若干搜捕小组，到邻近各县城搜捕堵截。同时，派特务去大、中、小学手持李季风照片，发动师生协助检举。为追查李的下落，还逮捕了与李季风有交往的50余人。李越狱当天，其妻李坤影也

被逮捕，关押7天后才获释，但每天都有特务跟踪、监视。

李季风到抚顺市找到张烈（解放后曾任抚顺市郊区文化局长，已离休）后，说明王天穆介绍的来意，并掏出伪协和会某人的名片，张便收留了他。张烈（笔名冰旅）是抚顺市文艺界的青年作家，他对季风素怀敬仰之情，虽知他是“通缉犯”，也宁愿冒风险来掩护。

李季风在张家隐藏了20余天，经常与张烈研究抗日文艺发展方向等问题。有时讨论很激烈，张的父母察觉后，怕受牵连，不愿再留李住下去。李季风不顾张烈恳切挽留，毅然辞别张家，登车到了盖县。

李季风到盖县，投奔到于家麟（笔名驼子，诗人、作家）处。于与李季风是早年结交的朋友，他愿意掩护李，把他安置在张克恩家住下。不久，张在工作单位出了事，怕受检查，又将李转移到夕澄（作家）家中。

在接触中，李季风发现于倾向三民主义，而他却信仰共产主义，在讨论问题时，经常各抒己见。李季风觉得，虽是朋友，但政治观点不一致，很难达到感情上的融洽，因此不能久留。根据李的要求，于让夕澄去沈阳找花喜露（笔名田贡）。花这时已放弃写作，以小职员身份为掩护，在沈阳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搜集敌伪情报。

花同意掩护李季风，但对夕澄提出三个条件：1. 季风送来后，于家麟等人不得过问他的去向；2. 不许于等人再和季风联系；3. 一切绝对保密。花和夕澄达成协议。1944年2月初（春节前）李季风经过化妆由夕澄陪同，到了花喜露家中。

李季风与花畅谈几日，便要求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花请示上级后，认为李正受敌人通缉追捕，不宜参加工作。随后花又将他送到本溪市找一个隐蔽地点住下，学习党的文献和书

籍。

4月间，花喜露因“文艺事件”在沈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李季风担心暴露，离开本溪，又回到沈阳。

李季风两次越狱，轰动了全东北。社会上传播着神话般的传奇故事，把他描绘得活灵活现。

有人说：“李季风不但文章写得好，还练就一身好武艺。”说他会飞檐走壁，攀越高墙，如履平地，从高楼跳下，像棉团一样，柔软无声；说他长一双飞毛腿，夜行一千，昼跑八百；还说他会“破牢术”，吹一口气，牢门便自动启开；李会“定身法”，用手一指，能使警察动弹不得。还有说他会什么“分身法”、“遁身法”等等。这些神话般的传说，不胫而走，添枝加叶，把李季风形容得活象孙悟空一般。

敌特机关将这些民间传说，当作“流言蜚语”，下令禁止传播，并追查、逮捕了“谣言制造者”。但敌人的“禁令”和恫吓，老百姓只当耳旁风，茶余饭后照样悄悄地议论着。

巧施“调虎离山计”

李季风第二次越狱5个多月了，与家人断绝了联系，家人不知他的去向。

1944年5月，一天早晨，李坤影正同她家人吃早饭，突然见到李季风出现在面前，顿时引起全家人的惊讶。

李坤影放下饭碗，诧异地问：“你从什么地方回来的？太冒险了！现在警察到处抓你。”李季风微笑着说：“没关系，我在四平打电话，把他们调开了。”随后要求李坤影马上收拾一下跟他走。李坤影问：“到什么地方去？到关内去吗？”李季风答：“不去关内。”李坤影接着说：“为什么不去关内？如果去关内，我可跟你走，若是留在东北，太危险了！不是自投罗网吗？”李

季风板起面孔，满带自信地说“东北也不全是日本鬼子的天下，好多地方可容我们安身。”李坤影说：“不去关内，我不跟你走，太冒险啦，若跟你走，我们全家人都完啦！”李季风又说了几句恳求的话。李坤影怕时间呆长了，被特务发现，催促说：“对门煎饼铺里，有特务监视，你要赶快离开！”老人让他吃饭，他没吃。李季风见妻子执意不走，就急匆匆地离开了家。怕被特务发觉，李坤影和他的父母没敢送出门来。

李季风走后，全家人紧张起来，饭也吃不下去了。老母眼含热泪自言自语地叨咕：“人家冒着危险回家来，也没吃口饭，就给撵走了，太过意不去了。”日后，老人每想到这里，总是追悔莫及，成为一大憾事。

李季风这次秘密回家，为转移特务的视线，巧施了“调虎离山计”。

他在四平下车，给伪首都警察厅值班室打电话说：“有人在四平发现李季风了，你们马上派人来捉，我在这里等你们。”

敌特信以为真。由特高段长田中带领日特工藤、池田、藤田和清水等，驱车赶来。到四平后，到处找不到这个打电话的人，方恍然大悟，知道上了当。气得日特们暴跳如雷，哇啦哇啦地乱叫一通，连夜返回长春。

李季风的“调虎离山计”虽然暂时避开了敌人，但是暴露了目标。敌人判断：打电话的人，可能是李季风在戏弄他们。于是，他们把追捕的重点放在去四平、沈阳和南满的一些城市，并派遣日特长期驻守巡查。

“身在曹营心在汉”

李季风从本溪回到沈阳后，有家难奔，有亲难投，囊中一贫如洗，食宿相当艰难，并且时时受到敌人通缉追捕的威胁。由

于走投无路，他决定投靠地下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罗大愚。一可栖身，二可借助他的力量，继续从事反满抗日活动。

李季风早在伪《大同报》工作时，在长春曾结识《新时代》社经理王觉（王存厚、吴仲元）。伪康德8年（1941年）端午节前后，他同王觉一块去沈阳会见过罗大愚。罗拨出伪币7千元资助创办《新时代》社。这次会见，罗指示：“开展运动，不能单纯追求数量，必须注意质量。要通过交朋友，努力发展优秀同志。”他们还讨论了其它问题。同年7月，王觉因健康情况，曾委托李季风代表《新时代》社参加了伪治安部召开的北满及西南地区的宣抚工作会议，这是李季风认识罗大愚的原因。

1944年5月，某日，罗大愚来到韩庭桂（韩又新，沈阳市委党校工作，1988年病故）家。对韩说：“李季风越狱啦，你掩护一下。此人左倾，虚无主义。我们国民党的人和工作，都不要对他讲，你要看着他。”不久，李季风被安排在地下国民党员董国材（伪军汽车连连长。解放后被长春市人民法院判刑10年）家隐蔽。

李季风接受了罗大愚让他编辑《东北公论》（油印）的任务。《东北公论》是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的“东北通讯社”地下刊物，负责人为高士嘉。接着韩庭桂也奉命住到董国材家，负责编辑《时事月刊》，李季风当时编《黑白丛刊》。

此间，李季风以笔名文起，写了中篇小说《三姊妹》，内容直接宣传反满抗日；还写了《血的教训》，总结他自己建立的“青年读书会”、王觉的《新时代》社和刘荣久的“铁血同盟”的失败教训。

李季风此时虽然在食宿方面得到了安置，并可继续从事反满抗日活动，但他心情不畅，不愿委曲求全，颇有“身在曹营心在汉”之感。

一天黑夜，李季风跳墙出去找到了高曼侠（现名高瞻）家。高见是李季风，感到很惊讶。李季风安慰高说：“不要怕，有两条路你可选择：我的头值钱，日本人用上千元悬赏，你把我送到特高课，可得一大笔赏金；或者做我的朋友，把我掩护起来。”

高曼侠说：“我也是中国人，我也爱国，有志于反满抗日，怎能为得赏钱出卖朋友！”

“你不怕受连累吗？”季风问。

“我不怕。你就在我家住下吧。”高说。

这次见面，李季风向高透露了他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他们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要真心抗日爱国，就可以合作。”

1944年6月，罗大愚下令改组地下国民党，对凡参加“东北抗战机构”者，一律发展为国民党员。在研究是否吸收李季风入党时，罗曾说：“李季风思想左倾，他所以接近我们，是因为没有地方隐蔽。”罗又说：“不分信仰，左的也吸收进来，搞抗日统一战线。”

1944年7月9日——8月19日，李季风参加“东北党专”开办的第二期党务干部训练班，被编在第三组，地点在沈阳市大什字街。同组受训的有韩庭桂、董国材和董海兰（真名赵文波，系董国材之妻，现住北京），指导员张宝慈（“镇反”时被沈阳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训练班结束时，李季风与韩、董等人一同宣誓参加了国民党。监督人张宝慈，是“东北党专”第二负责人。不久，李季风被安排住在博文书店肇如一家的楼上。

同年9月，李季风担任“东北通讯社”第一通讯部（沈阳）主任。该部的编审员是董海兰（赵文波）、干事杨承教。此间，出版的刊物有《公理》半月刊（共出4期）、《拓光》半月刊（共出7期），还编印了各种刊物15种之多。

“东北党专”为纪念在“一二·三〇事件”中殉难的英烈，表彰4位同志的革命精神，于沈阳秘密设立博远（贾桂林）图书馆，于长春设立硕强（张辅三）图书馆、于齐齐哈尔设立富衡图书馆，于营口设立吴仲元（汪觉）图书馆。

1944年9月18日，为纪念“国耻日”，博远图书馆正式开馆，李季风任馆长，赵文波为干事。地点在沈阳市小南门里，藏书500册。

李季风加入国民党后，专心致志地从事抗日的宣传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李季风与韩庭桂一起，于1945年春节，还利用印制贺年片的形式，把爱国抗日的宣传口号印在背面，投寄各地。但张宝慈要求他把力量放在发展组织上。他对此很苦恼，感到左右为难。后经高曼侠介绍，认识了关岳，又把关也拉进了国民党。

1945年初，李季风与张宝慈产生了矛盾。主要是因李季风偷看了蒋介石的一份秘密手谕。内中严饬国民党机构，今后要“三分抗日，七分反共”。他醒悟到国民党原来抗日是假，反共是真。李季风信仰共产主义，怎能与国民党合作反共呢！他悔恨自己政治上无知，走错了路。

李季风为了保持政治上的清白，向张宝慈提出了“退出国民党”的申请，并要求给书面批准手续。开始时，张不批准，李又强烈要求。此时，关岳从“东北党专”上层得知消息，再三劝阻李季风说：“你不干国民党，讲完就算了，何必非要什么批准手续呢！这样，对你不利呀！”李季风不听劝告，他满不在乎地说：“张宝慈能把我咋的！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他敢搞暗杀。”

由于李季风要求退党强烈，张宝慈答应：“你在后天午前来吧，我们给你办手续。”

我是李季风

李季风第二次越狱后，在外流浪、隐蔽已1年零5个多月。虽然战争形势日趋紧张，但日特并未放松追捕活动。

1945年4月中旬，某日，李季风为领取“书面退党手续”朝张宝慈的秘密据点走去。

行至沈阳市中街西华门附近，突然碰上了在那里巡查的伪首都警察厅特高股长田中贞夫和日特西田。他们是“老相识”了，李季风躲藏不及。日特上来捉捕时，他奋力反抗，撕打起来。田中身材矮小，被李季风挥拳打翻在地。欲脱身时，西田吹笛报警，立刻召来几个伪警察。李身单势孤，终于被捕。

沈阳中街是商业闹市。李季风拒捕时，围观的人挤满了闹市。他为制造声势，向同志们报警，当众放声高喊：“我是李季风！李季风被捕啦！我反满抗日，我要爱国！”连喊数声，气贯长虹。围观的人，知他是李季风，对凶残的日寇，无不怒目而视；对他为爱国抗日身遭不测流下了眼泪。

李季风被关押在沈阳市北陵秘密监狱，警戒森严，对外封锁一切消息。敌人准备随时杀害他。

他倒在血泊中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举国欢腾，庆祝胜利。

8月17日李季风出狱，恢复了自由。此时，张宝慈等因“五·二三事件”被捕，也相继出狱。

李季风出狱后找到张宝慈，坚持要求批准他退出国民党，还坚持要“书面手续”。开始时，张以“好言相劝”，后见李态度坚决，答应待讨论后给他答复。

8月21日，李季风来到花喜露（田贵，8月19日与铁汉同

志从沈阳市第一监狱出狱)家,谈到要求退党问题。花说:“你在东北青年中,有那么大的影响,你退出国民党,投奔共产党,他们能容你吗?东北青年被你号召过去,那还了得!”

李季风说:“我就是号召青年不上国民党的当。”

花说:“不要天真,人家不会答应的。依我之见,你赶紧离开沈阳,到别的地方去,最好到解放区去。”

李季风仍然坚持。认为只有在这里和国民党争夺东北青年才有意义。

8月23日,张宝慈终于答应办理退党手续。由杨春和到高曼侠家(李当时住高家)来领李季风。他们走到沈阳市大东关什字街时(离高家不远),张宝慈手下的“铁血锄奸团”团长齐觉生突然出现。李季风意识到不妙,与杨春和急速拐向一家大门口,刚走到门洞,罪恶的枪声响了,子弹穿透他的右腹,李季风倒在血泊中。

杨春和知道是齐觉生开的枪,他吓得扔掉自行车,越墙跑到城内图书馆找关岳。关又找到高曼侠一块去抢救。他们很快赶到出事地点,用门板把他送到小河沿盛京施医院。这时李季风还清醒。高曼侠问他:“谁打的?”李季风说:“我知道。”高又问:“告诉我,是谁?”李季风环视在场的人,摇头不答。因为张宝慈布置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在左右监视,医护人员不敢抢救,流了6个小时的血,当天下午3点多,眼睁睁地看着李季风气断身亡。时年仅28岁。李季风牺牲后,由高曼侠等人出钱买了棺材,浮屠于沈阳小东边山的珠林寺。

“李季风过早地牺牲了,但他的业绩是伟大的,他是无名英雄。”笔者用夏航同志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永远纪念他的革命精神。

(摘自《长春史志》1990年第5、6期)

罗烽在沦陷区的活动

沙金城

罗烽，原名傅乃奇，1909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郊苏家屯。由于家境贫寒，他自幼备尝生活艰辛，因此走上社会后，对腐朽的统治阶级深恶痛绝，对依稀看到的光明充满憧憬。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普罗文学作品，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并开始尝试动笔写作。1929年，罗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踏上了革命的文学之路。最初，他用“洛虹”笔名在《哈尔滨晨报》副刊发表了一些诗歌，内容多为反映下层人民的苦难，带有明显的左翼倾向。

“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同志担任北满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当时在铁路工作的罗烽被任命为铁路特别支部书记，后因文化宣传工作需要，他又调任哈尔滨东区（道外）区委宣传委员。他的家就是地下印刷所，秘密出版不定期的抗日救亡小报。不久，经杨靖宇介绍，他与共产党员诗人金剑啸相识。小报的插图、漫画等美工工作均由金剑啸负责。1932年，哈尔滨松花江堤由于多年失修决口，大水冲入市区。罗烽的家正当决口处，一切东西都来不及搬走，就举家奔赴南岗避难。这样，印刷所的工作被迫停止。

为了开辟新的宣传阵地，党指示罗烽等人到社会报纸上去找地盘。这样，1933年就有了创办一个进步文艺刊物的动议。罗烽与金剑啸商量后，通过作家萧军与长春《大同报》副刊编辑陈华的朋友关系，在该报创办了《夜哨》文艺周刊。《夜哨》于

1933年8月6日创刊，这是我党领导下的东北最早的公开文艺阵地。《大同报》是伪满官办报纸，在敌人报纸上办刊物，一方面要反映反满抗日内容，一方面又防备敌人察觉，在当时是冒着一定风险的。罗烽积极为《夜哨》撰稿，在创刊号上，用“洛虹”笔名发表了独幕话剧《两个阵营的对峙》，以一个疯人院为背景，描写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不幸遭遇和愤怒，巧妙地表现了存在于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在第一期上，罗烽发表了《哈市文坛消息》，报道了他与金剑啸在哈尔滨组织星星剧团的情况，使沦陷区人民在这里看到了一片星光。罗烽在《夜哨》上发表的作品还有《口供》、《胜利》，诗歌《说什么胜似天堂》、《从黑暗中鉴别你的路吧》等。从这些富有战斗性的标题，便可使明眼人感受到一股催人奋起的力量。

《夜哨》创刊还不到半年，由于刊登了一篇抗日小说《路》，被敌伪强制停刊，罗烽便和其他进步作家转移到哈尔滨《国际协报》，新创办一个名为《文艺》的副刊，继续沿着《夜哨》的方向前进。罗烽此时改用笔名“彰勃”。

1934年6月18日，由于叛徒徐乃健出卖，罗烽被驻哈尔滨南岗日本领事馆特高系以共产党嫌疑罪名逮捕，关在地下室达8个月之久，后被引渡到伪满警察厅拘留。在狱中，他受尽敌人的残酷折磨，家中送衣服亦不准许，冬季仍然穿着单薄的衣服。面对着严刑拷打，罗烽始终坚强不屈，拒不招认。1935年5月下旬，敌人一无所获，最后只得无可奈何地将他释放。分析当时被释原因，罗烽认为有三：一、他被捕时，距满洲省委被破坏已有4个多月，敌人搜捕有所放松；二、除了叛徒口供外，敌人拿不出任何证据；三、党组织铁路工人积极营救，大家捐款买通了日本领事馆高等系副主任高柳。

罗烽出狱不久，便在1935年9月与白朗一道，秘密地逃离

了哈尔滨。经过艰难的旅程，取道大连走海路到达了上海，住到了萧军、萧红的家中。他们两家在一所房子里住了2个多月。后来，二萧作品发表多起来，经济上有了好转，同时也因为两家住在一起影响写作，二萧便另找房子搬走了。

在上海安顿下来后，罗烽通过先期到达的东北作家舒群结识了周扬同志并接上了党的关系，同时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做“左联”工作的同时，罗烽开始了他文学创作的新时期。

（摘自《东北新文学初探》1989年版）

萧红与《夜哨》

沙金城

《夜哨》是1933年8月6日创刊的文艺周刊，为伪满傀儡政府官办的长春《大同报》的副刊。《大同报》原有一副刊《大同俱乐部》，其宗旨在该刊“征文启事”中可以得知：

盖闻大同美义，在吟咏无分，俱乐精神，贵雅赏。本部爰本斯旨，并冀兼收，以期休王道与民同乐之心，为国家歌舞升平之助……

其目的显然在于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涂脂抹粉，欺骗群众。1933年，东北各地军民尚有多处在英勇抵抗日军，日伪当局由于军事上的牵扯，虽然也设立了“弘报处”、“情报处”等专门机构监督文艺宣传，不过由于他们在东北站脚未稳，自顾不暇，对于文艺的控制还是不甚严密的。所以，一些健康进步的作品有时也能在《大同俱乐部》上发表，如萧军的《杀鱼》，

萧红的《弃儿》、《腿上的绷带》、《太太与西瓜》等。然而，这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刊物，登载的好作品是极其有限的。为了扩大党的宣传阵地，教育广大群众，打击汉奸文艺，共产党员作家罗烽与金剑啸等同志商量，决定通过进步作家萧军与《大同报》编辑陈华的朋友关系，在该报创办《夜哨》周刊。经过大家一番努力，《夜哨》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了。

《夜哨》的刊名是萧红起的，表示“夜里值岗”之意，即警惕敌人。刊头是金剑啸设计的：上半部是茫茫黑夜，象征敌寇的黑暗统治；中间是一片大地，象征着东北国土；底部是一道道铁丝网，象征着法西斯的暴行。这蕴藏悲愤的画面，与《大同俱乐部》的裸体女人刊头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激励着人民奋起反抗。在创刊号上，陈华用“权”笔名发表了《生命的力》一文代发刊词。文章针对青年们的“彷徨、踌躇，甚至随波逐流的盲从”，强调看重“自己生命的力”。刊于同期署名“潞潞”的诗《解放》，可以说是号召人民起来斗争的震聋发聩的呐喊：

你们像是牢狱里的罪犯，
紧锁着笨重的铁链。
如今，一团烈火燃烧着——
铁锁链就要被毁，
打开牢狱之门前进，
光明就在你眼前出现！

再也不能安分地期待，
期待只是受那重重的剥夺。
如今，奴隶们只有一条路——
钢铁一般团结起来，
伟人一般看重自己，

把铁锁链敲断，
去欢迎那光明的出现！

这首诗，代表了《夜哨》作品的基本倾向，也概括了萧红《夜哨》阶段创作的基本主题。

《夜哨》发刊还不到半年，就在1933年12月24日被迫停刊了。有的文章说，《夜哨》停刊的原因是由于“萧军在一篇文章中，描写了日本军队在农村强奸妇女的事实”。这是不确切的。萧军在《夜哨》上共发表了五首诗、一篇散文。这篇散文还是由于陈华责备他写作不勤而作的。陈华在给萧军的信中开玩笑说，再不寄稿来，就停办《夜哨》，并登个启事，写上“三郎始勤终惰，半途抽条，文艺同仁，其声共讨”。查这篇散文中并无抗日内容。事实上是李文光以“星”笔名发表在《夜哨》上的中篇小说《路》（连载十三期），揭露了日本兵在农村的暴行，由于过于明显，引起了敌人的注意。陈华立刻给萧军写了一封告急信，请他“将家中所有不妥报纸及书物速烧掉，不日宪兵或要到你处搜查”。在这样险恶的情况下，《夜哨》只好停刊了。《夜哨》的作者大部分转移到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文艺》。

《夜哨》的终刊号为第十八期，实际出了二十一期，其中创刊号另为一期，第六期、第十四期重复。在这二十一期中，有十四期刊载了萧红的作品，计有：《两个青蛙》、《小黑狗》、《八月天》（诗）、《哑老人》、《夜风》、《叶子》、《中秋节》（署名“玲玲”）、《清晨的马路上》、《渺茫中》、《烦扰的一日》10篇。在《夜哨》的作者中，萧红是最勤奋的，从篇目来说，她仅次于山丁（梁倩），就篇幅而言，萧红则居第一。

萧红在《夜哨》上发表的作品表现的思想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旧世界血泪斑斑的控诉

这些作品所反映的背景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敌伪统治下的中国东北城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封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残酷压榨双重压迫之下，东北人民已经无法生存下去，他们饥寒交迫，日夜挣扎在死亡线上。萧红，这个封建地主家庭的叛逆者，由于坎坷的经历，困厄的生活，使她亲身体验到了黑暗社会的压迫，亲眼目睹了下层人民的苦难，从而把自己的命运与广大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她一执笔，就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对那万恶的旧世界进行了血泪斑斑的控诉。

在《哑老人》中，作者对罪恶社会的产物——乞丐的生活作了这样的描写：

破落的家屋，地板有洞，三张草帘仍在地板上，可是都是空的。窗户用麻袋或是破衣塞着。有阴风在屋里飘走，终年没有阳光。

但是，就是这样的生活也难以持久。老乞丐唯一的希望和安慰——孙女小岚因为回家探望有病的爷爷，竟被女工头毒打而死。在无依无靠的情况下，老人只好挣扎着在大雪中爬着去讨饭，但是“什么也没讨到”。最后，“又哑又聋又患病”的老乞丐在失火时活活被烧死了。小说描绘的这幅悲惨图景，令人目不忍睹。

在《清晨的马路上》一文里，描写的乞丐是一个“残废没有小腿把鞋子穿到手上用胳膊来帮助行走”去讨饭的人。他过马路时，差点被汽车轧死。在《烦扰的一日》里，也有一个年老而昏聩的乞丐，“在锐利的风中站立”。可以想见，在伪满洲国，他们的归宿也必然同哑老人一样，是死路一条。

作者笔下出现这么多的乞丐，是有深刻意义的。用乞丐来

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崩溃、人民破产的黑暗现实，是十分有说服力的。

穷人平时就吃不饱穿不暖，要是得了病，更是雪上加霜了。在《清晨的马路上》，“小林的爸爸患着咳嗽病，终年不能停息”，明知道西药铺有止咳药，可是没钱买，只好在病魔的折磨下，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

在《小黑狗》中作者描写了一群小狗的死。这些小狗下生后不久，房东太太就对它们做了判决：

这一大群什么用也没有，一个好看的也没有，过几天把它们远远地送到马路上去。

作者写小狗之死的用意，借文中人物的口说了出来：

一个小狗死在这没有阳光的地方，你觉得可怜么？年老的叫化子不能寻食，死在阴沟里，或是黑暗的街道上。女人，孩子，就是年轻人失了业的时候也是一样。

萧红是满怀同情之心，流着泪去描写这些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下层人民的悲惨遭遇，愤怒地控诉了反动统治阶级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戳穿了所谓“天下大同”、“王道乐土”、“歌舞升平”的谎言。这不但在当时起到了教育人民的作用，就是今天对我们认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也是很生动的教科书。

（二）为妇女不幸的命运呼号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除了同男人一样，要受政权、族权、神权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萧红早年深受封建家庭包办的婚姻之害，加上那个所谓未婚夫的欺骗，是对“男子的支配”，有着本能的仇视的。在逝世前几天，她曾对人说：“我最大的悲哀和苦痛，便是做了女人。”她亲自尝受了旧制度下妇女的“悲哀和苦痛”，所以，她的一支笔，

始终没有忘记在作品中表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主题，在《夜哨》中的几篇也是同样。

萧红通过描写这些妇女的悲剧，强烈地表达了她对妇女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以及要解除封建夫权的热切愿望。

（三）对劳动人民高贵品质的讴歌

萧红满怀深情地在作品中刻划了下层人民身上的高贵品质，热情地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善良、无私与强烈的阶级同情心。萧军在《跋涉·书后》中指出的：“唯有你同一阶级的人们，才能真的援助和同情你。”这是两萧当时共同的认识。这样的认识也体现在萧红的诗《八月天》中：

听说你的父亲是死在工厂里，
我的父亲也是死在工厂里。
我们两个不都是一样孤独么，
为什么不出来会见？

……

我不是谁家的小姐，
我穿着和你同样褴褛的衣裳！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诗坛，“旧的诗已变成了骷髅的跳舞，而新的却又是一些花呀，月呀的堆集”。萧红这首诗，犹如一阵清新的风，吹进了诗坛，一扫乌烟瘴气，给新诗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即：描写人民，表现人民。

（四）揭示了人民群众的觉醒与反抗

在《两个青蛙》中的青年学生秦铮面对“猩红热、虎列拉……各样的传染病都有，只有传染病，没有医生”的丑恶现实，“真希望死了”。这是很能代表当时相当一部分青年的苦闷精神状态。在平野的帮助下，她认识到“想要死的人，那是自私或是个人主义的变态”。她看到了自己的责任，勇敢地投入到与

现实的斗争中去。作者没有交代这对青年的政治面貌，但从“秦铮的父亲处死刑了。第二天秦铮被捕了，接着就是平野”，在这简单的叙述中可以知道，他们是在反抗敌伪的斗争中被杀头与坐牢的革命者。《清晨的马路上》里的大林及王老头的儿子北钟“常常不归家”，受到敌人的追捕，显然是在进行着抗日活动。

《夜风》形象地告诉读者：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只要人民群众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团结作战，就一定能推翻貌似强大的统治阶级。萧红在《夜风》中为生活在暗无天日的伪满洲国的广大贫苦农民指出了一条求解放的光明大道，这一方面固然是与党的帮助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她坚持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夜风》是早期东北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中最优秀的篇章之一。

萧红在《夜哨》上的创作，不但具有很强的思想性，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初步成就。

首先，语言朴素，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东北城乡的社会生活。作者取材于当时社会中常见的生活现象，给予艺术地再现。那些生活现象，如乞丐站立街头、女人受男人的压迫，十分平凡，毫无传奇色彩，一般人往往熟视无睹，意识不到其中所包含的社会意义。萧红却以她那女性特有的细致入微的洞察力，捕捉住这些社会中的人情世故，使用朴素无华的语言，使之像丰富的生活本身那样，真实地再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们认识到，这些生活现象的产生，正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由于语言朴素，更接近于生活真实；由于其真实，更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

正如大多数作家一样，萧红在创作初期，也还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夜哨》阶段是萧红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在思想上，她还没有升华到自觉阶段，对待人民群众，还仅局限于同情。除

《夜风》之外，其余几篇都过多地笼罩着无可奈何的阴云。在艺术上，文笔还显得幼稚；体裁划分不够严谨，有些作品很难说是小说还是散文。不过，这些都是她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前进中的不足，是璧玉中之微瑕。

萧红在《夜哨》上发表的作品，在东北现代文学史上曾产生很大影响。早在38年前，有人在总结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时就指出，萧红的那些作品，“不单是哈尔滨，就是整个东北文坛也都为之轰动，博得一致的好评。”还有人说，由于“在她的犀利的笔致下，写出了小市民的悲哀和东北农村的破产，实给予了沉闷中的东北文学者以极大的冲动。”

（摘自《东北新文学初探》1989年版）

暗夜里燃烧的火花

——谈王秋莹在东北沦陷时期的小说创作

李慕燕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祖国东北大地的时候，以文艺为武器进行反抗和斗争的有萧军、萧红、舒群、罗烽、白朗、金剑啸等进步作家，而当他们之中大都先后离开东北进关以后，一批新起的文学青年，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新文学的革命传统和战斗精神，以民族的自决心理和爱国的责任感，在文艺战线上，继续坚持着反抗和斗争。王秋莹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早在中学读书时代，王秋莹就喜爱文学。鲁迅的杂文，巴金和蒋光慈等作家的作品都给了他一定的影响。于是他练习写

小诗，写儿歌，也写散文，特别是当一首小诗在沈阳《新民晚报》的副刊上发表以后，就更增强了他写作的信心。“九·一八”事变的炮火毁坏了他的学业，使他避居家乡山村，然而战火并没有毁灭他那颗热爱文学的心。他经常写些文章寄到报纸发表，并由通信结识了一些文学青年。1933年和同学陈因组织“飘零社”（为纪念旧日同学经过战乱分散离别而取名的文学社团），在《抚顺民报》出刊《飘零》文艺周刊，后因生活所迫，于1935年考入沈阳《民声晚报》当记者，不到一年就告失业。1937年到长春《大同报》，自此开始了报纸副刊和文艺期刊的编辑工作。他先后编辑的报纸副刊有《大同报》的市内新闻版和《盛京时报》的《文学》；还与陈因等人组成“文选刊行会”，创办大型文学同人刊物《文选》，出刊了“文选丛书”，并编辑《文最》、《文颖》，作为《文选》的姊妹刊。文艺编辑工作和文学社团的组织活动，虽然使他涉足于文学领域，但作为创作基础的，毕竟还是他亲身所经历的生活。

王秋萤出生在辽宁省抚顺县的一个名为新屯的小村子里，正好邻近日寇盘踞的矿区。他的父亲开过小杂货铺，但因不善经营而很快倒闭。后来买了一小块地，却被当地劣绅盗卖给日本煤矿，虽然多年告状，但终因无权无势而几次被投入狱中。因此，在王秋萤的童年时代，留给他印象最深的便是那高大的狱墙、阴森的狱门和狱卒凶恶冷酷的面容了。穷困的生活，使他到处颠沛流离，始终没有得到过安宁。为了寻找工作维持家庭生活，他由抚顺迁居沈阳，又由沈阳搬到长春，不久又返回沈阳谋生。除了生活的动荡，还有政治上的迫害，敌特的监视，乃至逮捕刑讯，使得他这个具有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的文学青年，逐渐成熟，在创作中表现出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对民族敌人无比愤恨的思想感情。

王秋萤真正从事文学创作始于1932年。那时，他尝试写剧本，但都不成功。后来，他涉足小说创作，开始并没有引起文坛的注意，可是当《雪地的嫩芽》于1937年在《新青年》月刊发表以后，受到读者的好评，于是他便被称为“小说家”了。自此，他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写出了《丧逝》、《三秋草》、《离散》、《羔羊》、《农家女》、《中间层》、《小工车》、《血债》、《矿坑》等几十篇小说。1939年，经过挑选，先后出版了两个短篇小说集，取名《去故集》和《小工车》。1941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河流的底层》。

十几年间，在日伪法西斯的高压统治下，他总是通过各种形式，隐晦曲折地反映出被奴役被压迫人民的心声。如果我们把东北沦陷的十四年比作长长的黑夜，那么，王秋萤的小说就是这暗夜里燃烧的火花，透过这火花使人们看到了希望和光明。

二

王秋萤的小说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他的作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描写现实，暴露黑暗。这是他创作的出发点，也是贯穿他全部作品的基调。对此，当时一些在东北沦陷区的日本文化人曾经指责所谓“满系”文学中“暗”的倾向，这当然包括王秋萤的作品在内。可以想见，面对日伪的反动统治，只要是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作家，又怎能抛开亡国之痛和人民之苦而使作品“明朗”起来呢？王秋萤的小说具有阴暗色彩，正是那个特定的黑暗时代所赋予的，也是东北人民救亡图存的真实反映。

收入《去故集》中的9篇小说，大约写于1936年至1939年。这时的东北沦陷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并且由于民族矛盾的不断加剧而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痛苦。王秋萤的小

说虽然没有从正面去反映日益加深的民族矛盾，但他所描绘的人民苦难生活却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情景。这个短篇集所描写的都是底层人们的生活，他们在黑暗的深渊里，不管怎样地出力、流汗、卖命，到头来终不免被生活所吞噬。一对要好的朋友，因生活的煎熬，一个丧志求生，充任了村公所的小“助理员”，一个虽矢志不移，但也难于在黑暗的社会里求生（《喜景》）；春雨和南风本来是会给人们带来暖意的，可是，春雨滋润不了爱情的嫩芽，穷人有爱而不敢爱（《春雨》）；春风也吹融不了沿街乞讨儿的冰冷的心，因为等待他的是“没有阳光，没有温暖”的阴森恐怖的监狱（《南风》）；人们有家不能归，爱国遭屠杀（《嫩芽》）；生活就像一个大铁笼子一样，禁锢着人们的肉体和精神，“每天铁门的巨响，受刑者的喊叫，监视者的残酷打骂……这一切都震碎每一个人的心”（《羔羊》）；母女两代人，女儿的命运也和母亲的一样不幸，尽管她“不惧怕人间诡诈与凶险，不惧怕社会上的黑暗与悲惨”，但生活的压迫，经济的拮据，终于使她逃脱不了被有钱有势者欺骗与玩弄的厄运（《两代》）；煤矿工人的生活，更是悲惨与凄楚，整天“出卖劳力与血汗”，却得不到温饱，养不了家口，矿山的生活动简直比监狱还痛苦（《矿坑》）。

如果说在描写现实，暴露黑暗上，《去故集》中的小说表现的作家的创作意识还有些模糊的话，那么，收入《小工车》里的8篇作品，却使人看清了作家明确的创作意图。从小说的题目上，就可以窥见作家的良苦用心：《离散》、《农家女》、《丧逝》、《血债》、《三秋草》等等，显然是描写穷人的生活 and 衰败的景象的。从题材上看，作家的眼界扩大了，不仅写了农村的破产，矿山的重压，而且还描绘了生活在所谓“中间层”的小职员的不满和苦恼（《中间层》）。从内容上看，虽然写的大都是穷苦人

们生活的悲剧，但却不是《去故集》的简单重复，而是比较深广地揭示出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比如《血债》，写的是东北移民的情况，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采取武装移民的政策，所以不仅使当地的“一些地主，已经完全变成佃农”，土地全被剥夺了，而且还要镇压人民的反抗，特别是镇压东北抗日联军的反日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血债》所描写的是《去故集》中所没有的。再比如《小工车》，内容虽仍然取材于矿区，写的也是矿工一家人的悲惨遭遇，与《矿坑》有些相似，可以说是它的姊妹篇，但是作家所反映的生活远比《矿坑》复杂得多。这里有赌场，有妓院；有工人的酗酒，有的还到妓院去嫖女人；有矿山的更为严酷的统治，有“把头”的变相剥削和克扣工人的工资，一句话，就是工人的生活更苦了，命运更悲惨了。作家就是通过这些，揭露了日伪统治者对矿山凶残的剥削。

王秋莹的小说主要是描写“暗”的。但是，一个作家如果只是暴露黑暗，从他的作品里看不到一点光明的影子，那么，他的作品就会给人们带来消极的影响。王秋莹的小说之所以博得当时文坛的好评，被称为荒芜文坛上“一种可喜的景象”，“是我们所最需要的食料”，就是因为他在暴露黑暗的同时，投给人们一线光明和希望。对此，老作家山丁在《〈去故集〉的作者》一文中曾经指出：

“秋莹的作品是刻画暗的。这暗则是‘明’的希求，是‘明’的征候，我们的作家仿佛是一阵送葬的歌手，倘能换出新的，相信也会奏出健康的明朗的声调来。”

是的，王秋莹正是凭借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人民的同情，以一个作家的崇高责任感，怀着一腔悲愤写下了那个屈辱时代的葬歌。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王秋莹的大胆创作的精神。在当

时，描写真实，暴露黑暗，是需要胆量的。王秋萤不畏惧日伪反动文化统治的重压，不服膺于《文艺指导纲要》明令规定之不许，在那“精神的不聋而聋，不哑而哑，同时爱而不能爱，憎又不能憎（王秋萤语）”的畸形生活里，在被特务跟踪监视的险境中，仍然写着以揭露黑暗为主题的小说，真是难能可贵的了。

三

王秋萤的创作，开始是比较幼稚的。这主要表现在他不大注意形象的塑造，而把笔力过多地放在讲述故事上。结果由于人物和故事存在隔离不切的毛病，而使作品失去了感人的力量。例如《春雨》，写的是一对男女青年恋爱的故事，男青年澄因为是穷人家的子弟，所以有爱而不敢爱，最后只好留书出走；而姑娘虽是富有人家的女儿，但却不顾父亲的反对，一心爱上了澄。女儿和父亲的矛盾，颇有些“五·四”以来新女性的特征；女儿的一些话，也是很有进步意义的。只可惜，小说忙于交待故事而忽视了在矛盾中刻画性格，因此，除了干巴巴的几句新的言辞之外，使人看不到形象所应体现的生活内容。后来作者创作日益成熟，便把笔触放在人物上，让人物牵动故事，以故事丰满人物，使小说比较生动感人。这在《小工车》这本短篇小说集里表现的很是明显，主题的鲜明，人物形象和性格的突出，要比《去故集》中的小说好得多。从这里，我们会看到秋萤小说创作的成长过程，也会看到形象的创造确实是一个作家成长的标志。

在秋萤的小说中，写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但成为秋萤创造形象系列的，却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对这些人，作家倾注了同情，倾注了爱，并且以写实的笔触把他们的生活原原本本地告知人们：究竟为什么他们的生活那样贫困？究竟为什么

受剥削、受奴役、受压迫，不把他们当成人？启发人们从现实、从社会寻找答案，寻找原因。《羔羊》写的是流浪儿的生活，作家通过“我”也被逮入狱的所见所闻，比较详尽地写出了日伪监狱对失去父母、生活无依无靠的一些流浪儿的虐待，反映出失去祖国的孩子命运的悲惨和日本法西斯的凶狠。再看《离散》，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小家庭的破灭。萍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可是到处找不到职业，不得不靠妻子养活自己和女儿。他感到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妻子，面对着“破旧的墙壁，破旧的杂物”，于是一种烦躁的心绪狠狠地咬着他的心。起先，他把烦闷和焦躁发泄到孩子身上，后来，便转移到妻子头上，从漫骂到动手打起来。他学会了喝酒，酒后更容易使他恶骂和毒打女人。对他这暴躁的性格，妻子是原谅的，从来不反抗一句，这更使他为“自己不但没有能力养活女人，同时还无耻地折磨女人”而撕肝裂心。可是，失业的痛苦，日子的穷窘，这生活的重负促其在变态心理的驱使下，终于赶走了女人，那个畏缩惧怕整天躲在角落里的小女儿也因饿病丧身。就这样，一个家庭活活被散了。在这里，作者塑造出一个人性被摧残被蹂躏的失业者形象，更为有力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的黑暗。

注重人物命运的刻划，激起人们复仇的火焰，这是秋萤小说塑造形象的另一个显著特点。秋萤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悲剧性的结局。有沿街乞讨的流浪儿；有一辈子娶不起老婆的单身汉；有被地主、官吏霸占侮辱后赶出家门的妇女；也有活活被累死、饿死的老人；有因生活所逼偷盗、抢劫而蹲监坐牢的囚犯；也有丧家离走的失业者……所有这些人物，在秋萤的笔下，命运都是悲惨的。《矿坑》中的张斌一家的遭遇，就是一个代表。张斌凭着自己粗壮的身体整日在煤矿做工，但仍然也娶不起老婆，后来他的朋友周连山在一次煤洞倒塌时被压死，他

才与其遗孀同居，并且“仰望着明天，希冀着未来”，乞求着“到了老年可以过一点温饱的日子”。可是整整十年的光阴过去了，“除了生了两个孩子以外”，不但没有实现他们的幻想，反而一天天堕入贫困的深渊里。当女儿招弟被干子把脑袋打伤住进了医院时，拿不起住院费，这一切逼得张斌走上了偷盗的路，被抓进监狱不久便被折磨死在狱中。这本来就够悲惨了，可是作者为了深入揭示人物的命运，更进一步描写了张斌老婆的生活。张斌死后，她完全失去了依靠，不得不过着乞讨的生活。她甚至产生了死的念头，但一想到孩子还小，便把求生的欲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后来，由于孙富的死缠、引诱，就又和孙富同居，并且生了孩子。孙富也因穷困下来而经常打骂张斌的遗孀，这就使得做母亲的张斌妻子内心十分痛苦，沉重的家务负担，整天压在心头的郁闷，真使她有些喘不过气来，特别是小二的死，更使她感到难于和孙富同居下去了，于是她领着女儿离开了这充满创伤的家庭。有谁看了这人生悲苦的命运和凄惨离散的情景而不产生同情之心呢？

秋莹描写人物的命运从不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哪怕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小事，也总是把它引到与现实、与社会有关的问题上来。《两代》里可以说没有写什么重大的事件，母亲只求过上平安温饱的生活；女儿芸芳虽然是一个有着理想的少女，但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学教员，她们所做的一切，既没有什么英雄的壮举，也没有什么引人震惊之处，但是作者把她们放在被侮辱被损害的环境里，于是她们的平常生活就带上了明显的社会色彩。尤其是母女俩最终都成为同一个官僚父子的玩物，这就更使人想见到当时社会的黑暗情形了。小说的结尾发出的“我终久是要活的，我倒要看看社会会把我们这一些不幸者迫害到什么地步”的呼喊，正是黑暗社会所激起的人们的反抗之声，也

是即将燃烧起来的复仇的火焰喷射。这样，就使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塑造，跳出了家庭和职业的小圈子，而赋予她们以社会和时代的意义。

给人以强烈求生的欲望，鼓舞人们斗争的勇气，这也是秋萤小说塑造形象的一个特点。秋萤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一群，即便是那些“中间层”的小职员，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忧郁哀愁的命运笼罩着他们的生路，饥饿死亡的威胁时时向他们袭来，但是他们没有失去求生的欲望，在黑暗中挣扎，在苦难中斗争。《南风》中的小秃，《羔羊》里的流浪儿，《两代》里的少女，《矿坑》里的张斌的妻子，《离散》里的萍，《丧逝》里的李辛芝，《血债》里的黄金生，他们都是饱尝人间的苦难而在顽强求生的人们。

对于作者给他的人物以求生的欲望，当时曾引起一些评论者的责难。有的认为不真实，有的认为不典型，至于究竟应不应该给人物一条生路，这倒是论者所没有谈到的。对此，作者曾在《去故集·序》中说：

当我又重读了我的每一篇文章以后，使我深深的感到了自己的残忍，为什么我要把这些男士们放在万难忍受的炼狱里煎熬他们呢？可是客观的现实也同样煎熬着我的良心，使我又如何用粉饰的笔来抹掉他们的血与泪呢？这问题是不断的折磨着我的灵魂，所以时时使我陷入与故事里的人物一样痛苦的境界。

也许是正因为这种原因吧，使我往往不忍把每一个人爽利的处死，而且使他们另走上一条生路。其实我也知道生路即是死路，但是我总不愿再残忍的明示出来。

我认为，这些话既道出了作者的苦衷，也谈出了作者的理想。所谓“不忍把每一个人爽利的处死”，那是因为现实毕竟还

有挣扎着求生的人们；既然作者不愿粉饰现实，那他就不能把所有的人物都送上绝路。另外，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月，有多少人特别是青年一代，因国土沦陷和日伪的蹂躏，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对前途失去了希望，在他们苦闷徘徊悲痛欲绝的时候，作者能够用他所塑造的苦苦挣扎求生的形象指出渺茫的希望，不也是当时的人们所最需要的吗？李乔（东北沦陷时期剧作家）所说的“秋萤的小说一向是充溢着热、力与生命”，恐怕就是指的形象的展示出来的坚韧的求生的精神。勿须否认，秋萤的小说所塑造的形象有不真实、不典型之处，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出走还是反抗和斗争，意识比较模糊，生路也是渺茫的，但是，在那黑暗的社会里，在文网杀人的统治下，作者能够用他所塑造的形象在暗夜里燃烧着火花，也确实是值得称道、值得钦佩的。

（摘自《学术研究丛刊》1986年第2期）

《满洲评论》周刊

于 涇

日伪战争之后，许多日本知识界和具有不同政治背景的各派人物，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在他们的国内和殖民地办起报刊来，但都是旋起旋落。当时的日本知识界有“三期刊、七期周刊、半年日报”的流行谚语，意即报刊多数短寿，难于持久。《满洲评论》则与之不同，它创办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前夕，停刊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发行时间基本上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殖民统治相始终。

《满洲评论》的出版

它创刊于1931年8月15日，每周末发行。最后一期的发行时间是1945年7月7日。14年间，共刊行29卷687期；其中1931年17期为第一卷，自1932年起每半年（25期）为一卷，至1944年末止共出版27卷。在此期间发行相当准时，几无脱期。进入1945年之后，刊期混乱，间隔时间长短互异，是周刊还是旬刊、半月刊，已经无从说起；上半年出18期为第28卷，下半年则仅出2期，归入第29卷。每期印数为5 000—7 000册。

通常每期32页（含封面、封底），凡纪念、庆祝、特辑专号俱增加至40~50页，个别的达80页。以每页按千字计算，则每期约为32 000字，全部字数合计约为2 200万字左右。

《满洲评论》创刊当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准备发动直接的军事入侵前夕。当时日本的朝野人士热衷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所以报刊载文皆偏重于此。日本军方，也在极力搜罗各界对东北问题的看法，尤其是专家学者的见解。《满洲评论》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从编著者《满洲评论》

据这个刊物一些主持人自述，拟议出版这个刊物是在1931年的春天，原定刊名是《支那评论》。为了筹措经费，他们找到了“亚细亚学会”。这个“学会”是由日本的菊池和石光两将军为首，还有一些与中国有关的名流组成的，所以是一个与日本军方有关联的团体。虽然有同人的捐助，实际还是以这个“学会”的出资为主。

这个刊物的代表人小山贞知，曾长期在中国大陆从事秘密活动。早在一二十年代之交，他就投身于日本著名的国际间谍

坂西利八郎（中国化名班志远，日本陆军中将）主持的设在北平的特务机关——“坂西公馆”。坂西的主要助手是著名战犯土肥原贤二（1915—1928年任坂西的辅佐官），小山则是坂西的首要文职助手，故有“文数小山，武数土肥原”之说。因此，他与土肥原之间关系甚深。20余年间，小山一直在从事拉拢北洋军阀，策动中国军阀混战的活动。卢沟桥事变前后则致力于物色汉奸，是华北傀儡政权以及新民会一类伪组织的重要幕后策划人。当时他奔走于关内外各地，从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侵略阴谋活动。同时，他是满铁的嘱托，“满洲青年联盟”^①的理事、大连事务所所长。他撰写的稿件，以数量而论，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而且这个人与刊物相始终，直到停刊前夕，还在继续撰稿。政治上他是“九·一八”事变的狂热支持者，与关东军和华北日军中的少壮派军官之间来往密切，是典型的右翼人物。1946年5月小山企图混入遣返日侨之中，不料自天津登船时，被中国当局查获。被判刑后又转送东京巢鸭监狱。1954年出狱后，旋即死去。小山是这个刊物的代表人，后来任《满洲评论》社的社长。

《满洲评论》最初的主要创办人应是橘朴和野田兰藏这两个人。不过，当这个刊物正式出版时，野田已离开大连回国。

橘朴是《满洲评论》的编辑，1906年来华，曾任大连《辽东新报》记者，与《满洲日日新闻》的田原天南合办过《支那研究资料》月刊。其间对中国农村、道教以及财政、税收和土地制度进行过调查与研究，并有许多著述：《支那社会研究》、《支那思想研究》、《中华民国三十年》、《支那建设论》等书；《道教与神话传说——中国的民间信仰》、《中国革命史论》以及

^① 满洲青年联盟：“九·一八”事变时旅居东北的日本人的右翼法西斯团体。

《橘朴著作集》三卷等。

橘朴，还和鲁迅先生有过交往以及相互间的评价。鲁迅的1923年1月7日的日记记下了“下午丸山君来，并介绍一记者橘君名朴。”这里所记的“丸山君”，即当时日本在华报纸《京津日日新闻》的主笔丸山昏迷，橘朴是该报的记者。他们的会面虽然是仅有的一次，但后来彼此都有过相互的评价。橘朴称道鲁迅先生是中国当代的第一流作家和“日本通”。1927年以后，鲁迅对橘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开始重视他的文章。据鲁迅先生的日本朋友和学生增田涉的回忆，鲁迅称赞橘朴“比他自己更知道中国的事情”。当橘朴在1934年回顾这个刊物创刊三周年的时候说：“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后来他又说：“和自由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诀别，开始走上劳动者民主主义，尤其为了建立满洲国而接受农民民主主义，并且对于培养和鼓吹这种精神，感到极大的兴趣。这就是，虽然和军官团^①的现行指导精神基调不同，但在某些方面则是可以信赖的同路人，从而对此新势力寄以深厚的期望。因此，我从改变政治方向的三年以来，作为本刊的记者，一切言行悉本于此。”这个自白并未隐讳他从自由主义者转向日本军国主义的怀抱。这样改变政治立场，在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中屡见不鲜，这不能不说是日本知识阶层的一幕历史悲剧。橘朴是一个经历和思想都非常复杂的人，任何试图简单地加以概括并作出结论，都将是无益的。他是一个有个性的学者，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

橘朴和小山一样，都是满铁的嘱托，另外几名主要成员，如早期的编务主持人大家令三、山口慎一（该刊的重要撰稿

^① 军官团：泛指日本陆军军官中起主导作用的右翼集团，在此尤指关东军中的此类集团。

人)，以及小林英一、田中武夫、贵志英夫（本名岸田英治）等都是满铁嘱托或情报与调查部门的研究人员，其中的山口慎一，同时还是《满铁调查月报》的编辑。1934年，橘朴已经是“满洲国协和会中央本部”的理事。但他又并未在伪满政权中担任过公职，由此也可看出他的特殊地位。应当指出的是，这个刊物曾经刊载过相当数量的日本关东军军人（如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片仓衷等人）的文章，其中常以“伏卧居士”为笔名发表文章的，就是著名的“九·一八”事变策划者之一的片仓衷。

尽管《满洲评论》有着相当复杂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但它在30年代仍不完全属于官方的御用刊物。橘朴等人在编辑方针上，大体采取了兼容并包的路线。本世纪的头三十年，是日本社会主义思潮高涨的年代，其各种流派都在这个刊物中略有反映，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偶有出现。例如九卷十一期的《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作者：杉坂洋）一文，就相当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国民党的反动和腐朽，中国工人苦难状况，并且相信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人民创造新的历史局面。许多文章，流露了对于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围剿与长征寄予期望，详细报道了红军在军事上的胜利。在日本国内问题上，一些文章怀疑军方的反动措施；不赞成各种产业都纳入军事经济统制之下；每每暗示大资产阶级与军人统治集团的专政，是日本知识阶层失去言论自由的主要原因，等等。直至1935年意大利法西斯进攻埃塞俄比亚时，这个刊物还发表过文章表示：“日本人民对埃塞俄比亚人民寄以无限的同情。”特别值得提到的一个撰稿人是犬上末广。这个人曾是满铁调查人员，研究中国农业问题的专家。他极力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分析中国东北的农业经济与农村的阶级关系，甚至提出过改变这种阶

级关系的论点，当然这是日本军方所不能接受的。还有一个1936年进入《满洲评论》编辑部的佐藤大四郎，研究过中国农村问题。他认为把中农和贫农组织起来，他们不但可以自救互助，还有利于建设农村的共同社会。这和日本统治当局以殖民地的地主、富农阶级为社会基础的思想完全相反，当然也被斥为异端。大上、佐藤一类知识分子，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都先后被逮捕，大上还死在了狱中。当然，更多的文章是站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立场上观察中日关系和国际关系，鼓吹扩张侵略的。但是，相当一部分文章、消息报道和文献资料，还是相当客观和真实的，甚至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政府、第三国际执委会，直至斯大林对记者的谈话等种种文献，也没有加以歪曲。这说明《满洲评论》的版面虽然不大，但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了大刊物的风度。正因为如此，这个刊物的一些文稿也通不过日本警察机关的出版检查，以致多次“开天窗”，甚至出现过整版的空白。

《满洲评论》不是一个大众读物，而是以日本的知识界为对象的，因此文字并不通俗，也缺少一些趣味性。有的文章中的引文，往往原文（主要是英文）照排，不附译文。介绍西方的书刊，也是照此办理。这也是它的另一个特点。

《满洲评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参考价值

这个刊物是个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的综合性刊物，内容很庞杂，但属于有关经济问题的评论文章居第一位。如果从包括的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尤以东北问题比重较大，其次是苏联，再次是英美，也有评述日本与全球范围的国际关系问题的。

这个刊物的栏目，10余年间先后有过很大变动，但就主要

的栏目设置而论，大约有如下几种：

1. 时事评论，编排在各期之首，都是一些当时最引人注目的问题的评论，多由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执笔。文章简短精悍，一般在2000字左右，反映了当时日本流行的看法。

2. 某些专门问题的论文，内容广泛，可以说是时事评论的伸延，但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专题居多。这一类文章篇幅较大，个别的长达数万言，需连载多期才刊完全文。文章的观点则彼此互异，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不论文章的内容如何，都包含许多有用的资料。

3. “情报”是这个刊物比较经常设置的专栏，相当于我们常说的“时事”或“消息”。它的特点是文字简炼（每条几十字至千余字不等）、条目较多（每期数条，有的多至20条）。这个栏目的篇幅仅占每期的1/10左右，但内容比较充实、系统，是编写编年史或大事记的参考资料。

4. 在这个刊物中还有一类文章叫“杂论”，有时不设栏目，其实也是一些专题论文，与前述的专论不同，内容与时事的关系较远。这部分文章与专论相比，资料价值并不逊色。

5. 为介绍一些新闻人物的生平和社会团体的背景与活动，有时辟有“个人、团体”或“人物月旦”的专栏，这也是相当有用的资料。

6. 常有一个图书介绍和报刊评论的专栏，虽然评介的角度各有不同，但是对于当年日本出版界，也包括个别的西方著作，特别是对于研究中国问题的书刊常有各种评介。这对了解三十年代日本各界舆论和出版界的状况，是非常有益的。

7. 每期的最后，常有“编后记”，有的在这之外，有一个叫作“壁报”或“隅灯”之类的栏目，文字简短细碎。它常常反映日本知识界与编辑人员的苦闷和牢骚，又有时是正文的补充。

8. 除上述内容之外,日本报刊有一种习惯,常在纪念日、节日或创刊纪念的专号上,刊登祝贺的名单(其实是一种广告)。在《满洲评论》上,经常有当时日本的权贵人物、军政机关、大企业,以及各界名流,伪满洲国的机关和伪官员的名单也夹杂其间。这对于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和殖民统治的历史,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就这本刊物的14年的历程来说,先后变化是很大的。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1937年以前,日本当局对言论的控制尚未十分严厉,《满洲评论》可以发表各种文章,消息报道也比较注重真实。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当局加强对出版界的控制,有限的自由大幅度缩减,刊物的风格发生了变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进入了孤注一掷的阶段,疯狂地镇压一切非军国主义的思想。就是日本知识界中的左翼人士、反战的人、有民主思想的人,甚至仅在某些细节上持不同见解的人,也都遭到了各种形式的迫害,大批政治犯被投入监狱。到这个时期,只剩下那些最右翼的反动文人,声嘶力竭地为“圣战”呐喊了。这个刊物的最后几年,除反映日本军国主义的垂死挣扎之外,已经丧失了真实的史料价值。

不论当时的日本刊物有多大的时代、民族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它还是保存了一些对于我们有用的资料。在殖民统治下的“满洲国”,东北各地的工人曾经进行过种种斗争。这个刊物对此都略有反映。

它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几乎每期都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或中华苏维埃区(解放区或抗日根据地)的报道或评论;甚至还有一般不易想像得到的有关苏区生产、合作运动等方面的研究文字。尽管这些文章中大部分不是公正与客观的,但对我们现在研究中共党史、军史和抗日斗争史,仍不失为有用的

参考资料。

(摘自《长春史志》1990年第3期)

伪满洲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尹承俊 关忠祥

伪满洲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在伪康德6年(1939年)7月15日正式成立开放。它的筹备办事处于康德5年5月1日在奉天(沈阳)成立,同年11月移至伪新京大经路。当时正值伪满洲国第一期“五年计划”已经结束,第二期建设开始的时候。伪首都的基本建设在大规模地进行,在这种情况下,由伪政府支持,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援助,筹备完成了陈列。

1. 关于建馆目的

馆长、伪民生部次长日人宫泽惟重有过介绍,他说,在“满洲建国”6年后,在基本建设进入第二期的时候,“吾人所应深察者为勿困于眼前小利害,树立百年大计。”而“对满洲之大自然无正确理解,绝难图民众之向上,对人文缺乏深刻认识则此共存共荣国家之理想必不能达到。况对外宣示我国文化机关之整备,乃发扬日满两国不屈不挠的决心之事也”。“政府”有鉴于此而设立了“中央博物馆”。他为博物馆提出三项任务,“一是古今内外之自然人文两种科学资料之汇集、整理、保存、陈列;二是研究所调查来的资料,刊行学术论文,举行平易之讲演;三是与国内外各学术机关联络”。

按“中央博物馆”官制（敕令第327号）规定博物馆要“为政府各机关的政务提供咨询，并为一般学术研究及社会教育作出献供”。总之，要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占领和殖民统治服务。

设在伪新京的“国立中央博物馆”，汇集陈列了自然科学方面的标本资料，也有部分社会科学资料，主要是民俗文物资料。它在奉天的分馆主要陈列历史考古及美术工艺品。

2. 馆舍的选定

馆舍选中长春大经路一个建筑面积只有690平方米的楼房，属临时租用。用副馆长藤山一雄的话说，这个馆“规模虽小，但对文化设施相当贫乏的新京来说，具有相当大的意义”，“是在首都新京建立博物馆的一个开端”。

在大经路的馆舍原是伪满建国后，一个中国资本家为开设商店而建的。当时他预料这个地方会很快繁荣起来，就选择大经路和长春大街交叉点南角，建了L字型四层大楼。但这里并未很快繁荣起来，于是他把此楼出租。经两三次借主易手，于伪康德6年3月趁借主“劳工协会”迁移之机会，借其三分之二，充作博物馆的筹备办事处和标本资料库。尔后不久，原借单位全部迁移，标本资料库也于4月搬进中央大街蓬莱大楼。这样才得到全部陈列场地，并于7月15日正式开馆。

但是，正如上述，其位置偏居旧长春中国人市街，又脱离交通网，对观众很不方便，特别是难以吸引日本人。举行开馆仪式那一天，向朝野名人发了约850张招待票，但实际来的仅仅52名，实在很可怜。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伪满洲国上层阶级对博物馆不认识、不重视；同时也能想象到博物馆的发展有多么大的困难。

但是开馆后，购票参观的人数却出乎意料地相当多。截止8月14日，也就是开馆头一个月，观众就达5000人，其中满系

人（中国人）占多数，日系人居少数，比例是8：2。日本观众所以少其原因如上述，位置距日本人居街远，又脱离公共汽车的路线，还受市内日满人比例的制约，再加上宣传不够。

博物馆的馆舍问题，尽管作了相当的努力，要求政府当局合理地予以解决，但当时侧重抓产业、交通和军事，博物馆、图书馆及其它文化事业还没引起重视，最后不得不选用了这个位置偏、面积小的建筑物。

3. 博物馆的官制、职责

关于“国立中央博物馆”的官制，康德5年（1938年）12月24日傀儡皇帝溥仪签发了一个第327号敕令。敕令第二条规定设置馆长1人，特任级（相当于上将）；副馆长1人，简任级（相当于中、少将）；学艺官6人，荐任级（相当于校级，其中1人可以是简任级）；事务官1人，荐任级；学艺官佐5人，委任级（相当于尉官）；属官2人，委任级。

第三条规定馆长在“民生部大臣”的指挥监督之下，掌握馆务并指挥和监督所属职员，就其进退赏罚，向“民生部大臣”提出书面建议。第四条规定副馆长辅佐馆长，在馆长因故不在时代理其职务。实际上馆长是名誉的，主持经常工作的是副馆长。第五条规定学艺官受馆长之命负责文物标本的汇集、保存、陈列及研究工作。学艺官佐辅佐学艺官从事工作，事务官掌管事务，属官具体办理事务。

伪康德6年（1939年）8月5日又就“分科规程”公布了第74号训令。训令第一条规定，“国立中央博物馆”设总务科和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两部。第二条规定总务科掌管官印，同时负责文书、人事、会计、用度及营缮、财产管理、刊物发行、观众接待、文物资料的寄赠、出借等工作。第三、四条规定自然科学部、人文科学部分别掌管文物资料的汇集、整理、保存、调

查研究、展品陈列、学术指导、介绍及普及等事项。第五条规定馆长为分头掌管业务部工作，可以设分馆。博物馆馆长由民生部次长官泽推重兼任，副馆长藤山一雄。

4. 博物馆的“外延扩张”

“国立中央博物馆”馆舍狭小，只靠馆内活动实在受限制。于是，博物馆领导者打破了博物馆的传统观念，开创“没有馆舍的博物馆”，加强博物馆作为大众学习机关的本质属性。他们认定博物馆的目标在于真正成为教育机关、实习场地和研究所。为此，首先全力投入到“博物馆的外延扩张”活动中去，加强社会教育。他们的“外延扩张”活动形式有如下一些：

①面向中小学。携带电影及标本到市内各中小学进行巡回展出，并举行通俗的自然科学讲演。

②为了振兴科学教育，指导中小学数理科教师的教学研究工作，帮助他们克服关门教数理、不注重深入实际的弊病，吸引他们到博物馆来进行研究活动，或对他们进行短期科学训练。

③为了激发成年人对科学的兴趣，促使他们学习科学，每月利用“满铁福利会馆”及其它公共会场，举行一次“博物馆之夜”活动，进行讲演或放音乐和电影，以启发人们的智慧，陶冶人的情操。

④组织“科学同好会”。每月举行一次科学爱好者的集会，进行专门的课题探讨。还曾举行过地质学标本采集会、植物学标本采集指导会等，这些活动都由学艺员官（博士）担任指导。

⑤为了提高人们对动物、植物、地质、矿物的认识，使城市人热爱大自然，还举办几次科学旅行，一般到高城5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

⑥借房舍举办展览会。他们认为，在馆舍狭小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有效而灵活的办法。只要抓住时机就会引起社会的注

意，收到效果。如在日本关东军挑起“诺门罕事件”的两个月前，做为日本侵略工具的“中央博物馆”鉴于有必要启发人们对北边的兴趣和研究，于康德6年（1939年）元月在三中井（商店）举办了“西伯利亚展览会”并发出“国防紧急的警告”。还举办过飞鸟、奈良朝文化等展览会。

⑦印发刊物。这个馆隔月发行《国立博物馆时报》（小册子），其内容尽量选择一般的科学启蒙方面的文章，同时做为博物馆工作指南，促使内外博物馆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除了《时报》之外，还连续出版了《博物馆论丛》和《满洲民俗图集》之类的刊物，借以发表博物馆学和专业学科的研究成果。

⑧博物馆还尽可能加强同各学会之间的联系，把“满洲科学同好会”作为馆的外围机关，“满洲生物学会”也把办事处设到馆里，相互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还努力同“民生部”所属有关机关、“大同科学院”、各大学、“兴农部”及其他机关保持联系和交流。

5. 新馆的建筑计划

1940年，伪新京特别市公署决定，为“国立中央博物馆”新馆址划定地号，地点在中央大街（即现斯大林大街）南端建国广场（现人民广场）东北角，面积为6万坪（每坪合3.3057平方米）；民俗博物馆也将获得南湖南岸10万坪用地，从而揭开了将来建立宏大博物馆的前景。

在民俗博物馆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北满农家”，于1940年8月20日开工，年底建成。按计划除“汉民族的大农家”外，还要建“白俄移民之家”、“蒙古包”、“鄂伦春族的帐篷”、“朝鲜族住宅”、“日本开拓团民生活实态”等。民俗博物馆决定以瑞典斯德哥尔摩市北方博物馆斯坎森为样板来建馆。斯坎森地形多样，有石山、有湖水、有森林，博物馆在这种环境中展现了

各民族习惯、衣食住、生产方式、劳动组织、部落的各种仪式、舞蹈及游戏等生态。民俗博物馆也计划在南湖南岸为鄂伦春族种椎密林，为蒙古族建造草场等等。观众可以通过参观了解各民族朴素的原始的和自然的生活方式，然后理智地做出判断，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

民俗博物馆由“国立中央博物馆”负责筹建。

按批准的地号，在建国广场东北角，从靠近广场的地方开始，建立美术馆、自然科学博物馆和人文科学博物馆。它们都是“国立中央博物馆”的分馆。在这三个馆背后，用1.2万坪土地首先盖起宏大的综合仓库。该工程在1940年5月28日动工，计划五年左右全部竣工。

关于文物标本库房的建筑及设备，副馆长藤山一雄认为大英博物馆只想扩大陈列面积，不怎么讲究收藏设备；波斯顿美术博物馆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虽允许馆外研究人员入馆阅览，但是没有足以参观的地方。他认为这是由于没有摆脱博物馆即陈列馆的传统观念，他要避免这些缺陷，计划盖三座拥有院落和地下室的方型四层大楼，约占地1万坪。作为第一期工程，先建其中的四分之一，约2500坪（每层楼建筑面积为500坪），以后逐年完成。全部竣工以后，先将第一楼和第二楼用作展览厅，以全力收藏和展出实物标本。因为没有标本实物，博物馆就是个空架子。藤山一雄认为展览厅并不需要搞大规模的，将最有代表性的实物标本合理地陈列，让参观者能够保持入场时的健康状态，有效而轻松地愉快地参观，从中解决他们自己的课题，或者找到新的课题，待日后加以研究，保证让观众参观完毕能健康地退场，这是最重要的。对那些需要进行特别研究的人员，允许他们进入文物标本库房，以及图书室、研究室和实验室。因此博物馆不单是一个陈列馆，而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窗口，而窗

口后面的纵深应该是无限的。他主张为适应“国策”也就是为“科学的振兴”作出贡献，首先应把自然科学馆建成。德国前总统在德国博物馆奠基日，曾经抡起铁锤高叫“德国的新文化要从这块基石兴起”，后来经过三十年的科学振兴，大大地推动了德国的强盛。这个例子说明博物馆在振兴科学上的重要作用。

新馆建筑按计划刚开了个头，日本就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因财力关系不得不停建。

6. 奉天分馆

“国立中央博物馆”奉天分馆于伪康德元年（1934年）6月1日正式开馆，原名“国立博物馆”，伪康德6年（1939年）3月编入“国立中央博物馆”。分馆设置总务、学艺两个股，这两股的职责分别与“中央博物馆”相应的科和部相同。分馆长由馆长从“国立中央博物馆”高等官员中挑选任命。

这个馆属于历史艺术博物馆，它收集陈列历史、考古、美术品及工艺品。伪康德元年在奉天商埠地八纬路原王松岩官邸设立筹备办事处，不久迁入经过维修的十纬路原汤玉麟公馆，6月1日举行开馆仪式。分馆最初的藏品大部分是罗振玉捐赠的，还有政府拨交以及日本外务省寄赠的，共有书画、佛像、铜器、陶器等1285件。其中佛像、佛器主要是原来存放在承德离宫及外八庙，由汤玉麟等军阀搬到奉天宅邸的；书画类几乎都是张学良的，精品不少。

二

“国立中央博物馆”长春大经路展厅由大小两个房间组成。大房间面积约有460平方米，小房间面积为230平方米，无论怎样经济地利用也是困难的。结果安排了大中心柜4个、小中心柜15个、壁柜10个、展桌10个、展台6个，共计45个；另外还

有无盖陈列台 24 个。将这些东西适当排列组合起来就占满了空间，因而在已汇集到的 6 万个标本资料中只展出了 1 200 件。

整个陈列分成动物、地理、矿物、地质和物理五大部分，每部分陈列并不都自成系统。这五部分中的重点是矿物和地质两部分。

第一为动物部分。是一进门的左侧，在一排大中心展柜里展出了“满洲”产的鸟类。第一展柜以鸣禽类为主，再加上野鸡、鸽、野雁、鹌鹑等。其中有在日本看不到的高丽黄莺、红嘴乌鸦、山火鸡、山鹌鹑、北满野鸡等。第二展柜陈列的是脚趾之间的蹼发达的野鸭、雁等所谓游禽类。第三柜陈列的是腿比较长而涉水的鹤、鹭、鸕等涉禽类。第四展柜陈列的是雕、隼等猛禽类。

还展有哺乳类动物，如食肉类的西伯利亚虎、满洲彪、野猫、黄鼠狼、獾、狐狸、砂狐狸、狼等；有蹄类、啮齿和食虫类以及象、蒙古马、野猪、驯鹿等动物的骨骼标本。

第二为地理部分。放在陈列室的中心部位和右边南侧，仅仅局限于人文地理方面，并以鄂伦春族的民俗品为主。这部分陈列品逐次更换，开馆当时陈列有：

满洲地貌模型。这里展示出地理学基础的地图识读法，并以放射的光及其阴影鲜明地描画出地貌及其中孕育着的文化。通过参观，如果深入地思考地貌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理解到“满洲”在民族、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是一个重要的地区。

皇舆全景图原版。这是在奉天故宫里秘藏多年的国宝，清康熙皇帝曾述怀称：“朕倾注三十年的心血而成就之。”共有 41 张，是意大利人里巴（汉名马国贤）刻画的。

原始民俗品。主要有鄂伦春、驯鹿鄂伦春、赫哲、蒙古、白俄移民等民族创造的纯朴的民族工艺品。

第三、四部分是全馆陈列的核心部分，为使观众关注矿石，他们下了很大功夫。在“中央博物馆”收藏的数万件化石标本中，选择出色的约100件标本，按照自然分类法进行了陈列。

在展桌上放置的本溪湖产珊瑚礁化石、海拉尔及克山产的“马弁莫斯”的头骨组合标本，可称为珍宝中的珍宝。

有关层位学的标本陈列有130件，从“满洲国”内最古的地层到最新的新生代冲积世的砂、碎石等岩石、矿物、化石的标本，严格地按时间顺序从古到今地陈列着。

当时由于日本以武力独占东北，日“满”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处在恶化状态中，唯独在科学领域，美国首都华盛顿国立博物馆于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开馆之际，为了表示祝贺，寄赠了300多册文献和极为珍贵的矿物及化石标本约50件。在这一批标本中选择最有意义的30件陈列在第二十至二十一展柜里，以示对美国国立博物馆的谢意。

另外在第二十六号展柜里展出了侵华分子沃尔奥科特博士生前的笔记本和他的巨著《在中国的调查研究》亲笔校正稿，日本人认为这是一个“骄傲”；另外还将在东北的山野地质调查中手握锤子“殉职”的外山四郎、园田逸木两个理学士的遗物陈列在第二十六展柜里。

这一部分还陈列着东北有名的矿产如金、银、铅、亚铅、铜、菱苦土矿、滑石、萤石、煤、油页岩等各种各样的标本，并且说明了这些资源的原矿石是在怎样的状况下开采出来的。从“安东省”芙蓉矿山里开采的表面显露出金粒的金矿石、在“奉天省”分水出有40立方公分大的金矿石标本、“锦州省”杨家杖子及“安东省”青城子矿山的大型好看的铅矿石等都公开陈列了。

为了说明沙金的开采过程，这里展出了“北满”沙金产地

的一个典型——“桦山县”小石头矿业所附近的断面图，并将各含金层的标本和放射出灿然光泽的大量沙金粒陈列在第十九号展柜里。另外还展出了“淘金船”。

第五为物理部分。把主要着眼点放在怎样使人容易理解有关电的知识上。于是从简单的装置开始，逐渐深入到精巧的电气器械的结构，力求使人们对现代机械装置能够理解和发生兴趣。如静电引发实验装置、静电感应的实验装置、电磁作用的实验装置、电磁感应的实验装置、变压器说明装置、有线电话说明装置、无线电话说明装置、手摇发电机、水中导电实验装置等。此外还有真空管作用说明装置、放电实验装置、紫外线鉴别装置、万能光学实验器、光线反射曲折实验器、滑车实验器、霓虹灯管实验装置等等。

还陈列有合成橡胶、合成树脂制造工艺及其制品、各种电表、高压玻璃、干电池、光学机械等。

这部分陈列因为能表演，甚至可以让观众亲手操作，所以最吸引人，尤其中学生最感兴趣。

（摘自《吉林省艺术集成 资料汇编》
文化艺术志）

日伪统治时期 吉林省的图书馆事业

徐光复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的十四年里（1931年9月——1945年8月），是文武两手交替使用——在大搞武力侵占和经济掠夺的同时，也进行了对中国人民固有思想文化的镇压。

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1932年（伪大同元年）溥仪建立伪政权后，立即通令全东北不准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学校不得使用中国教材，不经批准不许集会、结社、游行、出版等。并于1932年9月发布伪《治安警察法》，同年10月24日又抛出伪《出版法》，对中国人民的自由严加控制。

日伪政权对带有民族意识的书刊一律禁绝，并强行输入日本法西斯书刊。1932年3月至7月这短短4个月，就在东北禁书650余万册；1934年1月29日，一次就通令禁止36种报刊输入东北，其中主要是我国关内报刊，还有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等。以后查禁书刊种类逐年增加，并极为严格。

这期间，革命的、抗日的和具有民主思想的书刊禁止在东北出版，关内也不得向东北运入；马、恩、列、斯、毛及中国共产党的有关书籍更是严禁的对象。据《满洲年鉴》记载，1935年到1938年4年间，日伪统治者禁止发行的报纸为7445份；扣押56091份；禁止发行的杂志为2315份，扣押13664份；禁止普通出版物3508册，扣押924852册。1939年输入的出版物仅以“公安”为由一项，禁止发行共743种（不包括被删削的数目），其中关内的出版物为488种。1937年以后，中国关内运往东北的出版物更是锐减。相反，日本国内宣扬军事法西斯思想的出版物却源源不断进入东北，后来竟达到占东北当时进口出版物的80%~90%以上。

日本军国主义还以“思想犯”、“政治犯”之名，以逮捕、监禁乃至杀害等手段，来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

在此期间，做为社会文化教育机构的图书馆数量上虽略有增加，但却被用来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在文化上奴役东北人民的

工具。

吉林省立图书馆

吉林省立图书馆在伪满洲国前期仍沿用前名，1938年（伪康德5年）改名为吉林市图书馆，当时占地面积为950平方丈，房屋占地面积为95平方丈，共28间，其中有办公室3间，妇女阅览室1间，儿童阅览室1间，阅报室2间，书库10间。伪康德4年（1937年）5月奉伪省公署教育厅谕令，馆址由蒙古族胡同迁至通天街145番地3号。该馆从一开始就被纳入日本侵略者建立其所谓“王道乐土”的轨道，为宣传殖民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

（1）组织及机构设置。该馆在人员安排上，表面上由一名中国人任馆长，实权却操纵在担任司书主任、代理馆长的日本人手中，从而在组织和业务上对图书馆严加控制。当时该馆共有工作人员12人，分为二部包括五系，有庶务部（庶务系、企代系）和司书部（藏书系、目录系、阅览系）。

（2）办馆经费。主要依靠伪政府国库拨款，伪康德4年17.64万元；康德6年14.665万元；7年13.958万元；8年75.45万元。此外还接收了民国时期在官银号的存款基金397.4832万元。

（3）藏书建设。伪政府直接干涉图书馆藏书建设，入藏图书大多是为封建的、殖民主义的、为侵略目的服务的图书，如《大东亚圣战记》、《日本精神》、《满洲的国政》等反动书刊。在日伪统治的十四年里，平均每年入藏图书2515册。伪大同元年（1932年）藏书量为5.4442万册；伪大同2年（1933年）由于日寇焚毁及收缴进步书刊，藏书量下降为4.1369万册；伪康德4年（1937年）藏书量为6.0788万册；伪满洲国末期藏书量增至6.3424万册。

(4) 图书流通情况及借阅办法。该馆的读者以学生居多，在成年人读者中官吏占多数，工农读者仅占读者总数的2%稍强；全年接待读者人数平均为1000人左右，全年图书流通册次是逐年增长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吉林省立图书馆在借阅制度上采用机关保、铺保、押金等办法，无保的读者须缴纳所借书价两倍的押金。这种借阅办法很明显是把广大劳动人民拒之于图书馆大门之外的，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办馆方式，图书馆是为少数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

总之，日伪统治时期的吉林省立图书馆是为日本侵略者所把持，日本的宪兵、特务、领事馆、伪政府都可以直接干涉图书馆，使图书馆充满了殖民化气息。

伪新京特别市立图书馆（即现长春市图书馆的前身）

在长春市，原“满铁”所属长春图书馆于1932年（伪大同元年）改名为“满铁新京图书馆”，1933年（伪大同2年）又更名为新京特别市图书馆；原长春市公立图书馆于1933年（伪大同2年）改名为新京特别市立图书馆。1938年（伪康德5年）5月，将上述两馆合并，统称新京特别市立图书馆。前者为总馆，后者为分馆。总馆馆长位置仍由日本人占据，分馆的经费、组织机构、人员设置等皆由总馆负责，后来分馆也派进了日本人做工作人员，该馆权力实际上全部操纵在日本人手里。

为了适应长期霸占我国东北和侵略全中国的需要，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强化“满铁”图书馆的职能。首先，对“满铁”下属各馆的图书资料收集范围做了分工，因地制宜，各有侧重。如规定位于水陆交通要道的大连馆既收集普通图书，也收集官方的重要档案，以至军事机密材料；设在沈阳的图书馆主要收集中国古籍珍善本书和关内的重要地方志；设在长春的图书馆主

要是收集东北地区的地方文献；设在哈尔滨的图书馆着重收集有关满蒙的俄文文献资料以及有关苏联的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文献，特别是远东地区的文献、情报。

“满铁”图书馆在东北经营近四十年，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方式，扩充馆藏，使各馆总藏书达70余万册。

“满铁”图书馆还以召开会议、研究业务、编印出版物等方式，加强对我国东北文化的控制。“满铁”图书馆业务研究会是其所属图书馆直接主办的一个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组织。1916年在沈阳召开过会议；1927年沈阳（时称奉天）、铁岭、开原、四平街、长春几个图书馆馆长一起制定了这几个图书馆之间研究会的联合协议；1929年，“满铁”图书馆业务研究会正式建立会则，设置机构，连续召开三次会议，出版了《满铁图书馆业务研究会年报》。1937年随着治外法权的撤消，“满铁”形式上将沿线附属地的权力移交给伪满洲国，多数“满铁”图书馆与伪满洲国所属图书馆合并，“业务研究会”解散。于1939年成立了另一个受日本人役使的傀儡组织——“满洲国图书馆协会”。该协会出版了许多刊物。其中包括：由当时伪新京图书馆以“新京资料联合会”名义出版的《新京资料要览》；伪新京图书馆编的《新京图书馆月报》（1940—1944年）；伪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的《资料战线》等。这些出版物文字基本上以日文为主，内容主要是介绍各图书馆的动态，贯彻日本奴役东北人民的侵略意图。

伪国立图书馆

伪满洲国政府曾决定在伪都新京建立一所“国立图书馆”。1937年（伪康德4年）在长春成立了“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由伪总务厅厅长涩谷（日本人）任处长兼馆长，归伪国务

院直接管辖。但该馆一直处于筹备状态，直到日本投降也未开馆。

吉林省的县级图书馆

伪满洲国期间，在吉林省仍保留有个别县图书馆（更多的县则在民众教育馆内附设阅报所、识字处，陈列一般书籍及报刊）。伪政府为适应日本侵略者的需要，曾三令五申催促地方兴办和扩大图书馆事业。伪大同2年（1933年），伪吉林省公署发出训令，督促各地开办图书馆。伪康德9年（1942年）还在长春成立了“国家图书馆学会”，目的是进一步在学术和组织上控制图书馆。伪教育部对图书馆事业直接干涉，于伪康德4年（1937年）5月15日对图书馆的图书分类、保管方法发布了命令。要求各省图书馆长、各县县长将各馆的图书分类、保管方法、目录编制等项上报给伪教育部。

县级图书馆看起来比以前有所发展，但在政治上沦为日本殖民主义者宣扬其侵略中国的“王道主义”的工具，在规模上因“财政困窘、经费艰难”，一直处在奄奄一息的状态。

日伪统治的十四年间，吉林省的图书馆事业完全殖民主义化了，这是我省图书馆事业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

（摘自《吉林省艺术集成 资料汇编》第7辑）
文化艺术志

伪满时期的沈阳金石书画

侯维翰 白文韶

我国的金石书画艺术有悠久历史。金石又称印学，或称篆刻，是我国优秀的传统艺术之一。它和书法、绘画，都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清光绪中期以后，沈阳的金石书画家亓丹山、邵开鼎诸前辈，开始提倡并授徒传法，培养出一批优秀的艺术人才，使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在沈阳放出曙光。嗣经伪满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一度消沉；沈阳解放，在中国共产党“双百方针”的光辉照耀下，金石书画也获得广泛地发展，并取得很大成就。笔者二人自幼就老一辈金石书画家学习，对伪满时期沈阳金石书画所受到的控制，身经目睹，知道一些情况，兹择要记录于下，供参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世转时移，艺苑老辈与世沉浮，沧桑变幻，书画名家邱壑、莲浦以及缪东麟、锡钧、尚雅久、谈国樾、李西、邱健鹏等人，相继谢世。同仁们为纪念邱壑在沈提倡艺术之功，特在小东边门外珠林寺，为邱树碑以志。金梁、三多二老以及黄侃、章士钊、杨云史、于簪寿、袁子春、宁腐陈、寿玺等都避居他地。谈国恒、白永贞深居简出，很少以笔墨应世。葛月潭方丈年逾古稀，笔墨应酬多由监院邢真彻代之。而继续致力于金石书画者，仍以王光烈、郭德陈、白文韶为核心，共同钻研，以求上进；孙玉泉办的“辽海金石书画社”也培养了不少新秀，争露头角；一鸣惊人的于莲客，以淡雅清丽之笔，摹唐六如的山水人物，意境超脱，题画诗句，惹

人注目；老年人物画家关子衡之徒杨晶坡以及画虎的廖经世、画人物的张晏平、画山水的邢焕文和齐子祥都锋芒崭出。但是作者相轻，却是通病，王光烈的金石篆隶成就很高，而周德舆自从学习齐白石的篆刻后，对王的作品渐有微词，同时也贬斥别的作者：对孙玉良的画，以“匠气”批之，对齐子祥、邢焕文俨然以指导者自居。于莲客对孙玉泉的山水画，认为有“匠气”，人物画也近俗，唯临摹钱慧安较好，尤其独擅“传真”（国画画像），堪称妙技。于认为：书画者不读书，难免俗气，不会吟诗题画，更为疵点。他对周德舆所学齐白石的作品，指为“粗、狂、野、霸”、胡题乱写，没有艺术感。而别人（除周德舆以外）皆称赞于的诗、书、画，叹为三高，笔下功夫虽不及邱壑，而意境气韵及题画都超出邱很多，确属东北新秀。于乃业余作家，作画不索润格，亦不轻为人画。此时，崇华笔润已提到（山水）每尺四元，孙玉泉（山水人物）每尺两元。崇孙之间或孙周之间也互有微词。与此同时，徐延年在小河沿创办了“私立美专”，聘孙玉泉、崇华教中国画，也培养了一些人才。沈水艺苑，吐故纳新，也算活跃。

1934年正月，为筹备伪帝溥仪登基，铸造御玺，郑孝胥认为非王光烈莫属，王藉故未允。后乃用半金石半匠人的陈古陶、沈向宸两人铸造。陈、沈二人及时北上至长春（当时改称新京），在伪满国务院内斋戒沐浴，择吉施工。陈古陶经制六寸方白玉玺一颗，沈向宸镌刻溥仪自用二寸方白玉印两颗：一为“无逸斋宝”，一为“康德御笔”。铸造毕，二人各受溥仪“赏金”一封，即行返沈。及至3月1日，溥仪登基，启用御玺，降下诏书；又在“冲气以为和”的屏幅上启用了“无逸斋宝”、“康德御笔”两颗御印。此时，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伪满政权，日臻就范，对国人之统治日益加深，金石书画当然也逃不脱被统

治的命运，成立了伪满洲国美术协会，以“国展”和“省展”来引导和控制作者思想和作品。从康德2年（1935年）至康德10年（1943年），每年或隔年在伪满首都新京（长春）举办一次“国展”，共展出6次。展品有：书法（包括篆刻）、国画（包括日本画）、西画三类。作品来自伪满十省及各市作者，作品鉴定分为①无鉴查；②特选；③佳作；④入选；⑤落选。鉴定者由伪满美协会长荣厚（伪中银总裁，名藏书家）、副会长宝熙（海内书法名家、古书画鉴定家）、吕荣寰（伪大臣）、罗振玉、王光烈诸人及伪国务院与美协共同出名礼聘来伪满的日本著名画伯主持鉴选工作，当时应聘来满的日本画伯有：中村不折、渡边展亩、小宝翠云……诸名家，担当鉴选书画工作。西画则另有鉴定者。综观六次伪国展，每次都是以国画作品较为突出，书法金石次之，西画居后。沈阳作者在六次展中的出品情况如下：

国画部分：

1. 于莲客：出品六次，前三次特选山水画：第一次是以唐六如笔法画四尺山水人物中堂“猎貂图”，第二次是以唐六如笔法画四尺山水中堂“长白佳气图”，第三次以唐六如笔法画四尺山水“灵峰济胜图”。后三次出品无鉴查（因后三次被聘为鉴定者，故出品无鉴查）。六次所画皆进呈伪帝康德御览，并皆由溥仪购买，每幅给100元或120元伪满币。他的画被评为伪满第一代表作。

2. 房纯朴：出品六次，一次仿恽南田花卉为特选，五次山水花卉入选。山水仿其师孙玉泉笔法，有所改变。

3. 吴英奇（现改名无畏，在辽宁出版社工作）：出山水六次，一次“凤鸾图”佳作，五次入选。笔法仿其师孙玉泉而有所改变。

4. 周德舆：出品六次，两次佳作仿郎世宁“虎”及“海东

青”，四次入选，仿萧谦中山水及写意花卉。

5. 邢焕文（解放后改名邢洞川，在沈阳书画研究会工作）：六次入选，山水出品仿王石谷。

6. 王家鼎（当时伪奉天税务监督署署长）：出山水三次，二次佳作，一次入选。笔下功夫不大，惟以笔墨气韵得胜。

7. 关子衡：六回人物入选，画无专宗。

8. 杨晶坡（伪满警察）：四次人物入选，画学其师关子衡。

9. 张常海：画人物学费小楼，数次皆落选。

10. 马千里：一次花卉入选。画无专宗，笔意有江湖气。

11. 孙齐贤、孙效贤姊妹：山水人物画各六回入选，学其父孙玉泉。

12. 廖经世（解放后沈阳市新城子区政协委员，已故）：两次入选，画虎学张善孖。

13. 白文韶（笔者之一）：山水一次入选，仿王石谷。

14. 丁羽南：入选两次，一次画佛，一次画虎。

15. 孙玉泉：出品六次，一次山水入选，五次落选。

金石书法部分：

1. 白文韶：金石出品六次，一次篆刻特选，进呈伪帝御览，五次入选。

2. 郭德陈：金石入选六次。

3. 周德舆：金石入选六次。

4. 田锡坤临魏碑、张凤翔大篆、依艮藩石鼓、陈柏桥大草、董逸安行书、于莲客小楷等先后皆入选。

伪满美协对特选作品赠给奖状一份，伪币20元。对佳作赠奖状一份，纪念章一枚。对入选赠奖状一份，纪念章一枚。纪念章以合金制成，当中一奖字，下铸美术协会字样。王光烈的作品无鉴查当然展览。沈阳山水画者齐子祥（名瑞麟，现沈阳

书画研究会理事)的水墨画,在当地虽居于莲客之下,却超乎其他作者之上。书法仿摹名家,皆见形似。时因忙于作假画卖钱,一直未参加“国展”。惟孙玉泉老先生,资格既老又桃李满城,竟而五次落选,不仅招致书画界很多烦言,更使其本人感觉不够面子。按落选者除孙玉泉、张常海之外,沈阳其他作者落选的也大有人在。上述这些参加伪国展的作者另外又都参加了伪奉天省美术展览。省展也是从康德2年起至康德10年,每年或隔年的12月在沈阳展出一。共展了六次。伪奉天省展由省美术协会的前后会长韦焕章(伪奉天省教育厅长)、金荣桂(伪奉天省长)、副会长王允卿(伪奉天省民政厅长)及王贤伟(伪奉天市长)等人的主持下举办的。伪省展鉴定人以沈阳南满站日本学校的教员“首藤”为首,另外还有于莲客、白文韶及孙玉泉。该展览除于莲客、齐子祥未出作品外,其他沈阳作者差不多都出了作品。例如:邢焕文山水特选一次,入选五次;周德舆花鸟佳作六次;白文韶、郭德陈、周德舆金石佳作各五六次;其他如孙齐贤、孙效贤、吴英奇、厉纯朴、廖经世、孙玉泉、关子衡、杨晶坡、张常海、马千里、陈柏桥、依良藩、张凤翔……诸人皆曾入选。出品中最突出者是一次展出郑挥(郑孝胥孙女、郑禹之女)浅绛山水镜心一幅,笔力古劲,上拟宋元,评为佳作。这幅画吸引了广大观众,交口称赞。省展对特选赠给银盾一架,对佳作赠予纪念章一枚,对入选也赠纪念章一枚。从“国展”“省展”的选定作品看来,得知伪文化统治者为指导并控制金石书画作者的思想,在鉴查上专重歌颂伪满的题材。这种题材能以典雅笔法出之者定为上品,如于莲客的“长白佳气图”及“猎貂图”等作品是标准作。其次是描写壮丽河山及鲜艳的花卉作品以洒落或写实之笔出之的也得入选。金石书法以宗古为上,以书卷气为胜。至若健康生动为劳动人民

所欢迎的作品，尽在落选之例。当然，题材不适于日伪统治者的口味和水平不够的东西也在不选之例。以上所说“国展”“省展”是日伪以行政手段控制艺术，另外还用警察司法手段对付作者，因而制造了“孙齐被捕事件”，这一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九·一八”事变后的大同元2年间（1932—1933年），沈阳初受日本侵略者统治，社会上人心不定，当然没有欣赏金石书画的兴趣。这样就使依靠卖画为生的齐子祥（住小南城门外）、邢焕文（小南门脸）、马千里（小南门脸）……等人的生活陷于窘境。独孙玉泉（住大南城门里路西辽海金石书画社）扩大招生，尚可维持温饱。及至康德元年（1934年）以后，日伪统治加强，大批日籍的军、政、经济、工业人员由日本渡海来到东北。尤其是沈阳的各机关、企业（日本叫会社）、工厂里面增加了大量的日籍人员，操纵一切。这些日籍人员，享受高薪待遇，生活富裕。钱多思奇，多有寄情于收买古今名人书画作为消遣的。经常三三两两手拿着古人画谱和当代画刊趋步游览于大、小南门脸（南砖城外侧城根）的一些古玩铺之间。他等看到了古玩铺悬挂的古人仇十洲、沈石田、文征明、恽南田、沈南苹落款的山水花鸟画或是近代吴昌硕、任伯年、王一亭、萧谦中、郑孝胥……等名家的书画，便拿出书谱或画刊来对照。只要是书画的形式和画谱或画刊上一样，就不惜出钱几十元或百元以上买回收藏。有的携带到日本国内再高价出卖。其实这些画真品极少，甚至一幅真的也没有，都是上海北京制造的展品，仿摹染旧的假书画。各古玩铺假书画的生意兴隆，刺激了孙玉泉及幼泉父子的好财欲望。经过策划，幼泉在小南城门里大街路东开设“文艺舫书店”，经制假书画出卖并带有裱画作坊。幼泉开设文艺舫，开辟了沈阳制造假片子（假书画，内行叫片子，以前沈阳尽从上海和北京来货）的行道。他们制造假画的

程序是首先用单六吉宣或单贡宣，按照古人画谱或当代画刊照样仿摹出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种种画面。搞这些画面，孙幼泉主要是雇用善于仿摹的书画者齐子祥为之。使齐仿造明沈石田山水、文征明山水以及当代北京画家萧谦中山水和伪满盛行的郑孝胥字画。另外又雇用邢焕文仿造清王石谷的山水。齐、邢每画一幅（三四尺的中堂），幼泉只给他俩工钱四五元，而幼泉经过染旧（假造古人画由文艺舫裱画工人用颜色将画面染成旧的样子。染纸染黄、染绢染的比较红一些，表现出挂旧了的样子。假造当代名人书画，不须染或稍染一染。）装裱后，以高价卖给日本人以假充真。例如四幅齐子祥伪造的萧谦中四尺山水屏幅，孙幼泉只给齐16元钱，而幼泉装裱后以126元的高价卖给日本人，幼泉的文艺舫比光宣时山房老板更严重地剥削书画作者。幼泉除了雇用齐、邢以外，并由他父玉泉也假造明仇十洲的人物画。假造的方法一是临摹，一是所谓玻璃拓（把北京或上海的片子放在玻璃上，在片子上铺一张宣纸，玻璃下安一个百度的电灯泡，把灯打开，光透玻璃之上，用笔照描）。此外孙幼泉还画春册卖钱。文艺舫的生意随之兴隆起来，大为有利可图。尤其日本人多欲求得郑孝胥的字画，齐子祥伪造郑字形似逼真，再打上假印章，足使不懂书法的人难辨真伪。搞出来的假郑字，每幅齐子祥得2元。裱后或稍加染旧，每幅就卖10元至20元（对书画贩串行每幅10元，对顾客则卖20元）。文艺舫如此搞了一时之后，使几个依靠书画为生的作者得以维持生活。伪康德6年春3月某日，文艺舫来了3个人，声称是书画贩，愿以高价订写假郑孝胥字画四幅，希望当时写。幼泉闻言，即将齐子祥找来，当面写了四幅郑字，落上了郑孝胥的款，并从幼泉桌里取出木刻郑孝胥的假印章加盖在郑字上。搞完之后，齐孙二人等候付钱，不料该三人掏出手铐子两副，将孙、齐扣上，带到市警察

局（今市公安局址）司法科收押入狱。押了40多天，方释出。

大约是伪满康德3、4年时，曾经出现过一幕书法怪剧。一个四川老人“杨草仙”，自称年90，行走于各伪满机关之间，公开表演独特的草书。写字时，案上铺好宣纸，设好笔砚。杨老人在众人围观之下，先开始打拳，打着打着突然用右手抓起笔来，在纸上先写“日满一德”四个字，然后右手将笔一扔，左手接笔，继续写“一心”两字，下面再落上杨草仙的下款。他写的“日满一德一心”的草书，连写带画笔道间现出鸡冠子或鹤首或鸟眼的形象。他所写的都是宣传日满协和的标语。每写一幅索价4元。各机关的伪科长以上的日伪官员，在日本侵略者动员下争买之。杨草仙就这样在伪满各地骗取了巨额笔润，此事一时曾传为笑料。及至康德10年后，时局日趋紧张，百业凋敝，金石书画也随之消沉。

（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四辑）

辑印东北旧文史资料的有关追记

卞宗孟

在“九·一八”事变以前的二三年间，在沈阳曾有“东北学社”的组织，从事于东北文史的研究和东北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辑印的工作。事变以后，留在沈阳的部分社员，仍能继续事变前未竟的工作，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惜假借某些伪组织的名义，先后辑印出不少有关东北地方的旧文史资料，工作亦颇艰苦。在当时，这种工作为了掩蔽敌伪耳目，不能不更易原定书名，有所迁就。为原定《东北丛书》改称了《辽海丛书》，

原定《通宁通志》改称为《奉天通志》。辑印各书的纪年，由于不能写民国年次和西历纪元，但又必须避用伪组织年号，于是不得不改用干支作为代替。为了解决印资来源和印刷方便起见，即又利用了伪国立图书馆或伪奉天省公署的名义刊印，而实际上是由变相的东北学社的辽海书社负责编辑发行。计从1932年到1937年的五年间，先后辑印出丛书实录之类卷帙较多的类书达十数种之多，这不能不说是东北沦陷期间，在暴力蹂躏摧残之余，对于保卫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件难能可贵之事。而且这一工作在当时不但未引起敌伪文化统治者的注意，且反促动了敌伪影印4500多卷1200多册的“清朝实录”。

兹就记忆所及，把当时辑印有关旧文史资料的主要部分写出书录十种，以见一斑。

《辽海丛书》 10集10函，100册，计书83种，附图1册，铅印。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学社出版的刊物，除了“东北丛刊”（1930年创刊至事变停刊共刊行20期）外，有辑印“东北丛书”的计划，书目已大体拟就，未及时印，而事变发。事变后，由留沈社员金毓黻等改用辽海书社的名义继续主持编印，丛书亦改名“辽海”（辽海一词是自唐以来概指东北地区的旧称，实即东北的别名）。丛书的辑印，从1933年10月开始，先后分集印行，历时三载，直到1936年4月始行完成。这部10集百册的丛书内所收各书类，皆有关东北地方的文史资料，包括文献掌故、舆地图说、诗文游记，网罗颇为广泛，取材亦极谨严。其中有出于东北人士的著作，而内容又不尽有关东北文史资料范围的，亦行辑入。全部共集刊83种377卷。实为东北有丛书的一大创举。

《奉天通志》 10函，100册260卷；卷首1卷，铅印。

清代几次修盛京通志，均系统括东北三省。其后吉林、黑龙江均各有志，唯辽宁一省尚无专志，有之，自此志始。辽宁修志，远在1921年即有倡议，直到1927年始正式成立辽宁通志馆，由白永贞、袁金铠任馆长，延聘吴廷燮等为纂修。在纂修开始，曾经编就“辽宁通志总章拟目商例”，以为编撰标准。当时所拟志目，仍仿吉林通志新疆图志的体例，统名以志。志目凡二十有一，即大事、沿革、疆域、山川、建置、礼俗、户籍、田亩、物产、实业、官制、民治、财政、教育、选举、交涉、交通、军备、人物、艺文、金石。志目参酌旧志，有因有创，在各省省志中较为后出。在事变发生时，全书各目底稿，成缺参半，诸待梳理，幸未散失。事变后，金毓黻担任馆长，经过了两年多的清理纂辑，大体完稿。为符合敌伪的要求，只能改称《奉天通志》并取消了交涉一目，并将原目的户籍、官制，改为民族、职官。到了1937年由伪奉天省公署印行。全书260卷，10函100册。惜因顾忌，漏略之处颇多，因印刷仓促，内容舛讹误亦不胜枚举。

《热河志》，4函24册，清乾隆四十六年官修，120卷，铅印。

沈阳故宫旧存有武英殿本，系清乾隆四十六年官修，外间流传极少。1934年由辽海书社重付排印，中有影印插图160余帧。

《辽陵石刻集录》 1函2册，精装6卷。

1930年冬，辽宁省立图书馆长卞宗孟，由东北当局派同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梁思永，去热河林西发掘新石器时代遗物。归来携有林西白塔子出土的契丹辽陵图书哀册及汉字钦爱皇后哀册篆盖拓片，并撰文述梗概（载东北丛刊第十四期），国人知有辽陵石刻，实自此始。自后颇引起金石学

者对于契丹文字的研究。事变以后，在沈阳汤玉麟（热河省主席）私邸，发现全部辽陵刻石俱在，乃系汤玉麟在前一年私自盗掘辽陵，运来沈阳者。辽陵历代墓志石刻，均系契丹文与汉文对照各为一石，因为出土较近，文字完整，不失本真，对于研究契丹文字是头等资料。集录为金毓黻所作，就原石拓本缩印，并撰叙内容。书凡六卷，一为绪言，二为石刻正本，三为哀册考证，四为国书哀册考证，五为国书旁证，六为论著。全书考证颇详，印制亦精。

《永乐别录》 1卷，《宣德别录》 2卷，各2册。

两书均系旧史学家吴廷燮（向之）从明实录抄书有关辽东史实部分的稿本，由辽海书社据以付印者，时在1933年。吴廷燮事变前在沈阳萃升书院主讲有年，手抄明代各帝制录稿本多种，均赠予辽宁省立图书馆保管。

《满洲实录》 8类，4册，清代官修。

此书官修本旧藏沈阳故宫，图说并载，久无传本。事变前，辽宁通志馆曾取付影印。1933年辽海书社取其图付影印，改其说为排印。

《宣统政纪》 43卷，2函16册。

清代各帝皆有实录，均系官修，外间不传。清太祖谥穆宗十帝的实录，沈阳故宫崇谟阁旧藏全部。辛亥革命后，清室续修了德宗实录，后又续修了宣统政纪，体制亦同实录。历代实录均系帝王记事，历史价值不大，但亦可作为历史资料的一部分。宣统政纪的内容与近代变革亦可供参考。1934年辽海书社把这一抄本排印2函16册。

《四库全书原本提要》 140卷，4函32册。

当1930年沈阳文溯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曾提议撰印文溯阁藏书，未果，行而事变发。这一原本提要系就文溯阁本抄

录而成，甄叙各书，极为简明，颇便检阅。提要经辽海出版社编整，首系金毓黻撰写解题，未附书名索引、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与总目异同表及聚珍版本提要及四库全书提要异同表。1935年排印成140卷4函32册。

《渤海国志长编》 20卷，1函10册。

唐代渤海在东北建国达229年，其历史见之于新旧唐书及辽史，向无专载。金毓黻依别史体裁，撰为长编，综叙渤海史事，详略谨严，颇足补史载的不足。辽海书社于1932年据稿本付印，书凡20卷，1函10册。

《清朝实录》 4416卷，122函，1220册，影印。

在辽海书社先后印出《满洲实录》和《宣统政纪》之后，敌伪于1935年，倡议影印清代全部实录，交由所谓日满文化协会主其事。影印原书，包括《满洲实录》及十二帝实录，所以命名曰《清朝实录》。由日本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承印，历时一年印就。全书共装为1220册，其第1到第10为全书总目，11至18册为满洲实录，以下为12朝实录。书中由于避忌，多所篡改，如倭字及不利于日本纪事，悉被删改。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供稿）